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杨
尚
泉
书

12

1974

毛主席语录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 目 录

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史研究

认真看书学习 深入批林批孔

——我们是怎样研究《盐铁论》的？……上钢五厂八车间党总支委员会（3）

论淝水之战……季兴斌（6）

道学家朱熹的真面目……江西省婺源县文化站 文捷（12）

沈括和王安石变法……晓完 翟海（16）

评《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司徒季（20）

论商鞅的国家观

——读《画策》篇……邱荣其 康伟 李爱娣（25）

评价李贽思想上的一些不同观点（报刊论文综述）……（29）

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史研究

认真看书学习 深入批林批孔

——我们是怎样研究《盐铁论》的？

上钢五厂八车间党总支委员会

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这是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认真做到这一点，从我们前一阶段研究《盐铁论》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关键在于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盐铁论争是西汉中期儒法两家围绕着盐铁官营的利弊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论战。我们为了正确地总结和汲取这场斗争的历史经验，组织理论学习小组和工人群众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不断巩固、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关论述为指导，去分析盐铁之争。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和贤良、文学们的论争，看上去是关于盐铁官营的利弊存废问题，实质上是坚持中央集权的封建所有制还是复辟奴隶主所有制的问题。贤良、文学们在盐铁会议上的“罢盐铁，退权利”的叫嚣，目的是为了复辟盐铁业中的工商奴隶主所有制，妄图用来代替中央集权的封建所有制，以瓦解当时建立不久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为全面复辟奴隶制准备条件；而桑弘羊对贤良、文学的斗争，也正是为了剥夺工商奴隶主手里掌握的盐铁业的生产资料，巩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消灭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残余势力。这种情况说明，凡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巩固，都必定伴随着严重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今天，林彪搞“克己复礼”，目的就是妄图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所有制，使中国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去。这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时起时伏，时高时低，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

读史札记

- 从项羽的杀降政策谈起.....徐国芬 (32)
礼器和辩子.....李欣 (34)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 陕北“蘑菇战”.....史锋 (36)
牢牢掌握主动权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王秉森 李海生 (44)
历史战例四则..... (48)

经济问题研究

经济危机与政治革命

- 学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体会
.....上海师范大学 施鉴思 (57)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秦正先 (62)
怎样看待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学术动态)
——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意见综述..... (68)
谈谈今后怎样才能继续大幅度增产粮食.....中共崇明县委员会 (72)

人物传记

- 王安石传.....曹思峰 钟功伟 (78)
西双版纳来信.....吴文虎 姚纪梅 (88)

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目录索引

社会的全过程中。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坚持集中统一的政治路线，才能巩固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盐铁会议上代表奴隶主残余势力的贤良、文学们，集中攻击了盐铁官营等各项经济政策，其阴险用心是借攻击盐铁官营来改变法家集中统一的政治路线，破坏中央集权的封建生产关系。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桑弘羊义正辞严地批判了他们的反动谬论，指出盐铁官营政策对坚持集中统一的政治路线的重大意义。他认为：“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盐铁官营政策并不是单单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摧毁分裂、复辟的经济基础。我们总结盐铁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搞复辟倒退、妄图恢复旧的生产关系的人，必然要在组织上搞分裂，而新兴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一定要坚持集中统一的政治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组织反革命的“联合舰队”，妄图另立中央，分裂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然而，他的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今天，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实行了集中统一的政治路线，彻底摆脱了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谁若要走分裂、倒退的回头路，就必定要受到人民的唾弃。

要坚持集中统一，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毛主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坚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批判的重要性。在盐铁会议上，奴隶主残余势力破坏中央集权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复辟活动，首先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的。会议一开始，他们就抬出孔老二，鼓吹孔孟之道是“百世不易之道”，宣扬一条颂古非今、复古倒退的思想路线。桑弘羊看穿了他们的目的，指出他们的这些舆论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是为了破坏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为奴隶主复辟势力效劳。桑弘羊把儒家的老祖宗孔老二拉了出来，用“强”、“贪”、“愚”、“耻”四个字剥掉了孔老二的画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盐铁会议上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巩固和发展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必须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旧的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今天必须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用马克思

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只有这样去做，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指出，我们必须“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主席的教导，揭示了巩固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的斗争的长期性。运用这一观点研究《盐铁论》，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从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其间经历了一百余年严重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从秦统一中国到西汉中叶的盐铁会议的一百四十年中，围绕着新兴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而展开的斗争，也同样地惊心动魄，从未间断过。因此，一个新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往往需要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较之过去的一切社会革命更深刻、更彻底。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充分警惕剥削阶级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特别要高度警惕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钻到无产阶级专政内部来进行篡权复辟的阴谋。

深入批林批孔的战斗过程告诉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这是把批林批孔运动推向深入的关键，只有认真学，才能深入批。实践证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不是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结果大不一样。回顾我们车间刚开始研究儒法斗争的时候，读了《问孔》、《五蠹》等一些法家著作以后，有的同志认为研究儒法斗争没有什么可搞的了，搞来搞去反正就是前进和倒退的斗争，总结不出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来，再研究《盐铁论》，也不会有什么新成果，因此感到“深不下去”。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使这些同志掌握了理论武器，提高了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应该如何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去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和古为今用等问题。工人群众把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盐铁论》，同我们当前的斗争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提高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觉性。大家根据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大大增进了革命团结，使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工人之间的配合更加协调了。这就进一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焕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全车间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国家生产计划，革命和生产都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良好景象。

论 淝 水 之 战

李 兴 斌

淝水之战是一次著名的战争。这次战争，东晋仅以八万兵力，一举打败了苻秦的近百万大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以淝水之战等几次战争为例，来说明弱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打败强军的军事科学原理。东晋以劣势之军打败苻秦的优势之军，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是由于东晋方面内部比较注意团结和安定。这次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生动地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在淝水之战前夜，中国呈现着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北方在氏族建立的前秦统治下；南方则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偏安政权——东晋王朝。

汉魏以来，西、北部边境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国北部，主要的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西晋统治者残酷的经济剥削和种族压迫，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在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匈奴兵于公元三一一年攻破洛阳，晋怀帝司马炽当了俘虏；过了五年，匈奴兵又攻破长安，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司马业投降，西晋王朝寿终正寝，北方陷入连年的战乱之中。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拥兵自立，割据一方，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历史上叫做“五胡十六国”。其中，比较大的有：羯族的后赵，鲜卑族的前燕，氏族苻洪建立的前秦。最后，经过多次的战争，苻坚统治下的前秦终于统一了整个北方。前秦暂时统一中国北方之后，其内部仍然充满着各种矛盾。

在前秦社会中，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主要地表现为氏族统治集团和被征服的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少数氏族贵族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广大汉族、鲜卑族、羌族的人民，则成为他们剥削、压榨的对象。前秦统治者连年发动战争，征兵、征粮，苛捐丛生，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除了氏族统治者同各族人民的矛盾外，氏族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其他种族统治阶级的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也相当尖锐。例如，鲜卑族的前燕被前秦灭掉以后，原来的统治者慕容氏贵族被迫投降，表面上俯首听命，暗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图谋反叛。但是，苻坚对慕容垂

却深信不疑，竟授以京兆尹的重任。又如，羌族领袖姚萇也是佯为恭顺，待机而动。另外，在氏族统治集团内部，也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矛盾重重。苻坚本是“龙骧将军”，他杀死了苻健之子苻生才做了秦王，上台不久，又杀死了自己的哥哥苻法。苻坚有一个堂兄弟叫苻洛，“雄勇多力，而猛气绝人”（《前秦录·苻坚传》），苻坚对他十分怀疑忌妒。苻洛立了战功，反而把他排挤到边疆去，使苻洛怀恨在心。太元五年，苻洛率兵七万叛乱，攻打都城长安。苻坚虽然平定了苻洛叛乱，但心有余悸，又从消极方面吸取教训，把苻氏家族诸子统统分封至边疆，以防他们扰乱京师。不久，苻法的后代苻双、苻柳、苻瘦、苻武也纷纷叛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复杂的矛盾，处于不断激化的境地之中，使前秦社会动荡不安，犹如一座地下正在骚动的活火山。建立在重重矛盾的基础上的前秦政权，很不稳定。正如史书上所说：“秦恃其疆大，务胜不休，……转运万里，道殣相望，兵疲于外，民困于内，危亡近矣”（《资治通鉴》卷一〇四）。前秦政权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而苻坚却无视这些社会矛盾所造成的严重危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贸然发动了对东晋的战争。

那么，苻坚要攻打东晋王朝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东晋社会无疑也有许多矛盾。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除了东晋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外，突出的有帝室同士族之间的矛盾，北方士族同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北方士族同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但是，当时东晋的当权派多方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措施，一度使东晋政权处于相对稳固的境地。东晋统治者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划出一些特定区域，叫侨州、侨郡、侨县，专门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对于开小差的士兵和流散人口，宰相谢安也主张安抚，反对任意惩罚。有人反对这样做，谢安就“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世说新语》）来说服对方。这样就减轻了社会的动乱，加强了稳定。东晋统治者还利用逃亡民众的乡土观念，打出了“北伐”的旗号，给他们以“打回老家去”的幻想。这对于安定人心也起了一定作用。在东晋社会，帝室同士族间的矛盾也很突出。西晋灭亡以后，琅邪王司马睿逃到江南，被王导为首的中原士族推戴为东晋皇帝（晋元帝），这就使帝室同士族之间的矛盾出现很复杂的情况，帝室要利用士族的实力，士族要利用帝室的威望，这是互相利用的一面；同时，由于皇帝不甘心于当傀儡，士族也不甘心交出自已既得的太权，又有互相矛盾的一面。这一矛盾激化的时候，政权就不稳固；缓和的时候，政权就比较稳固。到淝水之战的前夕，由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远大的政治眼光的进步政治家谢安担任宰相。他忠心辅佐帝室，也能兼顾外戚，使其与自己合作。有一次，晋孝武帝的老夫人王蕴，发脾气拒绝任京口都督职，谢安耐心说服，晓之以利

害,终于使王蕴“受命,镇于京口”(《晋书·王蕴传》)。对于南、北士族间的关系,谢安也采取了一些调整的措施。东晋初期,大权主要掌握在北方士族手里,南方士族基本上被排挤在中央政权之外。到了谢安掌权的时候,南方士族桓姓已经参预了中央军政大权,并与北方士族王、谢之间产生了矛盾。身为宰相的谢安,既善于斗争,又注意团结。当时,晋孝武帝年幼,大司马桓温,手握重兵,大权独揽,与朝廷的关系弄得很僵。桓温处在病危之中,还命袁宏起草诏书,给自己加九锡,为篡夺皇位铺平道路。谢安以修改措辞为理由,把起草的诏书压在手中,打破了桓温的皇帝梦。可是,谢安也很会团结人。他与桓温的弟弟大将军桓冲共事多年,却相安无危,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桓冲每遇大事,总是先请示报告,然后执行。有人曾劝桓冲杀掉谢安,以除“时望”,桓冲不但不干,反而主动把扬州刺史的大权让给谢安兼管,家人苦苦反对,桓冲也不改初衷,这与谢安的从多方面主动争取做工作是分不开的。谢安掌权,还注意约束自己的亲属,不搞任人唯亲的那套。当大将军桓冲死后,东晋重镇荆、江二州出缺,按威望来说,应当派谢安的侄子谢玄充任。但谢安为了避嫌,遂任命南方士族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桓石虔为豫州刺史。“三桓据三州”,各得其所,关系就摆平了。另外,谢安对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也能妥加处理。从北方逃到南方的大士族号称百家,他们之间又以渡江的先后和门阀的高低而分成若干等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谢两家。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第一任宰相。王家基本上垄断了东晋的高级官职,同谢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到了谢安同王坦之一起辅佐晋孝武帝的时候,谢、王两家的矛盾却缓和了下来。据史书记载,谢安与王坦之合作得很好,“安与坦之尽忠匡翼,终能辑睦。”“王坦之出为徐州刺史,诏安总关中书事。安义存辅导……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晋书·谢安传》)由于谢安等人注意团结,妥善地调整了内部关系,使东晋政权相对地比较巩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东晋对前秦作战,就很少有后顾之忧,在政治上较之前秦具有一定的优势。

由于前秦和东晋的统治集团对社会矛盾的处理不同,前者自趋动乱,后者逐步安定。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淝水之战的准备阶段及其全部进程,更可以看出:前秦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后方空虚不稳,是如何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东晋由于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后方安定,是怎样夺得了战争的胜利。

苻坚想进攻东晋,蓄意已久。但是,苻坚大举进攻东晋的决定,遭到了前秦

统治集团内部的普遍反对,加深了内部的裂痕。公元三八二年冬,苻坚召开“太极殿”会议,与满朝文武商讨进攻东晋的大计。苻坚说,算算我的兵力有九十七万之多,我想亲率大军灭晋,你们看行不行?大臣们除秘书监朱彤谄媚附和以外,大家都说不行。苻坚看看无人支持,就宣布散会,只留下自己的弟弟苻融,再作商议。不料,苻融也坚持反对。苻坚一听,更加生气说,你也不支持,我还指望谁?苻坚的太子苻宏,苻坚最喜欢的小儿子苻洗,听说要攻晋,也都来谏阻。苻坚却说,军机要事,与你们小孩子不相干!苻坚的爱妾张夫人,也向苻坚陈说反对攻晋的理由。苻坚不耐烦地说:国家大事,你们女人家,懂什么!支持苻坚攻晋的,有没有呢?有一个,那就是鲜卑贵族慕容垂。他向苻坚讨好说,皇上“圣心独断”,英明得很!苻坚听了,很开心,表扬慕容垂说:能与我定天下的,就你一个人!其实,慕容垂怂恿他攻晋,正是有意识地把她推入深渊之中。所以,在攻晋这件事上,苻坚陷入了完全的孤立。

刚愎自用的苻坚武断地作出了攻晋的决定,引起了前秦社会极大的震动和恐慌。公元三八三年,苻坚正式下令大举出兵。老百姓每十人要抽一人当兵,各州公私马匹一律征用,富家二十岁以下有武艺的子弟,一律征调,有三万名富家子弟被征充当苻坚的卫队。官府抓壮丁,百姓逃兵役,搞得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安。被迫去当兵的,也根本无心打仗。这样的兵,就是有一百万,又怎样呢?苻坚命苻融率慕容垂等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命羌族姚萇率蜀兵顺江东下,苻坚亲率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浩浩荡荡,向东晋进发。

东晋方面,大敌当前,内部比较团结。苻坚早在举进攻前,已先后派兵攻占了梁、益二州,控制了长江、汉水上游,使东晋西部防线失去了屏障。西部防线出现了这一缺口,固然对东晋防御不利,但也同时起了报警的作用,迫使东晋破除所谓“长江天险”的迷信,从而认真地作了一些防御准备。同时,鉴于西晋因不抵抗而亡的惨痛教训,当时摆在东晋政权前面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全力抵抗。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前秦统治集团内的各派势力加强了团结。谢安首先把淮河以北的“流人”迁到淮南,实行坚壁清野。这一方面防止了前秦掠夺东晋的劳动力和兵源,补充了自己的劳动力和兵源,使后方比较充实;另一方面对于这批“流人”来说,也起了安置和稳定作用。在军事上,东晋派遣将军朱序坐镇襄阳,担任鄂北防务。谢玄还加紧召兵、练兵,组织新的武装力量,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北府兵”。这支部队,在淝水决战中,起了很大作用。

有备无患。在前秦大军压境之际,东晋方面沉着应战。前秦大军攻来,宰相谢安镇静如常,从容不迫地调兵遣将,这对于稳定军心,起了一定作用。李白

在诗中：“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可见，谢安不仅为文官之首，在沉着谋划军机这一点上，也是将帅们的榜样。苻坚凭借其兵力上的优势，西起鄂北，东到寿阳，进行全线攻击。苻融所率秦军主力，进攻寿阳，淝水之战全面展开。由于谢石、谢玄所率晋军主力，尚未抵达寿阳前线，防御薄弱，所以，寿阳被苻融攻陷。苻融又派梁成率五万大军东进，屯于洛涧，阻挡东面来援的晋军。谢石、谢玄看到秦军已先发制人，不宜硬拼，便在离洛涧二十五里处驻扎下来，寻机破敌。此时，秦军又窃获了东晋硖石守军粮绝的情报，苻坚喜出望外，认为一举灭晋，就在眼前。于是派遣攻陷襄阳时被俘的晋将朱序去劝降谢石。这位朱序，却是“身在秦营心在晋”。见到谢石，他不但不劝降，反而向谢石提出了破秦的建议。谢石根据朱序的建议，制定了破秦的战略计划：在积极战略防御的方针下，寻找有利战机，主动进攻，先击败秦军前锋，挫败锐气，然后夺取全胜。当时秦军到达前线的只有一部分兵力，消灭屯驻洛涧的梁成所率五万秦军，是当务之急。前锋都督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偷袭洛涧，斩杀秦将梁成，消灭秦军一万五千。谢石、谢玄乘胜指挥部队水陆并进，一举冲到淝水右岸，与秦兵隔河对峙。苻坚在洛涧吃了败仗，有点胆颤心惊。但凭借有大量后续部队源源而来，所以仍然轻敌。谢玄利用苻坚这一骄傲轻敌心理，要求淝水左岸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将领都不同意退让战场给晋军，但苻坚自作聪明，又贸然决定同意晋军要求，打算在晋军半渡淝水时，加以袭击，妄图以此打败晋军。结果，由于苻坚的军队是由各个山头的军队杂凑而成的，内部号令极不统一，苻坚一下令秦军小退，就一退而不可收拾，扰乱了自己的阵脚。晋军的突击部队乘机抢渡淝水，追击秦军。苻融的坐马被冲倒，苻融被晋军斩杀。这时，朱序又作内应，在秦军阵后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于是秦军溃不成军。路上听到风声鹤唳，也以为是东晋的追兵来到。日夜不停地溃退，死伤大半。苻坚本人也被流箭射中。他收拾残兵败将，逃回长安。至此，历时四个月的淝水之战，以晋胜秦败而告终。

淝水之战导致晋胜秦败的结局，决不是偶然的。就实力来说，前秦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占优势。前秦统一了整个北中国，控制着黄河流域的全部和长江、汉水上游广大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过法家人物王猛的辅佐和治理，社会生产也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东晋政权，偏安一隅，只有长江下游一小片土地。北人南迁，虽然带来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毕竟因为地狭人少，物质基础是远远不及前秦的。在军事上，九十七万与八万之比，双方悬殊更大。但战争的结果，却是东晋打败前秦。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东晋以自己内部的团结和后方的安定这一长处，弥补了自

己经济单薄和兵力弱小的短处；前秦则与此相反，以自己内部的不团结、不稳定，削弱了自己经济雄厚、兵力强大的优势。在苻坚的进攻面前，东晋统治集团在谢安的领导下，能够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使内部各种矛盾缓和下来。与谢安共事多年的王坦之在遗书中说：我与谢安、桓冲，言不及私，惟忧国家之事。可见，他们之间是合作得不错的。桓冲任大将军时，为了保卫京师安全，曾主动派三千精锐部队入京警卫。谢安认为后方安全有保障，部队应放第一线巩固国防，就谢绝了桓冲的好意。自从谢安执政以来，一直到淝水之战结束，东晋朝廷的高级文武官员之间，出现了“将相和”的局面。这对于打败前秦的进攻，有着重要的意义。前秦方面的情况恰正相反，它内部的一些重要矛盾，在苻坚的错误处置下得到了全面的激化。又加上苻坚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经常自以为是地作出错误的政治军事的主张，而且对秦晋双方的情况也有许多不合实际的错误估计。他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盲目轻敌，造成了一系列错误的军事部署：第一，苻坚发兵百万，几乎是倾国而出，造成后方空虚，给鲜卑、羌族贵族酝酿叛变提供了条件。第二，战线拉得过长，兵力高度分散。当苻坚率兵进至河南项城时，凉州的兵才到达咸阳，四川的兵才刚刚出发。主力部队首尾相距一千里；东线与西线，相距一万里，尾大不掉，指挥不灵。名义上号称百万大军，实际上真正投入战斗的，只有到达前线的一小部分兵力。第三，错误地重用慕容垂、姚萇等心怀反志的降将，也是军事上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过低估计了晋军的作战能力，轻率地下令后退让出战场，把主动权拱手送给晋军，把自己抛入被动之中。军事上这些错误的处置，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同其在政治上的错误——内部不团结、社会不稳定是紧密相联的。宋代法家人物王安石在论及苻坚时曾说过：“苻坚志大而见机，好功而不忍，内有慕容垂之徒不诛，而外欲伐晋，此其所以亡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治集团，由于受其阶级性的局限，他们至多只能做到暂时的、有限的团结。真正坚强而广泛的革命团结，这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做得到。“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目标一致，才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才能坚强无敌。无产阶级有着远大宏伟的政治目标，即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让我们在这个宏伟目标鼓舞下，进一步加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以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道学家朱熹的真面目

江西省婺源县文化站 文 捷

朱熹(公元一一三〇年——一二〇〇年),婺源人,南宋道学家。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都把朱熹的幽魂请出来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林彪就肉麻地说:“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

朱熹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个——

阴险毒辣的卫道士

朱熹作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出现在南宋历史舞台上,是封建社会趋向没落的必然产物。朱熹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汇集了儒、释(佛)、道三家的破烂货色,炮制了系统的完整的唯心主义理学(道学),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阶级专政提供了思想武器。

朱熹是个顽固的孔孟之道卫道士。他以《四书》作为他的理论基础,核心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以下简称《语类》)。朱熹不同于其他儒家头目的抱残守缺,他大量剽窃佛教的神秘观点和道教的荒诞理论,并和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说法糅合在一起,将“理”说成是永恒的宇宙主体。其实,他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从孔丘的“克己复礼”脱胎而来的。朱熹借道教的语言,牵强附会地说明“仁义礼智信”等封建伦理范畴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的体现,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本性,强说成是宇宙万物和全人类的本性。朱熹采取恫吓的口吻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语类》卷二十四)大至革命造反,小至生活琐事,凡是违反“三纲五常”的言行,都必须严加禁止。

朱熹为了论证他的反动的理、欲观点,煞费苦心提出了什么“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说什么“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衰颓浊薄者,便为愚不肖,为贱,为天。”(《语类》卷四)把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说成是天生命定的统治者,广大人民群众只配接受奴役和统治。同时,朱熹还提出了地主阶级唯心主义的修养经作为这种反动理论的补充。他一再提出所谓“敬”字功夫,说,“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语类》卷十二)他认为一个人要修养到圣贤的地位,一定要经过格物这个由不知到知的“梦觉关”,再经过诚意这个除恶务尽的“善恶关”,最后达到平天下这个超凡入圣的“圣凡关”。朱熹为这个“敬”字功夫规定了象佛教“坐禅”那样的形式,所谓“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端,目容直”(《语类》卷十二)。只要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封建伦理道德“敬”到头、修养到家,就可以“安人安百姓”、“治国

平天下”。朱熹向人们描绘了一个虚妄飘渺的幻境,用蛊惑人心的廉价谎言,为极端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蒙上了一块遮羞布,以期达到麻痹和束缚劳动人民斗志和革命精神的作用。

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杀人理学背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实际上是一批杀人眨眼的刽子手。孝宗年间,朱熹曾上书皇帝,认为“刑愈轻,而愈不足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愈繁”。主张以严刑酷吏对付敢于反抗的人民群众。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杀气腾腾地说:“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词,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对的)不宥(不宽恕),其不直者,罪也!”(《朱子文集戊申延和奏札一》)一句话,不准革命造反。朱熹出任湖南安抚时,正值当地发生农民起义。他一到任,赶忙召集党徒商讨对策,采取软硬兼施手段,把这次农民起义残酷镇压下去。宁宗登位,搞了一个“大赦”的骗人花招,朱熹却藏起赦书,“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然后再公布赦书(《四朝闻见录》和《林下偶谈》)。刀光剑影,两面三刀,充分显示了这个道学家虚伪而残忍的本性。

满嘴圆滑的阴谋家

朱熹在回答陈齐仲的信中,曾谈到要通过“格物致知”去“通世故”。所谓“通世故”,就是总结和运用历史上的反动派所用的满嘴圆滑的种种阴谋手段,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朱熹是以聚徒讲学的方式来掩护结党营私的肮脏活动的。他在福建同安县担任主簿时,就积极“选秀民充弟子员”,作为第一批党徒,并且建立了“小山丛竹书院”,作为第一个据点。朱熹是在福建生长的,在福建活动时间较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福建门徒为骨干的“闽学派”,其中,又有一个包括他女婿黄干在内的十六个人的骨干核心。朱熹以福建为基地,把势力扩大到江西、安徽、浙江和湖南等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书院”。每一个“书院”,既是他培养理学党徒的场所,又是他设在各地的理学基层组织。连首都临安(杭州)的首脑机关内都有他的党徒任职。宋孝宗的侍讲(老师)张敬夫,就是他的密友。朱熹曾大言不惭地说,“若使某一日不见客,必须夫病一月,似今日与客谈话,却觉得意思舒畅。”(《语类》卷一〇七)朱熹并不是“好客迷”,他所说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各地的党羽密友。这些党羽密友的来见,既可以向他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又能通过小道消息的方式把他的旨意传送到四方去。在朱熹的《语类》和来往的书信中,常常提到“气象”二字,“气象”就是形势,朱熹以研究形势来商讨进退的斗争策略,从而达到“若管天下事”(《语类》卷一〇七)的目的。

朱熹惯于趋炎附势,是个死不要脸的政客。他积极勾结和拉拢了一小撮官僚政客,其中有宰执(宰相)四人,待制以上的官员十三人,其中有的就是他同一条贼船上的党徒,有

的是他的理学的鼓吹者。朱熹惯用题诗写字，馈赠礼物，特别是推荐入官，来笼络一批死心塌地为他呐喊的党徒。一次，他的门徒问他：“孔子若被（诸侯国）用，（他的门徒）颜渊做什么？”朱熹回答：“如孔子做宰相，颜渊便做参政（副宰相）。”（《语类》卷二十六）这段师徒对白，正可说明他们一伙的结党的动机。朱熹一再告诫党徒：“若得权柄在手，则兵随将转，将逐符行。”（《语类》卷九十三）他为了实现自己篡权的野心，厚颜无耻地把自己打扮为“天才”。他在《贺母生朝》的诗中吹嘘自己说：“熹前再拜谢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他这个“贵人”是由于祖宗做过善事才赐予的，他的这个聪明脑袋是他阿娘给的。朱熹明明出生于福建尤溪，而他的婺源党徒却煞有介事地制造朱熹在婺源出生时“有紫气如虹自井腾上”的神话（《婺源县志》）。

“道学先生”就是两面派的代名词，朱熹最善于玩弄两面派的手段。他主张“知欲圆而行欲方”（《语类》卷九十五），强调言行不必统一，他要求“心大则自然不急迫”（《语类》卷九十五），野心要大，善于蓄谋，不必急于兑现，他强调察言观色，“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语类》卷一一二）朱熹举了一个生活事例，来说明怎样玩弄阴谋权术，他说：“譬如一盘珍馐，五人在坐，我爱吃，那四人亦都爱吃，我伸手去拿，那四人亦伸手去拿，未必果谁得之。能恁地思量，便自不去图。古者权谋之士，虽千万人所欲得的，他也有计术去取得。”（《语类》卷一一二）珍馐我是要吃的，权我是要抓的，但是要讲手段，要比别人吃得多，要比别人抓得快。这就是朱熹道学的阴谋权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朱熹装着反佛的姿态，大骂佛家学说是“破瓮破锅”（《语类》卷一二六），骂声还未结束，他就大量偷盗禅宗（佛教的一个派别）的论点以充实他的理学。他明明是一个窃权大盗，但每当召他入朝做官，却又是召必辞，扭扭捏捏地表演一番，每辞一次，就抬高一次身份，提高一次官职，然后再去上任。他是一个利欲熏心的贪官赃吏，但他又能够恬不知耻地骂：“某见此等人（指贪污受赃者），只与大字面配去！（意指脸上刺字）”（《语类》卷一〇七）他在高唱“正心诚意”的同时，却抢人山地，挖人祖坟，霸占尼姑，隐瞒“诸子盗牛而宰杀”的丑事（《四朝闻见录》）。真是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朱熹玩弄圆滑的阴谋，又岂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当时，就有人看出朱熹是“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史·郑丙传》），“道学权臣，结成死党，窥伺神器（权）”（《朱子年谱》）。连朱熹的门徒傅伯寿也骂他：“大逊若慢，小逊若伪。”（《婺源县志》）明代法家李贽剥开朱熹的面纱，骂道：“真个道学，脸皮三寸！”（《世说新语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勾划出了这个阴谋家的脸谱。

祸国殃民的投降派

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每年向北方金族侵略者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和贡绢二十五

万匹，以换取轻歌曼舞、花红酒绿的“儿臣”苟安生活。当时，活跃在大江南北的农民“义军”，不断地打击侵略者和汉奸伪军。“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广大劳动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可是，朱熹这时却密切配合投降路线的反动宣传和卖国活动。

朱熹及其一伙别有用心地借《中庸》来宣传投降主义。他在注释《中庸》时，以“不偏不倚”来掩盖“和为贵”的投降政策实质。对北方金族占领中原国土，烧杀掠夺的侵略行径，则大讲“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的“君子”“长者”风度。他还极力赞扬汉奸卖国贼秦桧为“端人正士”。朱熹经常带着一帮门徒游山玩水，到处推广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却从不号召人们抵抗侵略者。清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颜元气愤地指出，这是企图“变天下之人……为弱人、病人、无用之人”（《存学篇·理性评》）。

朱熹的主和言论，势必引起主战派的驳斥。当时，主战派陈亮曾多次与朱熹辩论，批判了朱熹“举一世而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的投降哲学。结果，朱熹咆哮如雷，鼓动他的党徒通过各种渠道来中伤打击陈亮，诬蔑陈亮动机不纯，是“计功谋利之私”，是“利欲胶漆盆中”。最后，朱熹赤膊上阵，大打出手，在孝宗面前，诬蔑陈亮的意见是“功利之卑说”，“私替（音袭）之鄙态”，攻击陈亮“所盗者皆陛下之财”，“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宋史·朱熹传》）。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打击爱国的陈亮学派，导致陈亮三次被捕下狱，几乎丧失生命。

在《朱子文集》里，有时也能看到几句“御敌”的词句。但一旦要他上阵杀敌，这个高唱“汉家原有中兴期”、“语及国势不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的伪君子，就完全换了腔调，说：“区区东南，事有不可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朱子文集戊申封事》）恩格斯说：“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朱熹追求的目的就是苟安、妥协、投降，“只欲修茸小文字，以待后世，庶小补于天地之间。”（《朱子文集与吕伯恭书》）所谓“后世”究竟是指哪个朝代？不也可以解释为向金族侵略者献媚眼、当儿皇帝吗！果然如此，光宗绍熙四年，宋使自金回朝，带来金族皇帝完颜璟的口信，询问朱熹还在不在？身体如何？任何官职？（《婺源县志》）敌人如此指名道姓地关心朱熹，足见朱熹的投降言行，是完全迎合金族侵略者的侵略意图的。事实是一面镜子。南宋灭亡后，大批理学党徒纷纷投入元帝国的怀抱，把乌纱帽换成大红罗帽、顶有金十字的“罽罽”（音古）帽。元朝右丞相都总裁脱脱主编、南宋理学先生参加编纂的《宋史》，特地为那些崇拜儒术的汉奸们写了《贰臣传》，这正是对朱熹理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妙讽刺。

毛主席说：“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朱熹是一个反面教员。对朱熹的批判，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林彪吹捧朱熹的罪恶用心，认识那些两面派们所玩弄的共同手法。

沈括和王安石变法

晓 宛 翟 海

北宋时期的沈括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他和王安石并肩战斗，积极参加了王安石变法运动。明代李贽曾把沈括与商鞅、韩非、晁错等著名法家代表人物一起列入《藏书·名臣传》，对沈括在变法中所作的贡献大加赞扬，多次加批语：“妙”、“妙”，对沈括在变法失败后仍然拥护新法的坚定态度更为赞赏，提笔批了四个字：“大是，大是”。

但是，过去人们往往把沈括只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对沈括参加王安石变法没有给以足够的估价，避而不谈他对待法家路线的态度。其实，沈括的科学成就是为新法服务的。顽固派蔡确曾诬劾沈括，罪名是“朝廷新政规划，巨细括莫不预”。从反对派的攻击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沈括不仅参加实施新法，并且做了大量工作。

王安石变法集团继承了先秦法家以“农战”为“治国之要”的思想，对内强调用法家经济思想重新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财产和发展农业经济，对外主张抵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反对屈辱投降。沈括在贯彻实施这两大任务中都起了积极作用。

沈括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比较重视农业。他主张积极兴修水利，认为这是发展农业的一条根本措施。早在他担任沭阳县主簿时，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作，筑成了百渠九堰，开辟良田七千多顷。在担任宁国县令时，又参加了万春圩的修筑工程，组织开垦了一千二百多顷土地。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沈括积极推行《农田水利法》等政策，以他的亲身实践活动驳斥顽固派的攻击和污蔑。当时正在动工兴建一项汴河疏浚和淤田的水利建设工程，这是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重点项目，因而遭到顽固派的百般阻挠。他们以“兴役扰民”为借口，胡说什么“淤田多侵民田屋宇”是“横费生民膏血”。沈括为了反击顽固派的造谣诬蔑，使工程能顺利进行，在一〇七三年（熙宁五年）接受了治汴任务。他一路视察沿汴淤田，用大量材料说明，正是由于汴河二十年来没有开浚，才严重影响到汴河两岸和京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疏浚汴河并利用挖出的淤泥改造农田，不是什么“扰民”。沈括的调查驳斥了无稽谣言，为战胜顽固派提供了有力的事实根据。在测量汴河地势时，沈括还采用了地面高下测量的新技术，这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的测量结果对后来治汴工程的设计和兴建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一〇七三至一〇七四年（熙宁六年至七年），全国各地发生严重旱灾，灾区人民典屋卖地，流离失所，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当时，顽固派的黑干将冯京指使郑侠画了一张《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胡诌这是王安石颁布实施新政的结果。一时之内，谣言纷纷，顽固派公开喊出了“去安石，天乃雨”的口号，把天大旱说成是老天对王安石变法的惩罚。王安石为了戳穿骗人的“天命论”，捍卫变法革新路线，极力保举沈括前往受灾较重的江浙一带去考察新政实施效果和贯彻“青苗法”。沈括到了灾区后，不分昼夜地筹划兴修水利工程，利用贮存的青苗钱来招募饥民兴修常州、润州的水利，组织苏州、秀州的民工开浚松江，并在苏州筑岸围田，在温、台、明等州兴筑堤堰，围垦东部近海的土地，召人耕种。由于沈括认真贯彻执行王安石的新法，对于胜利地战胜当时当地的干旱起了一定的作用。

沈括十分重视劳动力的使用，主张“治世之民，无职则耕，未有无事者”，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投入农田生产，才能使“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他这样做的结果，由于农田水利的兴修，耕种面积扩大，劳力得到合理使用，扭转了北宋农业生产停滞状态，使生产得到一定发展。

沈括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还提倡节省财用，他说：“人之情无节则流，故长幼贵贱，莫不为了节制。”在变法前夕，王安石发起改革郊祭制度，节省开支，减轻负担。沈括立即踏实地考察郊祀礼制沿革，写成《南郊式》一百十卷。当时按照宋代的制度，皇帝每三年要举行一次盛大的“郊祭”典礼，以祭祀天地，每次都要兴师动众，大兴土木，耗时耗力，十分浪费。经过沈括改革的新制度，每次所省费用就在银子万两以上。

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北宋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无论是汉族反动统治者压迫少数民族，或者是少数民族反动统治者压迫汉族，都应一律予以反对。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目的，不仅在于改革内政，而且也是为加强边防，实行对辽、夏作战，反对民族压迫。沈括身体力行地贯彻执行了王安石抗战自卫的路线，在实行军事改革、出使契丹、守卫边防几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要不要实行军事改革，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积极做好战争的准备，是当时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

北宋的顽固派承袭唐代的募兵制度，又片面发展了“养兵”政策，军队平时不训练，纪律松弛，将官不懂阵法，兵士懒散成习。战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号令不能相通”，一触即溃。为了改变这种腐朽落后的制度，沈括积极加强军队建设，认为强兵的关键所在是“兵精粮足”，平时要严加军事训练，要养成士兵习惯于山川劳苦的生活。与此同时，还需加强地方武装。早在沈括察访两浙期间，就曾推行义勇、保甲制度。公元一〇七四年（熙宁七年），奉命察访河北边防时，便着手将河北居民组织起来，进行军事编制，根据民族的传统和擅长进行训练，使整个河北西路增添了百万边兵。沈括还注意提高军器的产量和质量。在他兼管军器监工作时，认真研究阵法、城防、兵车、兵器等军事理论和军事技

术,编集成《修城法条约》和《边州阵法》两部军事著作。他在军器监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坚甲、强弓、利箭、兵车等军器产量成倍增长,质量显著提高。他还特别重视当时的新式军器神臂弓的生产,认为它“最为利器”。这种军器,直到南宋时,还受到人们的赞美。

此外沈括还重视加强边防守卫工作,他说:“我日夜研究那几项是边防上向来疏忽的,应当事先对它作好准备。”由于沈括平时重视战备,因此在一〇八〇年(元丰三年)反击西夏农奴主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处处主动,取得了德靖、顺宁、葭芦寨等战役的胜利,大破党项(夏)之众七万。

在受到外来民族侵犯时,敢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原则,维护民族尊严,这又是当时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〇七三年,我国境内东北部契丹族的反动统治者,派使臣向北宋王朝无理要求重新划定边界。北宋的顽固派胆小如鼠,竭力宣扬一套卖国求和的投降哲学,卑怯地提出“不如趁其来求而与之”,甚至将坚持原则、维护领土主权的斗争,诬蔑为“窃人之财”。为了粉碎敌人的攻击,沈括对于地理形势、历史档案作了详细的调查和钻研。一〇七五年(熙宁八年)三月,他接受了出使契丹的任务。临行前人们为他担心此行会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沈括本人却泰然处之,说:“我所忧虑的,是我的才能智慧不足,担当不起压制敌人凶焰的重任罢了,个人生死祸福是应当置诸度外的。”他到达契丹后,针锋相对,争辩不屈,有理有据,终于胜利归来。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沈括不仅为贯彻王安石变法路线作了大量工作,而且在变法失败后态度始终比较坚定,这在变法集团中是难能可贵的。

在整个变法的进程中,由于各人地位不同,利害不同,参加变法的动机不同,革新派的队伍也在不断变化。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象吕惠卿这样的人,虽然在变法运动中一度起过显著的作用,但由于有着极为严重的个人野心,是个“忌能好胜不公”的人,他为了在革新派内部形成以他自己为核心的小集团,排斥异己,拉拢亲信,最后发展到和地方官僚、豪绅勾结起来攻击王安石,反对变法。又如象曾布,在反变法联盟猖獗气焰的冲击下,动摇变节,重复反对派论调,甚至同倡议设施市易法的魏继宗结合起来,一道反对市易法。至于那种“脚踏两头船的”,或者为了过官瘾而附和变法的,更是大有人在。在变法集团内部,真正坚定的只是极少数。当变法失败后,王安石被罢去宰相职务,新政一一被推翻,攻击、谩骂新法的纷纷而起,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而沈括面临逆流,仍然不绝口地赞美新法,一针见血地指出:攻击新法的是一些“特士夫与邑居之人”,至于一般老百姓是不会反对新法的。一直到他被贬谪后,在晚期所写的《梦溪笔谈》一书中,同样坚定不移地表达了对王安石的颂扬。

三

沈括之所以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成为王安石的有力助手,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沈括生活的北宋,正是封建生产关系趋向腐朽没落,北宋王朝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当时土地兼并的风气极为盛行,当权的官僚大地主“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指官僚大地主),占田无限”,被霸占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但他们仍然“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妄图随时攫取自耕农和中小地主阶层的土地。在阶级矛盾日趋激烈的同时,民族矛盾也发展起来了。在我国境内东北部的契丹(辽)和西北部的党项(夏)的奴隶主贵族,不断对北宋封建王朝进犯和掠夺,“俘掠人民,焚蕪庐舍”,致使“农桑废业,闾里为墟”。北宋的官僚大地主集团在同辽、夏的斗争中,一贯采取了妥协投降政策,屈辱的“澶渊之盟”后,北宋王朝每年要送给辽的奴隶主贵族十万两银子,二十万匹绢。仁宗时又增加到二十万两银子,三十万匹绢。西夏的奴隶主贵族看到北宋王朝软弱可欺,多次向宋王朝发动侵略战争,迫使宋王朝每年送给西夏七万两银子,十五万匹绢,三万斤茶叶。这笔名曰“岁赠”、“岁赐”的巨额卖国赔款,都落在广大人民的头上,形成“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十室灾八九”。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社会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促使地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一批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人物,不满官僚大地主集团的昏庸无能,主张变法,反对兼并;主张抗战,反对投降;主张发展农业,反对破坏生产的高利贷。一场变法反变法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沈括就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参加了变法活动。

沈括参加变法运动还有其阶级根源。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出自寒门”,“黜陟自首”。从二十四岁起做过多年低级官吏,到过江苏沭阳、东海、安徽宁国、河南淮阳等地,受到官僚大地主集团的排挤和打击。阶级出身使他比较容易接受法家路线的影响。在沈括的著作中,曾赞同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称为“天下之法”,“书之为理无以复加”。在他执行新法的实际活动中,也继承了这种思想。如沈括在负责司天监时,敢于罢免六名“皆承世族”的历官,起用平民出身的历算家卫朴,就是一例。

沈括对新法的态度还与他的经历有关。沈括一身中比较多的时间接触实际,他重视考察研究,“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他不象其他地主阶级士大夫一样,关起门来死读孔门经书,却“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界这一活书”,读北宋社会实际问题这一部活书,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生活。

当然,沈括终究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他的社会基础是十分狭隘的。他的阶级出身决定了他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正如他在《梦溪笔谈》一书自序中说的那样:他害怕以文贾祸,因此“圣谟国政,及事近官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

通过对北宋沈括这个历史人物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家人物及其思想、活动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产物,在历史上是起了一定进步作用的。我们应该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地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中汲取有益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

评《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

司徒·李

《皇明通纪》，又名《皇明从信录》，是明代嘉靖年间陈建辑著的一部编年史书。这部书，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一再焚毁，各官家书目不予收录，一向不被史学家们重视。《皇明通纪》上有李贽的批点也几乎不为人们所知。通过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本埋没了三百多年的著作才被重新发现。

《皇明通纪》的作者陈建，广东东莞人，曾做过知县等小官。后辞官回乡从事著述，主要著作有三部：一是《学菴通辨》，突出反映了他的理学观；二是《治安要义》，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三就是《皇明通纪》，记述了从朱元璋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创建朱明王朝到嘉靖年间两百余年的历史（后又由袁黄和卜大宥续辑至万历元年）。陈建和续作者通过这部史著，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史实作了大量记叙，发表了许多独到之见，是当时一部触及时事的现代史。这部史书出版后，为李贽所重视和赞赏。李贽在仔细阅读、研究时作了大量的批点，有的是提示原文要点，有的则是借题发挥，直抒政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尊法反儒精神，可供我们从中了解明朝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一、主张“天下混一”，反对分裂割据

朱元璋在建立了基本上“混一天下”的明王朝之后，立即分封诸子亲族为藩王，分兵镇守各要地重镇。这些藩王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和军队武装，渐为一方霸主，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以后相沿成例，各代都有藩王割据。那些远离中央的“守土之臣”也各自为政，对中央政令往往“视为虚文”，加上朝廷中顽固派官僚的结党营私，上下勾联，致使内战祸乱迭起。民不聊生，工商受抑，中小地主阶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因此象李贽这样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痛感只有国家得到巩固的统一，人民才能有安定的生活，社会经济才会有所发展。他在批点《皇明通纪》这部当代史书的过程中，强烈地反映了这一政治愿望。

元末农民大起义，是推翻旧王朝统治的决定力量。反动的元王朝在农民起义的革命烽火中迅速崩溃。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各种反元势力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渐起了变化。农民起义的队伍逐渐为地主阶级所控制利用，“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时

间，“豪杰并起，所在割据，称名号者，不可胜数”。国家处于严重分裂的局面。广大人民在要求推翻元朝反动统治的同时，也要求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但由谁来完成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则决定于那些反元势力代表人物所采取的政治、军事路线。朱元璋始终坚持反元斗争，坚持“混一天下”，得到了当时人民的支持。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之流，虽也一度举起反元的义旗，但后来都改变初衷，割地称王，残民肥己。这是与广大人民、与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必然要遭到可耻的失败。李贽在《皇明通纪》的批点中，热烈地赞扬朱元璋的“混一天下”是“人心归附”的大业，明确地指出朱元璋进行统一战争，“命将出师，取府州县，势如破竹，人心悦服故尔”。严厉谴责陈友谅杀害徐寿辉、倪文俊，自称皇帝，是“负恩背德”的“弑主之贼”，“异日必死于太祖之手”。怒斥毫无宏图远略的张士诚之流，“反复乘乱，果似钻穴之鼠！”对方国珍等投降元朝、夹击朱元璋、破坏统一的一系列丑行给予了有力的抨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反附胡虏，何等可恶！”这鲜明地说明了他是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的。

在批点中，李贽特别把“广积粮、缓称王”等要点标出，提示注意。李贽指出：“定广积仓粮，民受实惠，此之谓民之父母”，强调“广积粮”是生活安定和统一事业的根本。他还对朱元璋宣布废除元朝一切残暴政令，告诫将士“毋妄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垤”，免除新占区农民的税粮、徭役、军需，奖励农桑，恢复生产等政策表示赞扬。并且归结到一点，说朱元璋“有汉高家法”“与一时群雄自别”，这样做了，“天下安能不混一，人心安能不归附”？

李贽在批阅朱元璋之后几个帝王的政策时，一再感慨“太祖之法”的逐渐废除，针对藩王割据的政局，强调“君权不可下移”。李贽在主张统一时，还提倡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他赞成“华夷无间”“一视同仁”的口号，主张与各少数民族平等相处，反对蒙元王朝所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联系李贽本人在云南姚安府任职时，曾反对过去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残暴统治而改革了若干弊政，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务求“法令清简”^①，“与军与夷共享太平”^②，说明李贽主张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身体力行，始终一贯。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主张“务农备战”，反对苟安卖国

李贽出生于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泉州，深知抵御外国侵略的重要。“倭寇”的不断侵扰，葡萄牙海盗的入侵澳门、广州，西班牙暴徒的残杀华侨，英国侵略者对中国的覬覦等等，使明王朝的边报日紧，边祸日巨。加上朱明朝廷权臣的通敌卖国，致使人民身被其害。李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对官僚集团中那些腐朽、苟安、祸国的顽固派有切肤之痛。他在批点中疾呼，目今“海盗势盛，同时告警，世乱如此，何能以济”？他一贯憎恶那些

① 《珂雪斋文集·李温陵传》

② 《焚书·豫约·感慨平生》

张口孔孟、闭口程朱的假道学家，“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①。痛感“今日之事，边防为急”。于是，他在批点《皇明通纪》时，以锋利的笔触鞭挞顽固派的败国，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务农讲武”，抗击侵略的政治主张。

李贽十分强调“寓兵于农”、耕战结合的法家思想。当年朱元璋曾诏令中书省实行“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的耕战政策。《皇明通纪》的作者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在“谨按”中指出：“此制不独国初可行，在今日尤可行；不独乱世可行，在治世尤可行；不独一时可行，在万世可通行无弊！”李贽十分赞同这个评说，他在批语中提纲挈领地批上“寓兵于农之意”。着重指出：“且耕且守，是为兵法”、“文事武备，不可偏废”、“务农讲武，不可偏废”等等，并且针对当时农废兵弱的情况，责问：“今胡为不然？”对顽固派官僚集团表示了极大愤慨！

李贽还特别重视“屯田备边”。他说：“备边莫善于屯田”。洪武年间，有人向朱元璋上守边策，建议沿着边境实行“屯田”，构成一条牢固的防御线，“彼此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李贽对此予以热情赞扬，批曰：“言言入骨，语语经略，有古者寓兵于农之意。圣子神孙，舍此无以为策矣”。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边境屯田，且耕且守，并不许擅差屯田军，妨其务农。李贽对此十分肯定地指出，这是“成祖立法之妙处”。

在“屯田备战”中，李贽特别强调“练兵”。他认为“防边止有战守两策”，平时不仅要屯田，更要重视“练兵”，必须做到能战能守，“操练以备不虞”，“有备斯无患”。李贽对那些顽固派取消边防、投降卖国的无耻行径十分痛恨。例如嘉靖年间，边警频传，烽火不息，外祸日益严重。但严嵩之流却把鞑靼贵族的侵扰说成是“此抢食贼耳，不足患”。对此，李贽怒斥道：“嵩之胡说甚矣！”“闻嵩十恶之罪，烧灰研末未为过！”并斥责仇鸾、严世蕃等败类是“枭首没资，不足赎国家之罪”！

李贽在怒斥投降卖国行为的同时，十分缅怀那些英勇抵抗侵略、保卫祖国安全的将士军民，并给予热烈的赞颂。永乐十七年，“倭寇”大举入侵辽东，镇守辽东左都尉刘江，率领士卒奋勇抗击，大败“倭寇”，致使“倭寇”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敢轻易入侵。李贽十分兴奋，批曰：“寇害屏息十年，刘江之力也。”景泰元年，“北虏入朔州，大同总兵郭登……以百骑破虏数千骑”。李贽夸奖地说：“郭登战功第一，真好汉子！”嘉靖三十二年，北方俺答再次入侵辽东，守备王相率领几百名士兵英勇迎敌，在激烈的自卫战中，身负重伤十多处，倒在血泊中，最后牺牲了。李贽怀着深深的敬意，赞叹说：“一腔热血报国，至相真义士哉！”据《焚书·卓吾论略》记载，李贽三十四岁那年（嘉靖三十九年），“倭寇”入侵其家乡泉州，李贽因父死刚从南京抵家，他“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

^① 《焚书·因记往事》

及时组织了家乡人民展开反击“倭寇”的战斗。李贽抗击侵略，身体力行，不愧为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三、主张“政贵因时”，反对因循时弊

李贽生活的明代中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反映到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变法革新与顽固守旧的两种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李贽完全同意《皇明通纪》作者对当时局势的分析：“上下乐因循，惮改作；于是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废弛，日入于弊而无可复可为矣。”愤怒地说：“有天其无日矣，何成一个世道！”对当时的朝政表示强烈的不满。李贽在批点《皇明通纪》时，在“阅历世变”中发现了“强弱无常势，盛衰无定理”的事物相互转化的道理，对明王朝的政事抱着勇于革新的积极态度。他赞同陈建在《皇明通纪》“谨按”中对正统年间郭登反对改革兵制的批评，说“政贵因时，岂宜胶柱”！响亮地提出了“利当兴，弊当革”的口号。这对当时泥古不化的顽固派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李贽是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立场上主张自上而下变革的。因此，他必然首先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君主身上。他认为明王朝的宦官专政是一大祸害。因为这些宦官集团与大地主世袭官僚集团相互勾结，是变法的主要障碍，所以他竭力主张君主集权，认为“权者，人主御世之具”，不能旁落到一小撮代表顽固派利益的宦官手中。他高呼：“宦官不可使当要路”。他针对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弄权，怒斥道：“王振畜牲，恃宠弄权，累累害了多少言官，读之令人抱恨”。认为明武宗时的权宦刘瑾“变乱成宪”，“死有余辜”。李贽感到只有把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革新除弊才有成功的希望。

李贽利用批点当代史书的机会，进一步提出了“图治审于用人”和“明于赏罚”的革新主张。当时，宦官和大官僚集团曾用分亲疏、论门第、讲资格、要贿赂等种种手段在内部封官赏爵，培植党羽，排斥改革派。他们还操纵科举，搜罗走卒，堵塞出身中小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身之路。对此，李贽都一一予以抨击。他认为顽固派用马匹和粮食可以买官的措施，“决不可行”，因为“今日既以财进身，他日岂能以廉律己”？《皇明通纪》的作者对用人问题有一段议论：“进士未必优于举人，举人未必优于贡生，进士、举人、贡生之外，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惟试之以事而后可见，贵乎能察识而超拔之”。还说用人的方法，应该是破格提拔（“超升”）、长期任用（“久任”）、不讲门第出身（“不拘流品”），“三者不可缺一”。以往“三者咸备”，而现在是一样也不用了。李贽对这一番议论十分赞许，批曰：“三者不可缺一，知政品也。”

李贽对凡是提出革新政治的建议，或者采用某些革新措施者，都一律予以肯定和赞扬，认为“大有利于民”。由于《皇明通纪》只写到隆庆六年，而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稍后的事，因此在李贽批点中只提到“张居正条上六事”，未有更多的评语。但李贽对当时局部地区已经推行的也是后来张居正全面推行的“一条鞭法”（赋税徭役合一征

派的货币地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条鞭法,万世之良法,民之感德也不浅”。由此可见,李贽对张居正改革抱着积极肯定的态度。事实上在张居正死后,李贽还深深怀念着他。说:“江陵(张居正)宰相之杰也。”^①“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②

恩格斯指出,“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李贽,在批点《皇明通纪》中对当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起了剥去封建制度身上那一层神圣外衣的作用。而李贽的进步政治思想,也就在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中不断形成和发展。李贽在批点中抒发的政治见解以及《皇明通纪》中陈建的论述,有许多已被写入《续藏书》中。在《续藏书》的《开国诸臣缘起》和《开国诸臣本根》中,两次提到陈建,并引用了《皇明通纪》的观点。应该指出,在《皇明通纪》及其批语中,尊儒的内容也是相当多的,这些是李贽思想中的糟粕,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皇明通纪》上的批语对于我们研究李贽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一份重要的资料。

李贽批点的《皇明通纪》的产生和后来的遭遇,反映了明代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陈建的《皇明通纪》问世后,立即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当时社会上流传很广。但这种触及反动统治集团黑暗内政的“乱书”,刺激了那帮孔孟之徒的神经。在隆庆年间,顽固派李贵和即以陈建是一个“草莽”,擅自使用“列圣实录”,编写国朝历史,“臧否时贤”,“荧惑众听”,“为国之害非浅”^③等罪名,上书明穆宗加以禁毁,并责令国史馆不得引用。然而,李贽十分赞赏陈建的《皇明通纪》,收藏此书后,用心加以批点,使其进步倾向更加明显。这部着重记述明代政治、军事的“野史”,在许多地方是那些“状元宰相”所修的“涂饰太厚”^④的“正史”所远远不及的。它虽经明清两代统治者一再禁毁,但是上禁下流,越禁越流,以至版本竟有十九种之多,并流传到海外。李贽批点的《皇明通纪》,当时就在苏州阊门刊印,并且流传到日本。这次发见的本子就是日本元禄九年(一六九七年)翻印后再传回到我国的。显而易见,《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敢于对旧社会进行揭露,大力提倡法家变革思想,推动着人们对那个社会产生怀疑和不满,为新时代到来进行了必要的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这部作品,虽然被孔孟之徒横加诋毁,但是真理的光辉总是遮不住的。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它终于受到人民的重视,这也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过程中的一个可喜的收获。

① 《焚书·答邓明府》

② 《焚书·答陆思山》

③ 沈德符《野获编·焚通纪》

④ 鲁迅《忽然想到》

论商鞅的国家观

——读《画策》篇

邱荣其 康伟 李爱娣

《画策》是《商君书》中一篇十分重要的政治论文。它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以杰出的法家商鞅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观,肯定了革命暴力的进步作用,论证了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必然性,为新兴地主阶级用革命暴力摧毁奴隶制,建立和巩固封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国家的问题,始终是各个对抗阶级争夺的中心。“因为这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列宁《论国家》),它牵涉到各个阶级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

春秋末年,在奴隶起义的狂飚巨浪的猛烈冲击下,奴隶社会土崩瓦解,新的封建制代替旧的奴隶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当时,关于国家是怎么起源的?国家制度是否变化发展?奴隶主与奴隶有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奴隶主们拚命鼓吹“王权神授”的天命论,宣扬“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吹捧周天子是天的儿子,受上天福佑,负有取得政权的使命,因而他的统治是不可动摇的。奴隶主的代言人孔老二面对“礼崩乐坏”的大变革局面,把历史看成是一代不如一代,大肆鼓吹倒退的历史观。他把国家归结为“大同”、“小康”和“乱世”三个发展阶段,疯狂诅咒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是“无道”,是“乱世”;而志在恢复夏、商、周“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其目的,就是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广大奴隶是埋葬奴隶制国家的掘墓人,他们在斗争中首先批判了奴隶主阶级的国家观。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就曾以震荡山河的磅礴气概,点着孔老二的鼻子,指出他的一套什么“天命”、“天国”、“天子”,全是骗人的花招。他认为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古者禽兽多而人少”,到了“神农之世”,人民“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发展到黄帝以后的时代,才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局面。柳下跖看到奴隶制国家已经气息奄奄,必将由新的国家制度取而代之。他是我国第一个用历史发展观来论述国家起源的人民英雄。

历史演进到战国时期,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作为当时新生产关系的代表,在韩、赵、魏、齐、秦等国相继夺得胜利。它有力地粉碎了奴隶制国家永恒不变的神话。在国家起源和演变问题上,孟轲一面叫嚷奴隶主国家是“天与之”,一面又拚命攻击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他把商周奴隶主专政作为理想国,哀叹今不如昔,狂叫要“法先王”。与儒家相反,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革命家,身处时代的革命浪潮中,奴隶起义所引起的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曲折地反映到他的头脑中。他对社会进行观察、总结,突破儒家的陈腐学说,在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画策》篇正是反映了他在国家起源问题上的新看法。

商鞅勾画了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发展阶段,在遥远的太古“昊英之世”,人民少而树木野兽多,所以人民只要伐木杀兽就可以维持生活。这里说的是原始社会早期依靠狩猎生活的情况。当社会进入了神农氏时期,“男耕而食,妇织而衣”,不用刑法就可以治理,不用战争就能产生出首领“王”来。这里说的是原始社会晚期农业生产发明以后氏族公社制的情况。当时生产力仍然很低,还没剩余产品,尚未造成贫富的悬殊和阶级的对立。国家的产生,商鞅认为是在神农氏以后。那时,社会上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混乱局面,“乱,故求有上也”(《开塞》),为了“治乱”,就由黄帝出来,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建立了国家,建立了“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

商鞅的国家起源的学说,虽然把“圣人”看作是历史的推动者,没有超越唯心史观的范畴,也没能正确解释国家的起源,但是,他认识到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已开始看到国家的产生是由于“乱”,是由于暴力,这是很卓越的见解。从商鞅阐述的国家起源说,我们可以看出法家与奴隶起义联系的痕迹,它正是在奴隶起义的基础上,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为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的。

三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国家的本质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就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共产党宣言》)。古往今来,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总是用种种谬论千方百计来掩盖和抹煞这一点。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商鞅就比较坦率一些,他要求建立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宣称国家的职能就是对内使用刑罚,对外抵抗外侮(“内行刀锯,外用甲兵”)。他明确指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其本质就是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地主阶级专政,鲜明地反映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革命锐气和维护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的战斗精神。

“以刑去刑,国治”(《去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运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去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革命暴力,才能把封建制的国家治理好;“以战去战”,即以正义战争去反击非正义战争,才能使诸侯畏惧而甘拜下风(“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盐铁论·非鞅》)。商

鞅所以能提出“以战去战”、“以刑去刑”这个带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努力“适于时”、“恃其势”、“恃其数”的结果。当时复辟与反复辟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的现实,迫使他不能不十分重视和充分运用地主阶级专政这一“有组织的暴力”。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后,国家大权始终被昭、景、屈三家奴隶主贵族操纵。魏国因李悝变法,虽一度强盛,但不久奴隶主贵族势力抬头,社会又走向倒退。再拿秦国来说,河西大块土地被魏国夺去,“诸侯卑秦”,国内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十分猖獗,他们跳出来公开反对和破坏商鞅变法,还阴谋杀害商鞅。事实证明,复辟势力在当时各新兴的封建国家都严重的存在着,滋长着,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以战去战”,“以刑去刑”,就正好表达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革命愿望,完全是符合时代的要求。

专政的锋芒主要针对谁,这又鲜明地反映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商鞅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开塞》),国家的最紧要的事就是“去奸”。商鞅所谓的“奸”,包括“奸民”和“六虱”。他指出:“不作而食,不戢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十分明显,这种“奸民”,主要是指奴隶主贵族、大工商奴隶主、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儒家。这表明,商鞅对于当时运用革命暴力,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目标还是比较准确的。

怎样才能“去奸”呢?商鞅说:“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开塞》)商鞅一贯主张施行重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国治”、“国强”。他严惩了唆使太子犯法的奴隶主贵族公子虔和公孙贾,杀了触犯新法的奴隶主贵族祝懽,把七百多个阴谋复辟的奴隶主贵族和依附他们的反动儒生全部在渭水边镇压了,并把那些反对变法的“乱法之民”,强迫迁到边远的地区去垦荒,摧毁了这伙地头蛇的老巢。由于商鞅充分发挥地主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职能,坚决镇压复辟势力,就使他的变法得以贯彻,地主阶级专政得以确立和巩固。

然而,商鞅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对国家机器的职能的认识,对于国家本质的认识,不能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他所强调的暴力,虽然矛头主要是针对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但也包括着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镇压。他的“以刑去刑”,仍然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专政,因此,不可能对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的彻底的专政。

三

商鞅总结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复辟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认为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充分发挥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作用,关键在于“一断于法”,即坚决推行法治路线。他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定分》)。这种把法治路线看作是地主阶级政权生命线的思想,是深刻的。在商鞅以前的先驱者,都曾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如李悝制定《法经》,主张以法治国,吴起提倡“明法审令”,厉行法治。但是都没有象商鞅那样把法治提高到“命”、“本”的高度来认识。商鞅要比他的前辈站得高一些,他在《画策》中公开宣称,法治路线对于封建制来说,“为必治之政”,“本然之政”。他认为认真贯彻法治路线的好处很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

评价李贽思想上的 一些不同观点

在目前全国各报刊关于评述李贽的文章中,存在着一些不同观点,我们对此进行了归纳,供大家深入研究时参考。

(一) 关于李贽的阶级属性问题

在分析李贽的阶级属性问题时,大家虽一致认为李贽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李贽的思想中是否反映和代表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许多文章有着不同的分析和论述。

一种意见认为,李贽是“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阶层”的“进步思想家”。苏振元在《略谈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一文中认为,李贽“是我国历史上反封建思想的先驱之一”,“李贽的思想正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时期的市民阶层的新思想,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李贽的一生是反孔、反理学、反封建的一生,表现了敢于冲破孔子传统思想的反潮流精神”(《浙江日报》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刘蔚华在《李贽与尊法反儒斗争》一文中说,“李贽所进行的尊法反儒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有破坏封建制度的性质,成为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具有一定民主主义因素的反封建理学运动的先驱。”(《破与立》一九七四年第三期)傅恩《论李贽的尊法反儒》一文指出,“李贽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制度日益腐朽,败落,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代。……特别是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在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孕育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萌芽,从而使当时城镇市民阶层产生了新的政治要求,逐步形成一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束缚和摧残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市民运动。”“李贽在这种极其黑暗和险恶的社会环境里进行战斗,……‘剔肤见骨’地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这正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时期市民阶层的新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解放日报》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

另一种意见认为,李贽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萌芽是很微弱的,李贽“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一员”,是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樊树志的《论李贽》一文中指出,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

从”。其气势如同黄鹄(天鹅)高翔,“一举千里”,良马疾驰,“日走千里”,猛兽勇鸷而无敌。相反,“国无明法”,奴隶主贵族就会为非作歹,国家就会遭到“重乱”,出现亡国亡身的悲惨情景。

商鞅还认为,用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来代替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礼治路线,是“必然之理”,是符合我们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的,“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孔丘死抱着“礼治”不放,孟轲鼓吹“仁政”,虽然说法有所不同,但都是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路线,目的无非是为复辟奴隶制制造反革命舆论。奴隶主阶级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对于新兴的地主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为了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需要,商鞅明确提出以法治路线作为衡量国家治理好坏的标准。他说:“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言、行、事”都要以“法”作尺度,正是对孔丘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尖锐批判。

国家的性质是由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决定的。国家的阶级关系变了,法律的原则也必须相应地变化。商鞅在他的言行中,强调遵守“信赏必罚”、“刑无等级”的原则。他说,“赏厚而利,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修权》),即使是疏远的人,有功也必赏,而亲近的人,有过也必罚,“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赏刑》),公开宣布对敢于违法的奴隶主贵族要实行坚决镇压,这就否定了奴隶社会“刑不上大夫”的制度,以保证法治路线的推行。

商鞅这些思想,对以后法家影响很大。荀子就曾痛斥孟轲的所谓“仁政”是“呼先王以欺愚者”。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从历史和现实的事例中,论证了“仁义”“孝悌”等奴隶制传统道德是“败法”“乱政”“弱国”的祸根,戳穿了儒家“仁政”“德治”的伪善调言,并在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法治理论体系。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奋六世之余烈”,坚持了商鞅的变法路线,并把韩非的国家观一一付之实践,毫不犹豫地镇压了奴隶主贵族篡权复辟的叛乱,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事实证明:一种新的国家的产生,旧的国家的灭亡,没有革命暴力的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代反动派都是一脉相承的。大叛徒林彪把孔孟的“仁政”“德治”奉为至宝。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正当全国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他躲在阴暗角落里,胡说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一伙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暴政”等。他们的这种拙劣表演,从反面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革命人民的护身法宝,党的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线。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本文作者是上港三区、上海铁路分局列车段、
上海开关厂的青年工人)

毕竟是一种微弱的经济因素，它不可能也没有改变当时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李贽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作为地主阶级中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的阶层的思想代表，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尽管“他敢于指名道姓地批判孔、孟，抨击当权的理学家”，“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没落，使他不可能找到封建社会的任何出路，找不到什么新的思想武器，不能不打着儒家旗号来反对儒家。他既要反对儒家，却又不想从根本上否定儒家，他批判了现存制度的弊端，却提不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它。徬徨，徘徊，只能到佛经中去寻求解脱。”“不可能再表现出地主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时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文汇报》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李贽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的要求”。陈本铭在《李贽反封建道统的教育思想》一文中认为：“李贽是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是从儒家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叛逆’者”，“他的思想比较接近下层群众。……他同情商人，赞扬梁山泊上的英雄好汉，表明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群众和市民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福建师大》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天津日报》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李贽》一文也认为：“李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庆思在《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一文中分析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社会阶级关系，并且指出：“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城市市民也开展了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在思想领域中，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在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不满现状，要求变革的进步分子，他们大胆地叛离封建正统思想，要求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李贽能够对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进行全面的批判，对法家学派进行高度的赞扬，在反儒和尊法两方面，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他的前辈的进步思想家，这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上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是紧密相联的”，“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的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三日）

还有的认为李贽是中小地主和新兴市民这两个阶层的代表。叶显恩在《略谈李贽》一文中分析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并且着重分析李贽的家庭和当时社会对他的影响：“李贽的家乡福建泉州，当时就是一个商业发达、通海外诸国的重要港口。海外商人云集泉州，然后转往内地。李贽的祖宗几代都是从事航海经商活动或担任通译、出使等职务，常到日本、琉球及南洋各地，最远曾到亚洲的西部。到了李贽的父亲才转以教书为业。李贽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中小地主兼工商业的家庭里。李贽是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高举尊法反儒的旗帜，向以严嵩、耿定向为代表的孔学、理学展开斗争的。”（《南方日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二）关于李贽的哲学思想

这个问题也有较大的争论，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

1、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钟闻声的《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和斗争精神》一文指出：“李贽建立起来的朴素唯物论和进步的平等观，也是对儒家鼓吹的‘天才论’和‘天命论’的有力批判。”（《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彭骏写的《李贽尊法反儒的战斗精神》也讲到：“他虽有某种唯物主义倾向，但他没有也不可能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境界。”（《广东师院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天津日报》《李贽》一文中指出：“李贽还从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理学。他专门写了《夫妇论》，驳斥理学家把‘理’说成是造化天地万物主宰等谬论，李贽认为，天下万物都是由天地结合产生的，……这说明李贽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天津日报》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

2、认为李贽具有“相当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厦门大学历史系写作小组认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得李贽思想中带有许多局限性”，他“带有相当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他主张思想自由，独立思考，但又否认真理的客观性，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坑中。”（《福建日报》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黄冈地委大批判组的文章《李贽对反动孔学的批判》也认为，李贽“用以反对孔孟唯心史观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唯心的。他的《童心说》，固然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但是却提不出一个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的是非标准来，最终却不能脱离主观唯心主义的轨道”。还指出：“他又看不到任何出路，企图从佛教的‘册籍之中’找到答案，因而求助于‘菩萨’的‘智慧’，‘观照到无所得之彼岸’。李贽的本意，是想从佛教的角度来论证人人平等，争取个性自由，来反对孔孟之道。但是，踏着佛教这座神秘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杂伴搭起的独木桥，怎么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呢？”（《湖北日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九日）福州二化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和福建师大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在注释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也说李贽“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和佛学的影响，思想上也有着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福建师大》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3、还有的认为李贽思想最终“陷入了二元论”。叶显恩认为，李贽“一方面提出了朴素唯物论的观点，肯定了世俗的‘此岸世界’的真实性，一方面又摆脱不了唯心主义的束缚，企求玄妙的‘彼岸世界’的所谓真空，陷入了二元论。他对孔学、理学的批判，对法家和秦始皇的称颂，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既不彻底，也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这同李贽所处的封建社会没落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小地主、工商业者阶层密切相关。这个阶层对维护封建制的孔学具有矛盾的态度，当他们受到大官僚地主压抑时，有反对孔学的宗法等级制，主张平等的要求，但他本身也是剥削者，同孔学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的思想充满矛盾，陷入了二元论的阶级基础”。（《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延青整理）

从项羽的杀降政策谈起

徐国芬

项羽此人历来不讲政策，动辄杀降。公元前二〇六年，他所率领的楚军在巨鹿、漳水、泜水一带击败秦军，秦将章邯率二十万秦军降楚。项羽怕秦军至关中谋变，便先下手为强，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一夜之间把二十万秦军全部坑杀于新安城南。象这样血腥的杀降事件，项羽一手制造的还有好几起。如，攻襄城，襄城男女老少都遭到活埋；进咸阳，咸阳就成了一片火海。总之，项军所过，留下的便是焦土一片，尸骨遍野。

项羽的杀降政策，是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和垂死挣扎的表现。但也正是这种反动的杀降政策，造成了项羽在楚汉相争中的彻底失败。分析一下刘邦和项羽这两个政治集团在楚汉相争中对待俘虏的不同态度，可以从中看出政策对于斗争的成败的重要性。

在楚汉相争中，对于刘邦和项羽这两个政治集团来说，“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除了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而外，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项羽的杀降政策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造成了失去人民群众支持的恶果。秦朝的降卒大都是由“秦子弟”、“黔首”、“闾左”（贫农）乃至“骊山之徒”（奴隶）所组成。他们有的是秦朝地主阶级的子弟，有的是获得自由的农民，有的是被赵高复辟政权强行征发来的奴隶，因而和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关中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虽投降楚军，但深怨“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情绪不能稳定。因此，如何对待这些人，不仅关系到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关系到人心的背向。项羽把三十万秦卒坑杀，唯章邯等三将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再加上血洗咸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烧其宗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直接引起了秦民的恐惧和仇恨，以致关中家家户户都和项羽结下了一笔血泪帐。这样，项羽杀降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实际上“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以致在关中地区，项羽根本无法立足，不得不东归彭城。楚汉战争中，项羽亦始终只是孤军奋战，只靠江东八千子弟兵去东征西战，经常弄得兵疲食尽。因此，项羽的杀降政策，“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政策。

同项羽杀降的残暴政策成鲜明的对比，刘邦从地主阶级统一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对秦朝的降官、降卒都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政策。刘邦起兵后不久，将宛城重重包围，秦守令急得要拔剑自杀，有个叫陈恢的舍人忙劝阻说：“沛公待人宽厚，不如开门投降”，并自告奋勇去见刘邦。果然，刘邦听了他的建议，受降宛城，并封秦守令为殷侯，仍然留守宛城，而且招集宛城人马，引与西向。一路上，许多城邑在宛城事件的影响下，“争开门而待”，无不迎降。结果，刘邦长驱直进，很快就攻破了函谷关，进入咸阳。进入咸阳后，刘邦不仅坚持不杀投降了的秦王子婴，而且与秦民约法三章，封府库，闭宫室，杀人处死，伤人抵罪，不准“有所侵暴”，不得骚扰居民。东征时，刘邦又明确规定，秦朝“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这一系列正确对待敌人营垒里各种人的政策，使军力和人心的对比都朝着有利于刘邦的方面转化，有力地促进了敌人的分化瓦解，孤立了项羽一小撮反动派。刘邦大军入咸阳，关中人民欢欣鼓舞，“争持牛羊酒食献饷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因此，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始终能以关中根据地作为坚强的后盾，运输粮饷，补充兵卒，得到关中人民的支持。尽管前方屡战屡败，但终能转危为安。公元前二〇五年，刘邦在潍水失利，汉军几乎全军覆没，刘邦仅带数十人突围。在这危急时刻，三秦人民在吕后、萧何的领导下，上至六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少年，都开赴前线，补充了刘邦的兵力，使刘邦得以重振旗鼓，“兵复大振”。最后终于越战越强，取得了胜利。楚汉相争，刘胜项败，刘邦的政策得人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一个阶级或政治集团要取得斗争的胜利，不仅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而且要有正确的政策。

正确的政策是贯彻路线的重要保证。在斗争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使斗争受到挫折，使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件和项羽的路线完全相反的杀降事件。公元前二六〇年，秦国大将白起把四十万赵军包围于长平，赵军断粮四十多天后，无力抵抗秦军，只得投降。但由于白起怕“赵卒反覆”，擅自把四十万赵军“挟诈而尽坑杀”，只放了三百四十名幼小者回去报信，这就是战国时有名的长平之战。白起杀降，发生在秦昭王时代。当时，秦国正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着地主阶级的变革，完成统一六国的事业。法家范雎的“远交近攻”的外交路线，在封建的统一战争中连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因此，白起坑杀赵军，在当时无疑是一项违背秦国正确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行动。而正是这一错误行动，使得秦统一全国的进程受到了暂时的曲折。长平之战后，赵国“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使秦军进攻赵国首都邯郸时遭到了失败。同时，“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联合五国军队大破秦兵，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秦国“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这就是错误的杀降政策所带来政治上、军事上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长平杀降的深刻教训说明，政策是路线的保证，没有正确的政策，执行正确的路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当然，一个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策归根到底是由路线决定的。长平之战后，秦国地主阶级在秦昭王主持下，吸取了这个深刻教训，迅速扭转了局面。昭王五十一年攻西周时，西周王“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向秦投降，秦昭王纠正了白起过去执行的错误政

策,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结果,“天下来宾”,大批法家客卿接踵而至,团结了绝大多数有志于地主阶级变革事业的人士,有办地分化了六国的联盟,终于到秦始皇时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至于项羽的始终坚持杀降政策,性质与白起事件不同,完全是由他的错误路线和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祖上“世世为楚将”。他的祖父项燕就是被秦始皇时的夫将王翦所杀。因此,项羽虽然参加了农民起义,但实际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思想政治上所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倒退的路线。而一切倒退的行为,又都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于是,只有靠“屠杀焚烧,恣其残酷”的暴行来达到复辟的目的。项羽的杀降政策,正是一个失败的阶级“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的产物。然而,企图用屠杀来阻止历史的前进,只能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项羽最后的结果,就只落得个孤家寡人、自刎乌江的可耻下场。

项羽的这种下场,是一切反动阶级推行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共同特征和必然结果。但杀降政策和项羽之败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最近出土的马王堆三号帛书《经法》上就有这样的话:“杀服民,(戮)降人,刑无罪,过祸皆反自及也”,说的就是要正确处理各种性质的矛盾,否则就会走向反面。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新的胜利,就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我们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而真心表示愿意改正错误的人,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而不应当排斥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这就是项羽的杀降政策从反面为我们提供的一条历史经验。

礼器和辫子

李欣

正当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以风卷残云之势摧残着赵高反动政权的时候,出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怪现象,“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遂为陈涉博士”。礼器的纷纷出笼,以孔鲋为首的儒生们蠢蠢而动,这与几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鲋之流潜伏地下,礼器与经书深藏不露,恰成鲜明对照。

礼器的“藏”与“露”,不禁使人想起鲁迅的小说《风波》中关于辫子的故事。辛亥革命把象征封建制度的皇帝从龙庭上赶了下来,为了躲过盛极一时的剪辫子风潮,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将长长的辫子“盘在顶上,象道士一般”。后来,当他一听说“辫子大师”张勋带

兵进了北京,清朝皇帝坐了龙庭,立即又放下辫子,神气活现地甩着辫子示威来。谁知道,好景不长,只不过十一天功夫,复辟的丑剧就宣告破产了,赵七爷只好又悄悄地把辫子盘到顶上,一个“道士头”重新出现在茂源酒店。

孔氏的礼器是罪恶的奴隶制度的象征,而赵七爷头上的辫子则是他“剪不断”的旧思想的体现。它们的“藏”、“露”、“盘”、“放”,鲜明地反映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礼器”事件发生在革命的高潮期间,而“辫子”事件则出现在革命的低潮时刻。但它们又都有共同点,即都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刻出现。当秦末农民起义这股革命潮流以长江大河之势来临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必有孔鲋之类的沉渣泛起;反之,在辛亥革命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却也出现了赵七爷得以放下辫子的张勋复辟事件。凡是当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各种力量必定要登台表演,反动势力自不例外。

礼器的“藏”与“露”,辫子的“盘”与“放”,并不是互不相关的孤立现象。张勋就是一个怀里抱着礼器,头上长着辫子的清朝遗老。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以后,这个念念不忘复辟变天的辫子大师很懂得辫子的重要性,不准他的虾兵蟹将剪辫子,公然叫嚣说:我们还是清朝的兵,清朝的臣,还要做清朝的事。他生怕孔孟之道这根又臭又长的辫子断了根,绝了种,紧密配合当时社会上的一股尊孔复古思潮,与保皇分子康有为、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相互勾结,煽阴风,点鬼火,甚至出兵保护孔庙孔林以及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反革命复辟总是舆论先行的。辫子引出了礼器。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终于在一九一七年的七月,张勋导演了一场短命的复辟闹剧。这出闹剧表明,只要辫子还存在,就一定还会有人把礼器重新拿出来。

毛主席指出:“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要把思想的辫子连根拔掉,就必须把武器的批判和思想的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砸碎礼器不容易,而刨掉辫子的老根又比砸碎礼器困难得多。就是礼器被砸碎了,辫子仍然会长期存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的革命,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在鼓吹“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地主阶级当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以后,就把儒家思想捧上了天。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软弱性,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武器,只能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西方,在他们的头上拖着一条半是封建复古思想半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辫子。只有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切形形色色的礼器,长长短短的辫子,都必须在扫荡之列。如果它们还有一点用处,那就是放在博物馆里,作为革命人民的反面教材。舍此而外,别无他用。

陕北“蘑菇战”

史 锋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惨遭失败，改为对我陕北、山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陕北战场上，胡宗南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妄图一口吞掉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我西北野战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根据运动战的战略原则，主动放弃延安，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央机关，在难以想象的极端艰险的情况下，坚持留在陕北，直接指挥战斗。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我军吸引了敌人的大量主力部队，消灭了敌人十万人，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并有力地支援了刘邓（刘伯承、邓小平）、陈谢（陈赓、谢富治）两支大军的战略反攻。陕北“蘑菇战”，揭开了中国革命战争史册上新的一页。

给胡宗南的鼻子穿上牛绳

一九四七年三月，延安郊外响起了胡宗南匪军进攻的枪声。

在威武雄壮的延安城墙上，刻着一条醒目的标语，八个大字在闪闪发光，“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这条标语，表现了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武装起来的延安军民，在强敌压境情况下所怀有的必胜信心。

进攻陕北的反动军队，共二十三万人，而我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的部队却只有二万余人，力量悬殊很大。但是，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就英明地预言：“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

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当着敌人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时，为了支援中原、华东战场，吸引胡宗南主力在陕北，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毛主席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将敌人拖住、拖垮，“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毛主席以革命战争史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和战士。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不放弃一寸土地的政治口号用在战术上，不管自己力量大小，和敌人生杀硬拚，这是错误的。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武装了广大军民，他们笑着说：“让胡宗南来吧！我们牵起他走，让他来爬山，陕北山高、林密、路险，等他爬够了，爬不动了，我们就寻找机会一股一股地消灭他！”

三月十九日，胡宗南以伤亡五千人的代价，由四十架飞机替他壮胆，探头探脑地爬进了延安，接着就自欺欺人地大肆庆“功”。敌人从自己的军队中挑出口齿伶俐的千余名士兵，冒充我军俘虏，让记者采访，吹嘘“胜利”。蒋介石见他这个最不中用却又最宠爱的学生打了“胜仗”，好不高兴，又是授勋，又是晋级，着实忙碌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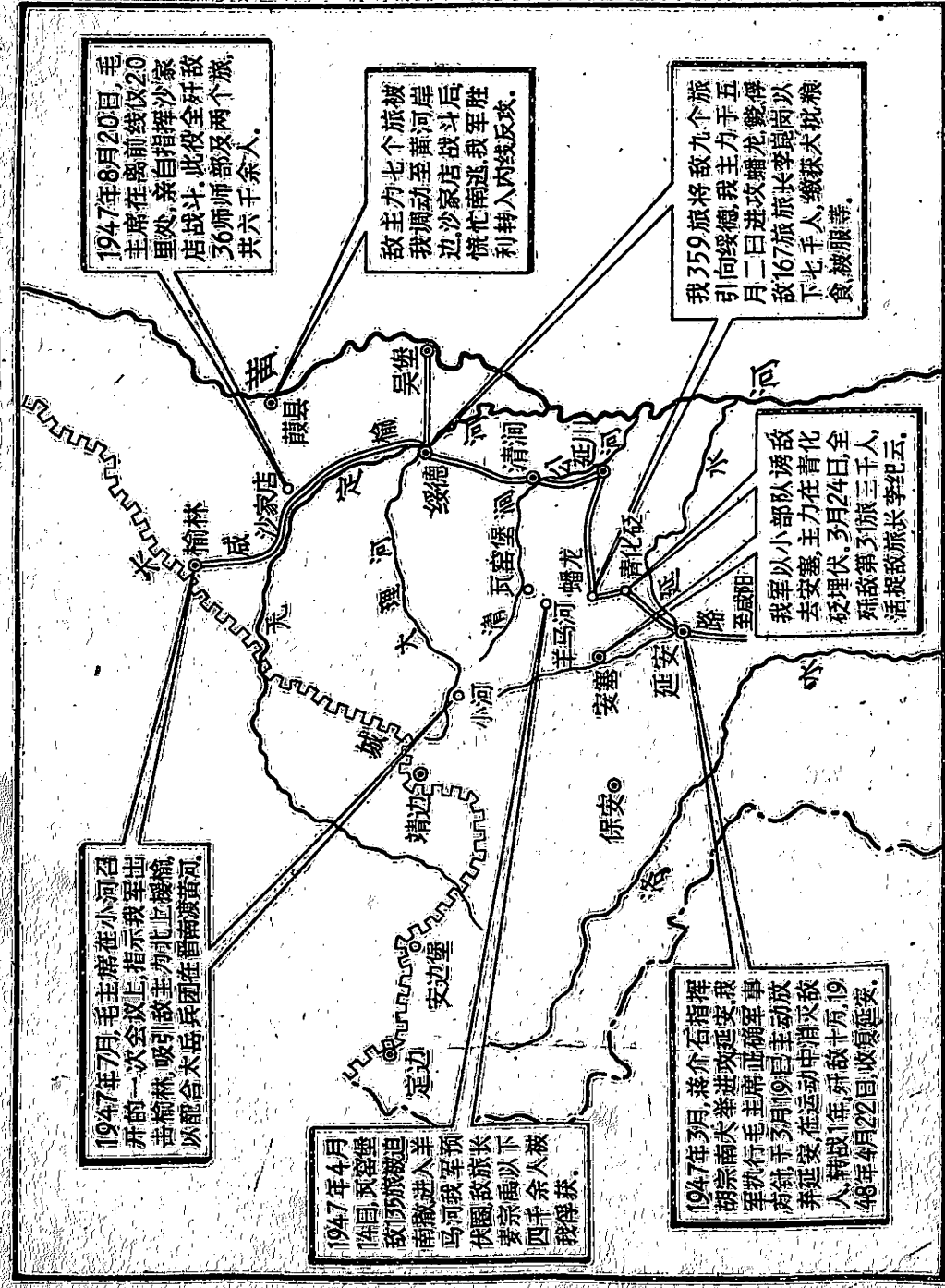
但是，就在他们大肆庆祝虚幻胜利的同时，这批狂妄的匪徒们却不能不暗自心虚：共产党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主力为何一下子如鱼入海，杳无踪影？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他们指挥着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匪军，到处侦察，但都枉费心机，就连特务头子毛人凤，也捞不到半点情报。胡宗南匪军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其实，岂止如此，自占领延安后，胡宗南的鼻子上就被我们穿上了牛绳，今后朝哪里走就由不得他了！

“老牛”走上了磨道

我军撤出延安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主力部队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一带。毛主席分析，敌人在延安立足未稳，必然会派出警戒部队向延安东北的蟠龙一带伸展，以便造成攻守自如的态势。青化砭是去蟠龙必经之地，这里的地形，三十里大川，公路两旁都是高山，很象一只大口袋，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为了打好这一仗，就必须把敌人的主力从延安西北方向牵往安塞。担任“牵牛”的我军某部，故意摆出一个大部队行军的架势，漫山撒开，让敌人发觉。

陕北“蘑菇战”示意图 (1947.3—1948.4)



果然，正为得不到我军行踪而急得团团转的胡宗南，忽然接到空军报告发现我“大部队”，喜出望外，立即以五个旅的兵力向我军某部追来。我军某部按预定计划把敌人牵到安塞后，悄然隐去，连夜赶回青化砭参加伏击。

在敌军五个旅被牵向安塞的同时，胡宗南为了保障主力侧翼的安全，派出整编第三十一旅向青化砭移动，恰好走向我们设下的“口袋”。

集结在青化砭的我军主力一万多人，怀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强烈感情和对胡宗南匪军的无比仇恨，埋伏在公路两侧山梁上。陕北三月的夜，还是十分寒冷，战士们手脚都冻麻木了，却都不吭一声。天明，来了两架敌机，在山头上盘旋了两转，没有发现什么疑点，回去报告去了。上午十点，敌先头部队进入我预伏阵地，鬼头鬼脑地向两边山上张望，突然扫了一阵机枪。枪声停止后，只听见山风呼呼，松涛声声，我军纹丝不动。原来这只是敌人的火力侦察。他们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就大模大样地朝着“口袋”深处走来。

埋伏在山嘴的我军侦察员向指挥员报告，敌人已全部进入我伏击圈。这时，只听得我军指挥员一声令下：“出击！”四面高山突然全活了，只见红旗鲜艳，刺刀闪着寒光，我伏击部队如天兵天将，凌空而降，首先封住了敌人后尾的山口，接着又堵住了敌人往前逃窜的出口，一个旅的敌人被装进了大口袋，他们只觉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我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猛打猛冲，分割穿插，仅仅两个小时，将三千余敌人全部消灭，敌旅长李纪云被我生擒活捉。这个家伙直到被押离战场时，还怔怔忡忡，好象做梦一样，弄不清我军是从哪里飞来的呢！

回头再说敌人五个旅的主力，被我一支小部队牵到了安塞，来了一次“武装大游行”，突然发现我军“失踪”，正在那里犯愁。又得知青化砭战事的消息，才知道上了当，赶紧掉转屁股，从安塞到延安，再从延安到青化砭，又来了一次“武装大游行”。可是等到他们气喘吁吁赶到青化砭时，我军主力早就跳到几十里外休整去了。

青化砭的胜利，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首战告捷，意义很大，它鼓舞了我军民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它证明毛主席为西北战场制订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只要我们利用陕北极其有利的地理和群众条件，同敌人周旋，一回一回地吃掉敌人，敌人最终要被消灭掉，延安还会回到我们的手中来的。

依靠群众同敌人“磨菇”

青化砭的有力一棍，敲得胡宗南嗷嗷叫。他紧逼着自己的八、九个旅，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我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紧紧依靠陕北广大人民群众，赶着胡宗南继续“推磨”。

陕北的群众，在毛主席、党中央身边生活了十多年，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胡宗南一打进来，他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壁清野，拿起各种武器，保卫家乡，打击敌人。胡宗南匪军在陕甘宁边区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他们越深入解放区，受到的打击也越重。

胡宗南的意图，是想把我中央机关和主力逼过黄河。作为第一步，是赶我们向北走。我们就“投敌所好”，以两个营伪装大兵团向北行动，主力却隐藏在胡宗南的眼皮底下。敌人吸取了青化砭的教训，不敢再走山间公路，而是以几万人排成数十里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以为这样就不致暴露弱点，遭到各个歼灭。他们白天爬过一座又一座山头，天黑也不下山进村，就在山上露宿。所过之处，找不到老百姓的一粒粮食，常常要靠发馊的烧饼填肚皮。更苦的是，没有一个群众向他们提供我军行动的情报，相反，有时候还会被当地的老大娘骗上，使他们到处扑空，到处遭到民兵和游击队的袭击困扰，真是提心吊胆，苦不堪言。他们就这样从延长经延川到清涧，又转向西到了瓦窑堡，饥饿游行三百里，毫无所获。军官怨言纷纷，士兵弄小差的越来越多。胡宗南气得发昏，却又无计可施，只得命令部队回头南下，到蟠龙、青化砭一带进行补给。

老牛想在磨道上停下来了，这怎么行！我军派出一支小部队，在敌人屁股上狠狠揍了一鞭子。敌人发现我军在背后，顾不得疲劳和饥饿，又掉头北上，走上了“磨道”。

这时，面对敌军已开始出现的疲劳和饿饭情况，我军有人产生了急于北上打榆林或南下断敌退路的思想。毛主席极其精确地分析了当前形势，于四月十五日发出指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主力不急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

就在这个时候，坚持于瓦窑堡至延安一线与敌周旋的我军，在羊马河一带寻机歼灭了胡匪军第一三五旅，活捉敌旅长麦宗禹，缴获了大量美械装备，敌军士气更加沮丧。胡宗南只得把忍饥挨饿的部下调回蟠龙就食。羊马河战斗

后，为了进一步实行毛主席的“磨菇”战术，创造“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的条件，我军选定了蟠龙作为攻击目标。

把敌人牵走就好办

蟠龙位于延安东北九十里，是敌人在陕北的战略补给站，存有大量粮食、被服等军用物资，敌人每次进行重大军事行动后，都要回到这里补给。如果我们能打下蟠龙，就断了敌人的衣食，这将对敌人致命的一击。但正因为蟠龙很重要，敌人的戒备也更加森严。驻守蟠龙的是胡宗南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的第一六七旅。蟠龙四周山头上密密层层地构筑了许多半永久性防御工事，而且当时胡宗南主力十几万人正在蟠龙周围活动。因此，要打下蟠龙，就得先把胡宗南的主力牵走。

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我军开始了“调虎离山”的战斗行动。我三五九旅伪装作西北野战军的全部，旅部改称野战军总部，所属各支队也改用了纵队的番号，使胡宗南这条鱼儿来上钩，把它从蟠龙牵往绥德，不上不下地孤悬在榆林和延安两地的中间，而我军主力则隐藏在离蟠龙不远的地方。只要三五九旅把敌人牵进了绥德城，我们的主力就在蟠龙打响，等敌人得到消息再想回援，至少需要五天，我们的胜利就有把握了。

为了使敌人咬住鱼饵不放，我三五九旅又采取了一系列的迷惑行动。撤退途中，我军在原来的驻地上留下了一个“大军仓皇退走”的场面：破烂的木板、散乱的担架、没有烘干的旧军装，满地都是。在泥泞的地面上，还有意丢下一些纸片，上面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是通知的草稿：“……为保存有生力量，……即转移……向……集结……准备……东渡。”胡宗南以为这一下可真的把神秘莫测的我军主力找到了，就紧紧咬住我三五九旅向绥德方向而去。

按照我们的安排，五月三日，敌军主力被牵到了绥德，同一天，我们的主力就发起了进攻蟠龙的战斗。这一下，敌人的无线电话里可热闹了。他们在绥德、蟠龙、西安之间，展开了一场令人笑破肚皮的大争吵。先是进占绥德的敌人向在西安的胡宗南报“功”，接着蟠龙的敌人向胡宗南告急。胡宗南把蟠龙的李昆岗（敌旅长）训斥了一顿，说共军主力明明已被赶向绥德以北，哪里还有什么共军大部队来攻蟠龙，更不必如此大惊小怪；李昆岗赌咒说打蟠龙的才真正是共军的主力，胡宗南于是又大骂绥德的敌人混账透顶，中了共军的奸计。绥德的敌人连连喊冤，说共军主力已到了黄河边上，千真万确。胡宗南派飞机到黄河上空侦察，我军佯装渡河的船只正显得很忙碌的样子，于是胡宗南又相

信了绥德敌人的话，而把蟠龙的敌人臭骂一通，直骂得李昆岗等顿足发誓，抱着无线电通话器痛哭失声，苦苦求援……正在敌人乱作一团时，飞将军自重霄入，五月四日深夜，我军以顽强的攻坚动作，冲进了敌人坚固设防的蟠龙，全歼敌人的“重牌”第一六七旅，毙、俘李昆岗以下七千余人。敌人在这个战略补给站里堆积如山的物资，包括面粉一万二千袋，军衣四万套，骡马千余匹，都成了我军的补给品。胡宗南确实不愧为“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的“得意门生”。

打下蟠龙，好似端了敌人的锅子。孤零零吊在“半空”的绥德敌人主力，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只好灰溜溜地往回走，一路上，啃了几十天包谷杆子，直到七月天还穿着露脊梁、绽屁股的棉衣，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逃跑的、自伤的，不计其数。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陕北军民，用“蘑菇”战术把胡宗南步步引向绝境。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就来到了！

决定性的一仗

八月，古老的长城上风云翻腾，我西北野战军主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直逼塞上名城榆林，立即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一片慌乱。蒋介石害怕我们打碎了他北方的锁钥，亲自飞到延安，策划挽救失败的前途。

蒋介石也亲自出马了，陕北战场上的这场戏真是越演越热闹。

蒋介石为什么要亲自来？因为他在中原战场上也同样不断地走下坡路。他急于跟我们在陕北来一个决战，把我军消灭，好让他将胡宗南的部队作为机动兵团投入中原战场。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要以打榆林来吸引胡宗南主力北上，把它紧紧地拖住，使它腾不出手。这样，就能配合陈谢大军南渡黄河，以便与已经胜利渡过了黄河的刘邓大军和已经粉碎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华东野战军互相呼应，大闹中原。

榆林战斗一打响，敌人主力就分成两路拼死拼活地前往解围。一路由敌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领三个旅，沿长城前进；另一路由刘戡率八个旅，沿咸榆（咸阳——榆林）公路前进。毛主席看到我军发起榆林战斗以调动敌人北上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在榆林外围战中，我军已歼敌五千余人，于是毅然下令撤围。我主力奉命从榆林南下，隐蔽在沙家店地区，待机歼敌。

八月中旬，钟松、刘戡两路敌军十万人追踪我军，先后到达了沙家店及其附近。敌我主力全部汇集在这方圆不到百里的狭小地区内，毛主席决心就在

这里进行一场决定西北战场命运的战斗——沙家店战斗。

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人民在一起。他亲自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为胜利部署了一场又一场战斗，为敌人安排下一个又一个墓地。现在，毛主席又亲自到了离沙家店仅二十里路的一个小村子，就在这里直接指挥沙家店战斗。

我们当然不可能把十万敌人一口吃掉，我们的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孤立的敌人。刘戡自从进入陕甘宁边区以来，连连吃亏，一脸晦气，所以到达沙家店地区后，他的八个旅紧紧靠在一起，使我们无法下口。钟松却不同，他正因“援榆有功”，趾高气扬，进至沙家店后，竟敢把两个旅分成两路，让第一二二旅为前梯队，自己率领第一六五旅孤零零地掉在后边，这给了我军各个歼敌的机会。我主力立即将敌人的这两个旅分割包围起来，同时组织部队准备阻击刘戡来援。钟松突然在自己两翼发现我军主力，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急电胡宗南求救。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点着钟松的名臭骂，要他“固守待援”，同时急电刘戡前往救援。可是刘戡被我军打怕了，只在黄河边上打转转，直到第三天下午才勉强起身，又立即遭到我军的有力阻击。两股敌军相隔仅三十多里路，却无法靠拢一步，急得胡宗南脸色象死灰，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

振奋人心的冲锋号吹响了。我军如下山猛虎，高喊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口号，冲向敌人。愤怒的子弹如同江河奔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抱头鼠窜，哭爹喊娘。钟松气急败坏，拿着电话机拼命叫唤“山炮，山炮”，可是三十六师的十二门山炮，经过半年的“蘑菇战”，有九门已经不堪再用，送进了后方仓库，剩下的三门被我军强大炮火一压，也都成了哑巴。蹲在西安的蒋介石虽然派了几架飞机来扔炸弹，但又怎能阻挡解放大军的勇猛前进。曾经不可一世的三十六师，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就被我军全部歼灭，活捉了敌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只剩下师长钟松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乘着黑夜，换上便衣，落荒逃去。

胜利，就这样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出炫人眼目的闪光，来到了！敌人如同雪崩似地跨了下去。在沙家店战斗胜利的第三天，我陈谢大军胜利渡过黄河，直下河南，有力地支援刘邓大军向南京、武汉之间国民党心脏地区的进军，同时威逼潼关，震撼胡宗南的老巢。这一连串连锁反应大大加速了我军战略反攻的步伐。胡宗南十万火急地命令刘戡的部队夺路南逃，我军乘胜追击！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一日，春天的阳光再度照耀着解放了的延安。装点着战斗硝烟的宝塔山，更显得雄伟壮丽，汨汨延河水，也欢唱着伟大的毛主席军事思想的颂歌！

牢牢掌握主动权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

王秉森 李海生

两军对敌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是否掌握主动权。因此，指挥员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

毛主席说：“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又指出，“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才会有自由的活动。主动权既不是军事家头脑里固有的，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而只能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军事的规律和其他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知己知彼”，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才会有军队的自由权。所以，你要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就得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使自己的主观思想符合于战争的客观规律。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我们所以能打败敌人，取得自由，都是对战争规律性的正确认识 and 运用的结果。这就告诉我们，认识战争的规律性，并据此去能动地指挥战争，就能获得自由，掌握主动权。对战争的规律性认识得越深刻，我们的自由就越多，主动权就越大。

在战争中，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是，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矛盾着的状态，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优势中包含着劣势的因素，劣势中也包含着优势的因素，它们在战争的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条件，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在十年内战刚开始时，蒋介石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有飞机加坦克，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还只有一万多人，二千多支枪，就凭这些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打败了占优势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战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从本质上看问题，蒋介石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人心向背则是它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因为它是向下的腐朽力量，终究是要向它的对立面转化去的。革命的军队开始时，军事力量上虽然处于劣势，但人心向往，是向上的进步的力量，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由

弱变强，由劣势变优势，由被动变主动，这正是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只有看到这种必然性，才能树立起掌握主动权的信心，夺取战争的胜利。

然而，主动权“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劣势可以转化为优势，被动可以转化为主动，这仅仅还是一种可能性，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取得主动权的必要条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优势之军，由于其主观指挥的错误，吃了败仗；而劣势之军，由于其主观指导的正确，打了胜仗。可见，战争的指挥员，主观指导得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的变化。所以，主动和胜利决不能坐等，而是要依据战争的客观情况，去创造条件，使自己逐步摆脱劣势和被动地位，把战争的主动权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过来。

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主要地表现在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计划性，具体地表现为对战争的准备和估计。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正确的计划，来自指挥员的主观思想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无论是战术计划，还是战役计划，或是战略计划，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战争运动迅速，敌我情况变化无常，特别是敌之一方的变化很难估计，这就造成了战争所具有的不确实性的特点。但这种不确实性，并不是不可观察、不可摸索的，通过指挥员“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就能构成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定性，从而制定确实可行的计划运用于指导战争，去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抗日战争一爆发，胜利和亡国两种可能性都同时存在。毛主席根据当时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的特点，科学地制定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持久战的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战略和战术计划。由于有了正确的计划，终于实现了胜利的现实性，摆脱了亡国的可能性。打仗如果没有事先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违背客观规律，乱干一场，就会处于被动的状态，结果到处碰壁，丧失主动权。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还要作用于战争计划性的全过程。战争的迅速向前运动，战争情况的不断变化，就造成了计划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指挥员的主观思想，按照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及时适当地改变计划。计划的相对的确定性和其可变性，是矛盾对立的统一。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就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战争，相反，不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性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改动，呆板地执行计划，这就变成了机械唯物论者。战争的“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战争计划性的“运用之妙”，全在于指挥员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发挥的程度了。

灵活性，这是指挥员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进一步发挥。计划性还是一种预定的东西，而具体的战争是生动的、活泼的、多变的，指挥员要完成战争的计划，必须把计划性

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什么是灵活性？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情况，都将不能取胜。灵活性，不仅表现指挥员要善于使用战术，还要善于变换战术，“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战争的双方都想争得时机，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争夺对全局胜负起决定性战役上的时机，这就需要指挥员灵活地使用兵力，运用各种战术，使敌人丧失时机。辽沈战役胜利后，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争夺时机的战斗。那时，华北的敌人成了“惊弓之鸟”，要想在我平津战役作战部署完成之前，抢时间收缩兵力，企图逃跑。我军为争得时机，拖住敌人兵力，以待全歼，调兵包围张家口、新保安，采用“围而不打”的灵活战术，给敌人造成我军攻打张家口、新保安的错觉，打乱其计划，同时在天津、塘沽等地按兵不动，采取“隔而不围”的灵活战术，切断诸敌之间的联系。这样，就拖住了敌人，给我们争取了部署兵力、做好准备的时机，夺取了歼灭敌人的主动权。灵活性，还表现在指挥员根据不同的敌情、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的地点条件，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术，进行各种打法。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中国革命战争，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避免内线作战，就采取走走打打，打打走走的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法；在我处于相对的局部优势的情况下，我诱敌深入，把敌人诱到对我有利的地区作战，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方法；在敌人兵力分散，但还不到歼灭它的时候的情况下，我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作战方法；在敌人兵力集中，向我进攻的情况下，我采取“先走一步，后发制人”的作战方法。诸如此类种种作战方法，都是指挥员充分发挥指导战争能力，灵活使用兵力的体现。战争中特殊情况的出现，往往来得突然，这就要指挥员在一刹那的时间内，作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以应付复杂的局面。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我军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由兴国向西突破富田，绕过敌后，打敌尾部弱兵的计划，但狡猾的敌人突然集中了两个师的兵力扑向富田。根据敌情的突变，我军立即从原来向西突破富田计划，改为向东突破黄陂，使敌人扑空，而我军却绕过敌后，进行奇袭。出其不意的作战行动，取得了局部压倒敌人的优势，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灵活地使用兵力，改变战术，是被动转化为主动，劣势转化为优势的过程和保证，是积极的。走，是为了更好地打；退，是为了更好地进。战略战术上的灵活性，造成许多局部的优势和局部的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这种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积累多了，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所以“灵活性是主动性的具体表现”，“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灵活性，决不是主观随意性，而是聪明的指挥员的主观思想，根据客观规律在战争中的“运用之妙”。

要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必须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观察问题，克服机械唯物论。毛主席

在论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取得主动权的辩证关系时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而机械唯物论者，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它表现在战争中，只看到武器的因素，看不到人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亡国论者，正因为夸大了武器的作用，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得出了“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的谬论。这不是把战争的主动权送给敌人吗？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抗日战争胜利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发挥主观能动性决不是不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精神的东西所以能转化为物质的东西，在于它同一定的物质条件相结合。但主动权是靠人去夺取的，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坐等条件，主动权是不会来的。作为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着眼其特点和发展，而机械唯物论者，则把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看成是僵死不变的。林彪鼓吹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是形而上学的死板的教条，是儒家“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的翻版，用于指挥战争，必然丧失主动权，遭受失败。要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必须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革命战争的主动权，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夺取的。军事斗争不仅充满敌我双方错综复杂的斗争，而且还表现在军队内部正确与错误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战争中的这些矛盾运动，决定了夺取战争主动权的曲折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能善于在曲折的矛盾斗争中去赢得主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经过了这种斗争赢得主动权夺取胜利的。战争中出现的反复和曲折，虽然给战争带来了暂时的困难，但却为战胜敌人创造了条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走了二万五千里，算是一次大的曲折吧，但通过走了这次曲折的道路，才取得了主动权。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光明的前途，是通过曲折的道路才得到的。看不到这种革命战争中的曲折性，要想一帆风顺地取得主动权，这是一种幻想。那种当革命受到挫折时，就束手无策，悲观失望的情绪，那种当革命顺利发展时，就忘乎所以，盲目乐观的情绪，都是阻碍夺取革命主动权的。革命战争史上的这种教训，是永远值得我们记取的。

革命战争的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巩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的军队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取得了政权。今天，我们在胜利的形势下，决不能坐享其成。革命的主动权，无疑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才能掌握，但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如果不提高警惕，就会有丧失主动权的可能性。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得来的主动权，就要联系三大革命实践，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正确认识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得与失的辩证关系，并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项工作，总结经验，加强团结，在斗争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主动权，夺取更大的胜利。

编者的话：在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中，曾经多次讲到我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战役的经验教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就曾指出：“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为了便于更好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这期我们简要介绍了城濮之战、成皋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四个战例，供读者参考。

晋楚城濮之战

春秋时期，长江流域中部的楚国越来越强大，成为中原霸主。同时，它北面的晋国也一天天强盛起来。一时，晋、楚之间形成了互相争霸的局面。公元前六三二年，在城濮地方发生的一场大战，晋国打败了楚国，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晋楚城濮之战。

贪得无厌的楚国，在灭掉了许多诸侯小国后，野心勃勃地继续向外扩张。公元前六三三年，楚国又派重兵层层围困了宋国国都商丘，想一口气吞掉不肯亲楚的宋国。宋国立即打发人向盟主晋国讨救兵。晋文公为了打击楚国的威势，很想助宋和楚交战，但又顾虑晋、宋两国之间隔着曹、卫两个楚国的盟国，如果出兵，势必遭到楚军与曹、卫军前后夹击，处于不利的地位。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晋将中有个叫狐偃的对他说，曹、卫既是楚的盟国，如果先出兵攻打曹、卫，楚国就会派兵援救，这样，宋国之围就可不救自解了！晋文公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即出兵攻打弱小易制的曹、卫两国，借此转移围宋的楚军。不久，曹、卫两国都被占下了。这样，晋国就避免了劳师远征和前后夹击的不利局面，开始取得了主动。

曹、卫被晋国占领后，“打在盟国身上，痛在盟主心上”，楚军反而把宋国国都包围得更紧了。宋国再次派人向晋国求救。晋文公颇为踌躇，不救吧，宋国同晋绝交，投向楚国，不好；救吧，楚国兵强马壮，又有许多盟国、属国助战，自己兵弱马乏，独力战楚，没有取胜把握。这时，晋军主将先轸分析了楚国的同盟齐、秦曾同楚有旧隙的情况，主张由宋国先送点重礼给齐、秦，然后请求齐、秦去向楚国讲情，要楚国不再攻打宋国。先轸的分析抓住楚国同齐、秦之间的矛盾，符合中小诸侯国要求联合起来反对楚国称王称霸的愿望。晋文公很为赞同，就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分给宋国，宋国以厚礼相送齐、秦两国。

晋国在强大敌人面前，利用矛盾，支持和争取中小诸侯国，分化瓦解敌国同盟，果然收到了效果。楚国看到齐、秦两国既得好处，又来阻战，大为恼火。而齐、秦得了宋国的贿赂，恨楚国不听他们停止攻宋的劝告，不给面子，大为不满，终于同楚国破裂了交情，偏向晋

国。这就改变了晋国孤立无援的不利处境，使晋、楚两方的力量发生了变化。

这种急遽变化的形势对楚国很不利，当时正在攻打宋国的楚将子玉，派遣使者宛春，以谈判为名，对晋国施加压力，提出只要晋国恢复卫成公国君地位，并重新把曹国建立起来，楚国才能退兵，解除对宋国的包围。晋文公心里明白，这样苛刻的条件，名曰谈判，实则宣战，就召集大臣商议。先轸说，若拒绝楚国的条件，就等于跟曹、卫、宋三国结下了仇，树敌过多，这对晋国不利；如果答应了楚国的条件，使曹、卫、宋三国都安定下来，对三国有了恩惠，他们就能站到晋国一边来反对楚国了。晋文公连称妙计，一面把宛春扣留下来，一面将计就计，私下答应曹、卫两国，准许他们重建自己的国家，把人情先送给了他们。曹、卫两国国君，看到晋国这样真心诚意的对待小国，就履行了诺言，同楚国绝交，和晋国订立了盟约。晋国在强大的楚国面前，不是同时伸出两只拳头打人，而是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不是硬拼死打，而是斗智斗谋，不断分化瓦解对方的盟国，争取力量，就进一步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楚将子玉非但得不到宋国，曹、卫两国反而背楚与晋立盟，使者宛春也被扣了起来，气得恼羞成怒。他依仗楚国的优势兵力，就带兵长驱直入，直迫晋军驻地曹都陶丘。晋文公见楚军逼近，不但不正面抵抗，反而严令部队直往后撤，看上去是实现当年受楚王礼遇时所许下的诺言，即如果晋、楚两国发生战争，晋军一定“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其实，这是在楚军优势兵力面前，实行战略退却。愚蠢的子玉，不知这是诱敌深入之计，一步死钉一步地追了九十里。结果，孤军深入，疲劳沮丧，战线越拉越长，后援发生了困难，而晋军这样一退，避开了敌人锋芒，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时决战，使敌人从暂时的有利走向最终的失利，为自己选择了有利的决战条件。晋军按照原定计划，退了九十里，到了城濮停下来。这里，接近自己国土，缩短了补给线；这时候，秦国、齐国、宋国的兵马也先后开到，集中了优势兵力，士气更加旺盛。之后，楚军也急忙赶到。这时，子玉骄躁极了，大声喊叫：“今天晋军要完蛋了！”可是，晋文公却从从容容。他检阅了军队，分析了当时的士气、地形、实力，认为时机已到，才下令同楚军决战。

决战开始，晋军集中先向薄弱的楚右翼军冲击。晋军是以逸待劳，一个个如猛虎出山，勇猛异常；而楚军经过长途跋涉，战斗力大大削弱，越来越招架不住。晋军又把驾车的战马套上了虎皮，楚军的战马一见就惊慌逃窜，士兵也弃阵逃跑。楚军右翼迅速崩溃了。这时，晋上军主将狐毛，在车上竖起两面指挥大旗，后退诱敌；下军主将栾枝命令部队在车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也假装败退。子玉误以为晋军为薄败退，忘乎所以，便命令左翼军发起进攻，拼命追击，不知不觉地蒙着眼睛向晋军张开的口袋里猛钻。这时，晋将见楚军主力已被引诱到晋军腹地，预先埋伏的大军便拦腰横击楚左翼军，把已张开的袋口一下收紧，关门打狗。楚左翼军向前不得进，后退又无路，陷入了重围，终于全部被歼。子玉看到左右军都告失败，才急令收兵，保住了中军，退出战场，失败而归。

城濮一战，虽然只有短短一天时间，但却是晋楚长期争霸中具有决定性的一仗。在这次战役中，处在劣势的晋国，能够战胜实力上占优势的楚国，生动地说明了战争的胜负并不决定于军事力量的优劣。战争是政治、军事、人心诸因素的结合，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作用,善于利用自己的局部优势,攻击对方的局部劣势,就能改变军事力量上的优劣地位,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取得战争的胜利。

(李爱娣 夏秀斌)

楚汉成皋之战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是晋朝人阮籍跑到成皋附近的广武山上发出的一番感叹。感叹之中,流露着他对西汉初年的刘邦的鄙视。其实,刘邦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公元前二〇五年至二〇三年,他就在这一带起马挥戈,屠熊剜虎,以弱小的兵力打败了有“气吞万里如虎”之称的西楚霸王项羽,为楚汉相争的全面胜利献了一个奠基礼。

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成皋之战。

当时的情况是,项羽地广兵强,数为不逊;刘邦败走彭城,只逃出了十几个人。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形势下,刘邦及时收编了从彭城陆续归来的残存部队,充实了一批新兵,在荥阳、成皋一带依山傍水、屏障后方关中和巴蜀的“咽喉”要地上,掘沟筑垒,修建运粮甬道,使自己有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战略基地。为了从战争的全局上获得主动权,刘邦采取了正面坚持、敌后扰乱和南北两翼牵制的对楚作战规划。他亲率主力,分兵把守荥阳、成皋等险地,阻止楚军西进;让彭越在楚国后方进行骚扰,伺机给项羽背后一刀;命韩信和英布各在南北两面开辟战场,牵住项羽的左右手。由于刘邦比较正确地摆正了整个战局和坚守荥阳、成皋这个局部地区的关系,汉军虽然仍然弱小,却从极为被动之中解脱了出来。

项羽却恰恰相反。他只看到荥阳、成皋是“咽喉”,那里有刘邦的主力,于是就气势汹汹地带了几十万大军,张牙舞爪地扑向荥阳、成皋,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特别是项羽大举破坏汉军运粮甬道,劫夺荥阳守军的粮草,更是给刘邦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挽救这种危险局面,刘邦派使臣向项羽求和,遭到拒绝。于是,他又设计让将军纪信穿上自己的衣服出城诈降。楚军以为刘邦真的投降了,都一齐涌往东门。这时,刘邦乘机从西门逃出荥阳。项羽知道中了计,暴跳如雷,烧死了纪信,用强兵攻打荥阳,夺下了成皋。以后的事实表明:因为项羽不懂得把成皋的重要性和战争的全局联系起来,这块战略要地始终是他身上的沉重包袱。

成皋是刘邦心头的一块肉,他当然不愿意眼看这块肉掉在项羽手里。怎样去夺回它呢?刘邦原先准备和项羽来个正面开战,决一雌雄。谋士辕生献策,主张“以奇用兵”。这样,刘邦首先带领关中部队挥师南下,直指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让韩信在北方积极活动,从侧背威胁楚国。项羽一看刘邦向武关进发,立即亲率重兵跟踪追击,千方百计欲置刘邦于死地。刘邦据高守险,主动避开不利的决战,使项羽几十万大军处于无用之地。

与此同时,刘邦命令彭越趁楚军南下之机,迅速攻占下邳(今江苏省邳县东),紧逼楚都彭城,把火放到楚国的后院。项羽首尾不能兼顾,感到死缠着刘邦无利可图,只得掉过头去,爬山涉水,长驱数千里去讨伐彭越。这时,刘邦随机应变,兵锋刻转,北上轻取了成皋。项羽击退彭越,得知刘邦还军成皋,又顾不上喘气之息,回军西进,竭尽全力拿下荥阳、成皋两地。刘邦穿不敌众,在成皋突出重围后,退守到现在河南省的巩县地区。

项羽挫败了刘邦第一次夺回成皋的军事行动,从局部即具体战役上看,他是胜利了,似乎真有“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之勇。从全局即整个战略上看,他却失败了。几十万大军往返千余里,应付多面作战,人困马乏,部队里一片怨声。这匹“野牛”开始由肥变瘦,由瘦变垮。刘邦呢,他虽然吃了一次大败仗,但因为楚军受到极大削弱,不能越过巩县西进,他就能比较顺利地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在战略上也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

刘邦在成皋失守之时,正是韩信破赵凯旋之日。于是,刘邦又召集文武百官,重议第二次夺回成皋的大计。他命令韩信出师东伐楚国的盟友齐国,又派刘贾带领二万人马东渡黄河,协同彭越扰乱楚军,截断楚军的补给线;刘邦自己则带领主力增强巩县正面力量,高垒深堑,既不同楚军过早决战,又把项羽的军队紧紧吸住。彭越得到刘贾部队的有力支援,如虎添翼,接连攻下了睢阳、外黄等十七个城,截断了荥阳、成皋楚军和彭城之间的联系,顿时成了项羽的腹中之患。项羽为了安定后方,不得不留下大司马曹咎守卫成皋,再度带兵征伐彭越。他临走时,估计刘邦一定要袭击成皋这个战略要冲,再三叮嘱曹咎要死守成皋,无论如何不要出城交战。果然,项羽前脚刚走,刘邦就抓住楚军主力出走、兵力分散之机,后脚赶到成皋城下。曹咎开始时遵照项羽的话,听任汉军猛攻,坚守不出。然而,他经不起汉军连日的叫骂和挑战,盛怒之下,终于离城出击。成皋和汉军之间隔着一条汜水。楚军仓促渡河,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乱成一团。汉军在对岸箭上弦,刀出鞘,看准时机,金鼓齐鸣,发起猛烈进攻。等候在汜水上游的汉军战船,也借助“箭雨”顺流直下,来了个拦腰截击。楚军面临汉军的水陆夹攻,只有挨揍之份,没有招架之功,船上的往河里跳,岸上的往城里逃,人仰马翻,丢盔弃甲。汉军乘势掩杀,终于又占领了成皋,在荥阳以东包围了楚将钟离昧。

项羽一听成皋失守,荥阳被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不顾楚军疲惫之极,日夜兼程赶回来援救。汉军依据险要地形,避而不战。项羽只得驻守广武山东山峰与刘邦对峙。这个“庞然大物”已被汉军搞得晕头转向。这时,韩信又带领汉军长驱直入,攻占了楚国的盟友齐国都城临淄。项羽眼看韩信“再欲击楚”,被迫从非常吃紧的正面战场抽出二十万精兵去堵截。可是,韩信巧设妙计,把二十万精兵打个“精光”。一连串恶耗传来,楚军上下军心浮动,士气愈加低落。在长达千里的战线上,项羽被刘邦牵着鼻子走,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士气愈打愈弱,人愈打愈少。项羽又气又慌,只得整天借酒浇愁,骂娘咒天。几个月后,楚军粮食缺乏,“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进退两难。而彭越的游军又频繁地扰乱楚军后方,多次截取楚军的粮草。项羽感到形势严重,被迫走到谈判桌旁,与刘邦订立和约,议定鸿沟以西的地方归汉,鸿沟以东的地方归楚。“鸿沟议和”宣告了项羽在成皋之战中的彻底失败。

成皋之战使楚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就在战争结束不久，刘邦乘项羽撤军之机，实行战略追击，项羽全军覆灭，最后落了个“乌江自刎”的悲惨下场。

成皋是刘、项两家必争之地。三年中，成皋一带的急流险滩和崇山峻岭里，战鼓雷鸣，号角长啸。“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刘邦两夺成皋，注意从全局考虑，调动各方面力量予以配合，愈战愈强。项羽想永远占据成皋，但只懂在具体战役中鲁莽硬拼，结果非但占不住，反而被拖垮、拖死。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战略和战役的关系，这也是成皋之战留给我们的一条历史经验。

(孙国弟 过文珠)

袁曹官渡之战

东汉末年，袁绍和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地方展开了一场决战，这就是中国古战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这场战役，曹操以弱胜强，几乎叫袁绍十万精兵全军覆没。然而，袁绍方面竟败而不悟，还说什么是“胜负自天”！而诸葛亮在评论曹操时却说，“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当时，由于全国规模的黄巾农民起义，有力地冲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引起了各种不同政治集团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割据混战，袁绍和曹操成了最大的两股势力。代表豪强地主的袁绍，占据了幽、冀、青、并四个州，而代表中小地主的曹操，则占据着兖州和豫州，统治中心在许昌。

袁绍看到曹操实行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及日益发展的趋势，企图趁曹操还不很强盛时，一下子拔掉这个眼中钉。他不顾谋士田丰、沮授的劝谏，贸然亲自提兵南下黎阳，欲图直捣许昌，一举吞并曹操。

从当时双方集结的兵力来看，袁方精兵十万，曹方大约只两三万人。袁强曹弱，众寡悬殊，形势十分严重。

面对这种局面，曹操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很懂得战争形势的变化，说：“兵无常势，盈缩随敌”，意思是说强和弱、优势和劣势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曹操的重要谋士郭嘉，也对袁、曹对立的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他从刘邦打败项羽的历史经验中对比曹操和袁绍的对立，从十个不同侧面对双方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曹操的“制胜十条”。这对坚定曹操的抗袁信心起了重要作用。

曹操为了以寡敌众，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作了周密的作战部署。官渡是许昌北面的门户。这里渠道多，易防守，守住了官渡，就好比卡住了喉咙口。于是，曹操采取了先退一步，“避敌之长”的方针，减少沿河部队，把主力退至官渡，引敌深入，以牵住袁绍的鼻子。

公元二〇〇年，袁绍派大将颜良渡河进攻曹方的白马，企图从白马打开一个突破口，

保证主力渡河，与曹军主力决战。曹操根据袁军骄傲轻敌，颜良勇而无谋的弱点，采纳了荀攸“声东击西”的战术。他亲自带兵北上延津，装出要渡河抄袭袁绍老窝的架势。袁绍这个“不知兵要”的蠢人，果然中计，立即分兵沿河西下，去延津迎战。兵贵神速，曹操立即转马向东，率领轻骑直插白马，形成包围袁绍之势。当曹操赶到敌人的鼻子底下，颜良方才察觉，惊慌失措，仓促应战，被曹军杀死，这一路人马也被全歼。曹操取得了序战胜利，打乱了袁军阵脚，大大鼓舞了士气。

白马虽然首战告捷，但袁强曹弱的局面还未改变。

曹操为了避免与袁军正面作战，继续运动敌人大步向官渡方向后退，以诱敌上钩。袁绍不知又是一计，尾追而来。袁绍根本不懂得曹军退是为了进，走是为了打，贸然南进，陷入了挨打局面。曹操将计就计，灵活地采取了伏击战，把大部队隐蔽在山坡上扎营，一面侦察敌人动向，一面命令骑兵卸鞍放马，把满载物资的战车丢弃在路上，制造假象，迷惑敌人。顷刻，袁绍的先遣将领文丑率领五六千步骑追赶而到。当时，有些将领催促曹操下令上马应战。曹操说：“还不到时候”。直到袁绍援军主力全部进入伏击圈，争先恐后地抢夺财物、马匹，乱作一团时，曹操挥戈上马，一声令下，杀声四起，吓得袁军魂飞胆丧。这一仗，曹操仅以五六百名骑兵打败了袁绍军队，斩了大将文丑。延津之战，曹军从局部的胜利初步扭转了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地位，造成了与袁绍在官渡对峙的局面。

同年七月，当袁军又进驻官渡北面的阳武，准备继续进攻的时候，曹操坚持退守官渡，以避敌所长。这时，袁绍又骄傲麻痹起来，不听沮授、许攸等谋士的苦苦劝谏，急于把主力开到官渡附近立营，战线东西拉长达数十里。随即袁军不断向曹营发起进攻，垒土山，造壁楼，发射乱箭。曹军造炮车发射石块，击毁壁楼。袁军凿地道企图偷袭，曹军深挖战壕抗敌。袁军攻，曹军守，数次强攻未下，双方相持了三个月。这时，曹操兵少粮缺，士卒疲乏，面对袁军不断进攻，将士中有的产生了悲观情绪，情况十分危急。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荀彧在许昌写信给曹操，针对放弃官渡、退保许昌的错误主张，鼓励曹操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荀彧的意见，坚定了曹操抗战的决心，他更冷静地分析了袁绍的弱点，看到袁绍军队多，粮食消耗大，不得不从后方大批地调运粮食，只要卡其粮食，“绝粮以饥之”，必然不战自溃。这时，恰好袁军将领韩猛押运粮食几千辆，前来官渡。曹操立即派徐晃、史涣出击，杀了韩猛，烧毁了粮车，造成袁军缺粮的困难。整整三个月，曹操坚守阵地，积极防御，使袁军寸步未进。由于曹操人为地造成了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终于摆脱了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地位，把袁绍抛入了劣势和被动。

袁军遭到接连几次失败之后，粮食供应更加困难，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内部矛盾激化。十月，袁绍又从后方搜括来一万多车军粮，屯积在大营以北四十里的乌巢，派大将淳于琼守护。当时，沮授建议袁绍派蒋奇率领一部分部队驻防乌巢外侧，防止曹军抄袭，袁绍不听。许攸和部将张郃也建议，秘密派遣轻骑抄袭许昌，袁绍怒视许攸，骄傲地说：“不必，我一定可以在这里擒住曹操。”不久，袁绍扣押了许攸的家属，许攸在气愤之下，背弃袁绍，投奔曹操。曹操得悉了袁军的确实情况，才作出决定，“出空击虚，避其所守，击其不意”，奇袭乌巢。于是，经过周密部署，留曹洪、荀攸驻守官渡大营，亲自带领五千精兵，打

着袁军旗号,当夜向鸟巢进发。半夜到达后,即围攻放火。袁绍得知曹军夜袭鸟巢,以为曹营空虚,企图攻下官渡。张郃说:“曹军官渡阵地坚固,一时攻打不下,若鸟巢有失,大事也就完了。”主张先去救鸟巢。袁绍不听,只派少部分兵力前去增援。曹操抓住袁绍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际,集中力量猛攻鸟巢,杀了守将淳于琼,大破袁军,烧毁全部屯粮。鸟巢粮草烧毁的消息传到前线,袁军大乱,全线崩溃,张郃、高览等大将弃戈倒背,投降了曹操。曹军乘势出击,把袁军打得大败,歼灭袁军七万余人。袁绍最后只带了八百名骑兵,狼狈逃回河北。真是来时千护万拥,去时孤家寡人。官渡之战终于以袁败曹胜而告结束。

官渡之战,曹操由于重视了人的主观作用,审时度势,采取了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使劣势转化为优势,被动转化为主动。这正说明了,成败不在天,关键在“人谋”。

(李关良 李海生)

吴魏赤壁之战

三国时候,在长江沿岸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水战。孙权、刘备联合起来以五万兵力,打败了号称领有八十万雄师的曹操,这就是公元二〇八年的吴魏赤壁之战。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统一了北方。这使他的雄心也一天天大起来了。曹操打算一鼓作气,席卷江南,把盘踞在南方的刘表、刘备和孙权两大势力,挨个儿消灭掉,以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荆州历来是南方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曹操下江南,第一个战略目标是荆州。公元二〇八年七月,曹操采纳荀彧的作战方针,亲自率领大军南下,袭击荆州。事有凑巧,正当曹操的大军走在半路的时候,荆州牧刘表病死了。曹军到达新野,刘表的第二个儿子刘琮,被曹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不战而降,拱手把荆州让给了曹操。这时,寄居在刘表处的刘备,在樊城得到刘琮投降的消息,急忙向江陵退却,并命令关羽率领水军经汉水到江陵会合。曹操怕江陵为刘备所得,就亲自率领五千名精锐骑兵,一天一夜走三百里路,追赶刘备。在当阳的长坂坡,把刘备打得大败,占领了江陵。刘备只得退守长江南岸的樊口。这时,曹操更迫不及待,率领几十万雄师,顺流东下,浩浩荡荡直逼长江下游的东吴政权。

当时,从双方的军事力量看,孙权和刘备远不是曹操的对手。东吴军本来可以凭借长江天险,作为天然的屏障,以抵抗曹军。但是,由于曹操占领了荆州,又指挥全部水陆大军沿江东下,实际上,长江天险他已经占有了一半。刘备自从当阳长坂坡一仗大败之后,仅仅同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几十个人突围出来,逃到汉口,同关羽的一万多水军以及刘表的大儿子刘琦率领的兵马,合起来也不过二万多人,而且都还没有喘过气来。而曹操呢,自从占领了荆州,收降了刘表的步、马、水军八万多人,获得了大量军用物资后,兵力增至二

十多万,在军事实力上显然占了压倒优势。

那么,曹操为什么会败在孙权和刘备的手上呢?曹操的吃亏,在于骄傲轻敌。

当时曹操的部下贾诩向他建议说:“您在消灭了袁绍父子以后,紧接着又降服了汉南地方,您的威名已经远播国内,军事力量也比以前强大多了。如果能够利用荆州的丰富资源,休整部队,安稳百姓,使内部稳定下来,到那时候,江东就可以不战而服了。”从当时的情况看,贾诩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曹操由于在北方的胜利,和不战而下荆襄的战果,滋长了骄傲轻敌思想。他主观地认为,孙权害怕自己的声威,将会献地投降;刘备势穷力尽,可以一战而败。因此,在战略措施上不是孤立敌人,各个击破,而是伸出两个拳头,同时打两个敌人,想一口把孙权、刘备全部吃掉。当他决定进兵江东时,就写了一封信恐吓孙权,说他训练了八十万水军,要与孙权在吴地“会猎”。曹操满以为这样一来,一定会迫使孙权不战而降。

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孙权、刘备迫于形势,更坚定了联合抗曹的决心。刘表死后,孙权派鲁肃以吊丧为名去侦察情况。鲁肃在长坂坡与刘备相会,说明联合抗曹的意图。刘备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派诸葛亮随鲁肃去会见孙权。当时,孙权虽然不愿意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投降曹操,但对刘备的力量也有怀疑。诸葛亮为了促成孙权定下联合抗曹的决心,向他分析当时的情况说,刘备虽然在长坂坡失败,但目前还有关羽的水军万余人,刘琦的江夏战士万余人。曹军长途跋涉,已经非常疲惫。就象一支飞到尽头的箭,它的力量连一层薄薄的绸子也穿透不了。何况曹军多是北方人,不懂水战,荆州新占,人心不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孙、刘联合起来,同心协力,一定能击败曹军。孙权对于诸葛亮的分析很赞成。当他把周瑜从鄱阳召来商定对策时,周瑜同样认为,“曹操虽然统一了北方,但是局势并不稳定,马超、韩遂割据凉州,威胁曹操的后方。曹军舍弃了北方军队善于骑战的特长,而依靠水军与我军较量。现在天寒地冻,喂马缺草。让中原地区的士兵,进入南方江湖地带,水土不服,必然要生疾病。这些都是用兵的大忌。曹操贸然出兵,失败是必然的。”之后,他又向孙权具体分析了曹军的实力,认为从中原地区来的士兵不过十五、六万,而且很疲劳,刘表的降兵最多也不过七、八万人,而且对曹操心存戒惧。这样的军队,人数虽多,并不可怕,只要有精兵五万就足以打败曹军。

诸葛亮和周瑜对这次作战的分析,意见完全一致,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们都正确地估计了对手,也比较正确地估计了自己。他们没有为曹操所宣扬的“八十万”大军所吓倒,而是既从敌军的强大中看到了短处,又从自己力量的弱小中看到了长处。因此,都认为通过主观努力,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是能改变劣势的。

孙权听了诸葛亮和周瑜的分析,抗曹的信心加强了。他断案决策,定下抗曹大计。然后便拨精兵三万,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领军队与刘备会合,共同抗击曹操。

果然不出所料。曹操由于骄傲轻敌,在作战部署上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长处,暴露了自己的短处。曹军多数是北方骑兵,惯于陆战,这本是曹军的长处,而曹操选择了以水战为主,这就使优势的骑兵不能发挥威力,长处变成了短处。那些北方士兵由于不习惯水上

经济危机与政治革命

——学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体会

上海师范大学 施鉴思

一八四八年，在欧洲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欧洲大陆。这次革命的高潮就是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马克思在论述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的原因时指出：“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强了人民中的普遍激动。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象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九七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1846年和1847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二五五页）今天，我们认真学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光辉著作，研究一八四七年的经济危机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后果，将会有很大帮助。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当资本主义这个婴儿呱呱堕地的时候，它就孕育着这个不治之症。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凶猛的经济危机。还在十八世纪末，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就发生过个别工业部门生产过剩的危机。一八二五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工业危机。随后每隔几年，又要发生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八三六年，英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且波及到了美国。一八四五年，英国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到了一八四七年，爆发了英国全国性的经济危机，随后迅速蔓延到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与工商业危机的同时，一八四五年、一八四六年欧洲又发生了由于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而造成的严重饥荒，使危机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在英国，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九

生活，很多人都得了疫病，士气很低。因此，当孙、刘联军在赤壁同曹操的先头部队相遇，两军刚一接触，曹操方面就吃了败仗。曹操被迫退回长江北岸，屯军乌林，同孙、刘联军隔江对峙。为了克服北军不习惯船上生活的弱点，曹操命令工匠，把几艘船编为一组，用铁链、铁钉连锁在一起，又在上边铺好木板，以减少风浪颠簸，这样，既可以在船上行走，又可以在船上骑马。这就是所谓“连环船”。曹操自以为这个办法可以弥补曹军的弱点，却不知这正是他战败的致命伤。

“连环船”一出现，立即给孙、刘联军找到了可乘之机。周瑜的部下黄盖向周瑜献计说：“现在曹军船只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用火攻战术来击破它。”周瑜也认为曹军在军事上的过失已经暴露，时机成熟，可以按黄盖的计策行事。不过，当时正是寒冬季节，经常刮西北风，在江上放火，容易烧着联军自己的船只。在这时候，只有刮东南风才能实行火攻战。这正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传说中的东风，是由诸葛亮上七星坛祭来的，其实，诸葛亮并没有那么大的魔力，那只是因为诸葛亮和周瑜等人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估计到在冬至前后可能有东南风出现，所以才有把握实行火攻。同时，周瑜还要黄盖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投降，欺骗对方。这时的曹操，已经陶醉于幻想中即将到来的胜利，以致连黄盖的诈降，也深信不疑了。

公元二〇八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黄盖带领十只战船，向曹操的水寨急速驶去。船上装满了浇了油的枯柴干草，还有大批硫磺、烟硝等引火的东西，外面围着布幔。另外，还有一些轻快的小船，系在船梢。战船行驶到江心，黄盖命令各船都张起帆来。船在东风吹动下前进得更快了。黄盖手中高举火炬，命令官兵齐声喊道：“黄盖来降！”曹营中的官兵，听说黄盖来投降了，都走出营门，伸着脖子观望。等黄盖的船只驶近曹操的水寨，他一声令下，十只战船一起放起火来。

“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东南风呼呼地吹着，十艘战船就象十条火龙，直向曹操的水寨冲去。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只见烟火冲天，江面上一片通红。曹操的水寨立刻陷入火海当中。曹操的水军因为不善水战，在战船上你挤我撞，乱作一团。“连环船”一时间又分散不开，士兵被烧死，淹死的不计其数。火势越来越猛，一会儿岸上的曹寨也被延烧着了。周瑜在南岸望见北岸火起，知道黄盖已经得手，立即指挥快速行船，擂动战鼓，全力猛冲上去。联军个个都是水上健儿，在水战中大显身手，把曹军杀得人仰马翻。曹操的大部人马和所有战船，顷刻间都灰飞烟灭了。

在烟火弥漫里，曹操带领着残兵败将，向华容小道撤退。刘备、周瑜的军队水陆并进，把曹操一直赶到沔阳县境。这一仗之后，曹操元气大伤，兵员损失了一大半。他只好留下一部分军队防守沔阳和襄阳，自己率领残部退到谯郡去了。赤壁一战，联军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以攻击曹军的短处，终于取得了这一战役的胜利。之后，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骄兵必败。赤壁之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条真理。

（康伟 唐敏辉）

百三十家工厂关闭了二百家,工业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在法国,法兰西银行的业务由二十七亿减到十八亿法郎,许多省银行停止了支付。煤的采掘量由一八四七年的五百十五万三千吨降到一八四八年的四百万吨;铁的产量由五十九万二千吨降到四十七万二千吨。巴黎的工业生产总值从一八四七年的十四亿六千三百万法郎降到一八四八年的六亿七千七百万法郎。安格来姆造纸业的二十五个工厂中,倒闭了十二个。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七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再指出:“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二五八页)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促使了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而且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吵越出常轨,形成政局不稳,从而加速政治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八四七年的经济危机,给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由于股票跌价、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必然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八年间,英国兰开夏棉纺业中,百分之七十的工人完全失业或半失业。法国的色当、圣太田和加莱三分之二的工人失了业。一八四八年初,仅巴黎一处就有十多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流浪街头,挨饿受冻。资本家还通过普遍降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加紧对在业工人的剥削。一八四七年危机期间,英国棉纺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百分之十以上;法国工人的工资甚至降低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帮助资本家减轻危机的损失,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当时的法国,农民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借款、租金和利息等固定支出有增无已,大批农民被迫离乡背井,流入城市,加入了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广大的手工业者、小企业主由于经济力量薄弱,经不起危机的冲击,也纷纷破产。巴黎的大工厂主和大商人,乘机吞并,扩展自己的营地。这种“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正是二月革命的基本动因。

一八四七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把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阶层迅速地卷入到这个旋涡中去。工人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大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个时期,饥民暴动几乎遍及法国全国。巴黎的饥民奋起袭击投机商,捣毁地主田庄,占领地方粮仓。这次暴动虽然被反动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饥民暴动继续在全国更加迅猛地开展,并且越来越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质。与此同时,工人也不断掀起罢工斗争,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厂主压低工资,反对七月王朝暴政。在英国,群众革命斗争也是不断高涨。格拉斯哥的失业工人提出了“不给面包就革命!”的口号。有些地区还发生了工人与反动军队的武装冲突。在德国,一八四七

年四月,柏林爆发了“马铃薯革命”。反动当局几乎动员了柏林的全部驻防军进行镇压,其结果却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饥民暴动,工人罢工,示威游行遍及全国。这一切都表明,在危机的冲击下,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用所谓“和平”的方式来实行统治,而实行了血腥的镇压政策。但是,和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相反,镇压越厉害,反抗越激烈。统治阶级采取恐怖的手段对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愈残酷,革命的危机就成熟得越快。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欧洲大陆犹如一堆干柴,只要哪里有一点火星,就要燃成燎原的革命烈火。

在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政治腐败,政局动荡,成了这个时期欧洲政局的普遍现象。在法国,正是反动的基佐内阁执政时期,国内政治非常腐败,贪污、盗窃、舞弊营私的现象比比皆是,政治丑闻层出不穷。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尔克·科西迪耶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基佐内阁腐败的情况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生动的描述:“大臣、法国贵族(指贵族院成员,由国王委派)和大富豪均被人控告,揭发出贪污行为;一位公爵因伪造行骗被判了罪;摄政王(指内木尔公爵,路易·菲力普的儿子)的副官由于诈骗行为而被撤职;国王的一位大使在不明的情况下自杀;另一位大使用刮脸刀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大臣的秘书和贵族院议员以高价出卖国家的各种官职;国王的爪牙在粮食、海军、陆军等部门盗窃国家资金和财产,干着其他舞弊营私的勾当……”的确,基佐内阁四壁之内,干的就是这种最卑鄙、龌龊的勾当。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越演越烈,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派别、集团,纷纷粉墨登场,什么“王朝反对派”、“资产阶级共和派”、“改革报派”、“国民报派”等等,互相攻讦。有的攻击“七月王朝”的贪污腐败,有的主张成立所谓“廉洁政府”。工业资产阶级以“宴会”为名,举行群众性政治集会,鼓吹改革运动。到处乱哄哄,吵成一片。被揭露的政治丑闻实在太多了,以致基佐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把几个同僚拉下马,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在当时的法国统治集团内部,一片黄昏末日感,“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他们可以重复路易十五的话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些亡命之徒鲸吞了国家的大量财富,通过投机得来的巨额金钱,荒淫无耻、挥霍无度,简直是流氓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这就是走向穷途末路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在英国,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也经常争吵不休,内阁更迭频繁。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中,也同样呈现出一片分裂、混乱的现象。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了。

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

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三〇页)一八四七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欧洲各国的全部经济生活以至于全部的社会生活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革命势不可当地爆发了。一八四八年一月,西西里爆发起义,变成了几乎是同时席卷欧洲好几个国家革命的开端。随即,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在二月革命的影响下,维也纳爆发了三月起义,推翻了梅特涅的反动统治。这个消息大大地鼓舞了德国人民,爆发了三月柏林起义,并且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在匈牙利、意大利等地也先后发生了革命运动。革命的风雷激荡着整个欧洲。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高潮是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巴黎武装的工人要求“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同政府军展开了英勇的搏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经过五天的浴血奋战,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失败了。六月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巴黎淹没在一片血海之中。但是,六月起义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实践,使工人阶级认识到:“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工人阶级就用一个大胆的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一七页)

六月起义失败后,正当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在咒骂“六月起义罪该万死”的时候,正当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悲观失望的时候,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挺身而出,捍卫了六月起义的光辉成果,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一八页)并且预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八八页)马克思的这个光辉论述,深刻地说明了经济危机与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为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生动地证实了,并且将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战斗。

事实正是这样!

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挖空心思地制造种种谎言,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他们妄图根本否定资本主义有产生危机的可能性,竭力掩盖危机产生的真实原因,或者妄图为拯救危机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危机仍然是越来越深刻地发生了。一八四七年经济危机以后,在一八五七年、一八六六年、一八七三年、一八八二年和一八九〇年,都先后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十九世纪的危机中,以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机最为深刻,它大大加速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促进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从那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进入二十世纪后,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一九〇七年都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又经历了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九

至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经济危机。其中,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危机,是以往资本主义世界各次危机中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危机持续四年,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且,这次危机,工农业危机同时并发,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使资本主义世界生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在一九三三年,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失业的人数高达三千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周期越来越缩短,危机越来越深刻。铁一样的事实,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谎言。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永久繁荣”的神话一个辛辣的讽刺。历史的结论是,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经济危机。

象新的危机不可避免一样,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然要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革命总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激化,必然要爆发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往往引起革命高潮的到来。马克思指出:“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七页)历史证实了马克思的英明论断。一八三四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一八四二年英国第三次宪章运动的高潮,都是由于当时法国和英国的工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贫困引起的。一八四八年革命是如此,往后的情况也是如此。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曾经有过一段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当时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兴高采烈地鼓吹什么“革命已被埋葬”,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此可以“永世长存”了。但是,曾几何时,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在危机的冲击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焦点的俄国爆发了一九〇五年革命。随后,民主革命席卷了亚洲的土耳其、波斯、中国等国家。历史不正是对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的无情嘲弄吗?进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革命的烈火时而在帝国主义的中心,时而在它的殖民地、附属国不断燃烧起来,使得帝国主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帝国主义的死期已经日近一日了。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将推进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而革命斗争的发展又将加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要全世界人民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就一定能够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洪流势不可当。尽管革命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但是,“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 经济危机的理论

秦正先

当前，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风暴正在猛烈地冲击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正怀着极大的恐惧，注视着这场经济危机的发展，深怕它发展成为一场“三十年代式的大萧条”。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周期地出现？它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

早在1848年，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已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突出的现象是生产过剩。“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于生产过剩，大量商品卖不出去，造成工厂关门，银行倒闭，股票跌价，失业人数猛增，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陷入瘫痪状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特征。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会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加图，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都从“有卖必有买，卖买自然平衡”的错误前提出发，否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种谬论，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驳。

马克思指出，李加图和萨伊“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条件和它的社会形式的一切规定，否定它的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②，似乎当时还是处于商品交换初期物物交换的那种状况。但是，自从出现了货币，商品交换必须以货币作为媒介的那个时候起，买和卖的行为就分开了，就已经“包含着危机

的可能性”^③。李加图和萨伊那种认为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而不可能有生产过剩的观点，是“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④。

马克思从商品交换过程卖和买的分裂中，已经看到潜伏着危机的可能性。同时，他又明确地指出，危机的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⑤商品交换过程中由于买和卖的分裂所引起的那种局部的、暂时的生产过剩，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那种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是各行各业全面的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生产过剩？我们可以从不久以前发生在美国的把大量鲜牛奶倒入臭水沟一事中看得很清楚。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两天，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的牛奶垄断组织——牛奶生产商协会属下的阿特西亚牛奶公司，把三万八千多加仑的优质新鲜牛奶倒入臭水沟。倒掉的理由是生产过剩，“找不到出售这些牛奶的市场”。但在同时，市场上鲜牛奶的价格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已上涨了百分之八十四点六，很多穷人因为牛奶价格高涨而买不起牛奶。许多人通过各种慈善组织，恳求把这些牛奶用来救济挨饿的人，但是，垄断组织为了保证垄断高价和高额垄断利润，这些优质牛奶还是终于白白地倒进臭水沟里去了。

一方面人民在挨饿，一方面牛奶倒入臭水沟，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谓生产过剩。它并不是绝对过剩，并不是社会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广大人民群众都消费不了。而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人民群众低下的购买力来讲，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太多了，过剩了。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导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必然要表现为生产无限增长趋势同群众购买力相对萎缩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原因。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群众的消费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购买力，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④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具有“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⑤。资本家为了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就必然要增加积累和扩大生产；同时，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也迫使

①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3页。

② 同上，第13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页。

⑤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6页。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②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71页。

资本家不断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使劳动群众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化为利润落入资本家的腰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①“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②这就使得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的产物，危机期间生产力和产品的大规模的破坏，使这种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得到了暂时的强制的解决。但是，由于这种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③，所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循着“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这样几个阶段进行。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理论，具有非常革命的意义。有了这一思想武装，才能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不至于被资本主义经济某一时期的表面的“繁荣”现象所迷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少人被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所迷惑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④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大长了中国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的威风，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斗志。战后三十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科学预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已经经历了五次经济危机，目前正面临着战后第六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的科学分析，反映了客观真理，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在这一科学真理面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危机“理论”的伪善和虚妄，便昭然若揭了。

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酷事实，再也无法否认经济危机的时候，便又编造种种荒诞离奇的危机“理论”，竭力歪曲危机的原因。在资产阶级的危机“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不外乎两大类，一类叫做“消费不足论”，一类叫做“投资不足论”。

“消费不足论”由来甚久。持这种论调的人，从西斯蒙第到杜林，都把群众消费不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杜林说：危机期间“储存和销售之间的鸿沟最后之所以大得如此严重”，并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的落后，因为人为地造成的消费水平低”。但是，用群众消费不足来解释经济危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

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①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时候也非常明确地指出：“消费不足……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机则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②

“投资不足论”比“消费不足论”要晚出世得多。它是在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才出现的，被捧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权威”的凯恩斯便是这一派的主将。凯恩斯之流虽然也贩卖“消费不足论”，但他们更多地是鼓吹“投资不足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归之于“投资不足”。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刺激起资本家的投资兴趣，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扩大政府开支，举办一些公共工程之类的投资，那就会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创造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大量需求，就不会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了。至于为什么会“投资不足”，凯恩斯并不把它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而归之于资本家的心理状态，如对投资市场的“由乐观转为悲观”等心理因素。

凯恩斯等人离开资本主义的特定条件去谈什么增加投资就可以增加就业机会，避免生产过剩，那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本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为了要使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一部分人能够就业，生产资料已经生产得太多了。”^③如果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生产出充分的生产资料，足以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形下，让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都去劳动”^④。但是，资本家决不会为了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去增加投资。资本家是否增加投资，按照什么方向去投资，决不是取决于什么不可捉摸的“乐观”、“悲观”之类的心理因素，而是取决于能不能获得利润和利润率的高低。而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却又使生产过剩必不可免地周期性地出现。

“消费不足论”和“投资不足论”，无非都想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不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因而可以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用略加改良的办法来解决。例如，群众消费不足，可以用杜林的“公平的分配原则”来对付；“投资不足”，可以用凯恩斯的使用信用刺激等办法来对付，等等。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尽管开出一个又一个医治危机的药方，但是，危机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着资本主义世界。斯大林说得好：“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把生产不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用于不断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它能够把利润不用于满足寄生阶级的奢望，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

②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32—13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81页。

④ 同上，第282页。

⑤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4页。

①②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④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横排本，第1155页。

不用手改进剥削方法,不用于输出资本,而用于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那就不会有危机了。但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①

三

马克思主义不仅科学地阐明了危机的本质和危机产生的根源,而且十分重视对经济危机的后果的分析和研究,以便在这种研究的科学结论的基础上,来决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

资本家总是力图用解雇工人、压低工人工资、恶化劳动条件等等办法来摆脱危机。“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②经济危机加剧了无产阶级的相对贫穷化和绝对贫穷化,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这种后果,在当前这场危机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美国、英国和日本,每月都有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垄断资本主义的大企业也在急剧缩减生产。全日本棉纺厂协会已宣布要使棉纺厂的生产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五年六月期间减产百分之三十六,这就预告了将有大批纺织工人加入失业者的队伍。英国首相威尔逊公开要求英国工人“本着完全献身的精神”“自愿限制工资”,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克服“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国家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方面是失业和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日益高涨的生活费用,严酷的现实正在提高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团结,使资本主义国家内以小报垄断资产阶级为一方,以广大的工人、小生产者和其它工资劳动者为另一方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家还总是力图把危机转嫁给殖民地和附属国,拼命向殖民地和附属国倾销过剩商品和进一步压低那里的原料价格。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吃足了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苦头。在三十年代的那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倾销政策,本来就软弱的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上海一百十三家缫丝厂,一九三二年除一、二家勉强开工以外,其余全部歇业。中国的丝、茶等农产品和原料价格暴跌,数量锐减,一九三二年的出口总值较一九二九年几乎下降一半。结果是工人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在当前这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美帝国主义气势汹汹地威胁阿拉伯国家,把美国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罪责推到石油涨价头上,要阿拉伯国家大幅度地降低石油价格。他们还在妄想按老规矩办事,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充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替罪羊。但是,这一次却遭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猛烈反击。经济危机必然要使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尖锐起来。

经济危机也必然要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原料和投资范围的斗争进一步尖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9页。

锐起来。从历史上看,被经济危机加剧了的帝国主义之间对市场、原料来源、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往往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美苏两霸环绕着中东的石油,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夺。美帝国主义对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又拉又吓。一会儿提出发行什么特别债券之类的请求,以大量吸收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美元”;一会儿又凶相毕露,发出什么用武力占领阿拉伯国家油田,中断对阿拉伯国家的粮食供应等等的叫嚣。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加阴险毒辣。它以“军援”为武器,力图把阿拉伯国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且往往趁人之危,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军事对抗的紧要关头,勒索大量的石油和美元。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宣布他将访问中东,想进一步把阿拉伯国家存放在西方国家的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拉到苏联去,从金融上给美国以严厉的打击。两个超级大国口头上大叫“缓和”,实际上拚命争夺,互相挖对方的墙脚。

总之,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必然要使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基本矛盾空前尖锐起来。恩格斯曾经指出:“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①。斯大林在分析三十年代的那次经济危机的后果时指出:

“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

“第一、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为此就利用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

“第二、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

“最后,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②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这些理论,对于我们观察和研究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际形势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的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形势,正由于危机所孕育的战争与革命而在加速它的变化。不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垄断资产阶级怎样加强法西斯化,不管苏修美帝怎样又勾结又争夺,在世界各地闹事,酝酿新的战争,只要世界革命人民不放松警惕,有充分的准备,坚持斗争,结果必然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不断遭到新的失败和世界革命人民不断赢得新的胜利。

^①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2年1月25、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8页。

^②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2—223页。

怎样看待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意见综述

最近，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组、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外贸局等单位的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及上钢五厂、沪江机械厂、第十百货商店等单位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的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对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状况、特点、产生的原因，以及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和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初步讨论。

一、关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

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这次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来得更加严重、更加深刻，不仅生产下降，企业倒闭，失业工人增加，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股票行情猛跌，国际收支大量逆差等等各种景象，都已明显地超过了战后历次危机的程度，而且，这次危机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使帝国主义国家采取转嫁经济危机的办法，也更加困难了。这就更加难以摆脱这场危机的困境。

在讨论中，一些同志对这次危机的性质，提出了下列不同的看法：

一些同志认为，这次危机主要表现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但是，工农业生产下降幅度则不大，有的产品还出现供应不足，有的下降一段时期后，又稍有回升，处于停滞阶段，因此，这次危机主要是财政金融危机，目前还没有形成生产过剩的危机。

另一些同志认为，尽管这次危机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但从本质说，仍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有的同志还说，就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就是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而这次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已经连续三个季度。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考察，不仅要看生产一个方面的情况，还必须根据各个方面的迹象进行综合考察，何况这次经济危机还仅仅是开始。在历史上，就有很多次经济危机是从金融、股票危机开始的。而这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金融危机，又是同生产下降交织在一起的。最近一个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股票的价格指数大幅度下跌，对外贸易巨大逆差和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势必进一步在生产上反映出来，引起生产过剩危机的加剧。

二、关于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

大家认为，现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还将继续发展，还要持续一个时期。至于这次危机会不会象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那样深刻、那样严重，则有两种意见。

一些同志认为，由于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不大，有些国家还稍有增长，还没有出现三十年代那种全面、持续下降的迹象。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大部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和贸易量比去年同期还有所增长。同时，再加上投机和通货膨胀的因素，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用的加强，将对这次经济危机起着一定的缓冲和抑制作用，因此，这次危机不会发展到象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所达到的严重程度。

另一些同志认为，现在危机还在发展中，因此，还不能说这次经济危机不至于发展到三十年代那样的严重情况。如果以这次危机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比较，从存贷增加、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大幅度下降，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加强进出口贸易的控制措施等方面来说，都是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相类似，有的还表现得更为尖锐。而且，这次危机还有一些同三十年代不同的情况，例如，银行的倒闭是危机一开始就出现，而不是在工农业生产下降以后才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金融危机比一九二九年更加严重。又如，这次危机出现时，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债务已接近年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商品销售将更加困难，市场将更加萎缩，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争斗将更加激烈，这就更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和困难。因此，从发展的趋势来观察这次经济危机，不能排除比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可能性。

三、关于石油提价对经济危机的影响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次经济危机，决不是如象西方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是由于阿拉伯产油国家提高石油价格造成的。这是与会同志一致的认识。但是，石油提价对于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究竟应该怎样估计，有两种看法。

一些同志认为，石油生产国第一次提高石油价格是在去年十月，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停滞和下降趋势，以及物价上涨，贸易大量逆差的迹象，早在去年夏季就已显露出来。因此，石油提价决不能说成是形成这次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而且，石油作为燃料，在工业成本构成上只占百分之一多一些，不可能成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这次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下降，也是首先从那些与石油关系不大的部门开始的，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建筑业。因此，垄断资本家把石油提价作为生产下降的原因，完全是颠倒是非。今年三月，中东石油生产国取消禁运，石油输出已经恢复到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前的水平，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并没有明显上升，总的趋势还是下降。这个情况也说明石油提价与经济危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另一些同志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必然产物。但是，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进行反霸斗争，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石油资源全部或基本依赖进

向的资本主义国家,石油提价后,打乱了这些国家的价格结构,加剧了通货膨胀以及贸易逆差,使危机更加深刻和恶化。因此,石油提价暴露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虚弱性和腐朽性,它对帝国主义经济危机起了促进的作用。这些同志还认为,阿拉伯各国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残酷压榨,石油等原料的价格一直被压制在价值以下。现在,石油提价,只能说石油的价格和价值基本上趋于接近。而且,从根本上来说,石油提价是垄断资本的通货膨胀逼出来的,因而完全是合理的。

四、关于通货膨胀在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些同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发生的通货膨胀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理由是,通货膨胀使垄断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垄断资本把部分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增加设备投资,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如美国固定资本投资,一九七三年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了一百三十亿美元。同时,通货膨胀又使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压缩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购买能力。正是由于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加剧了消费能力相对缩小和生产能力盲目扩大之间的矛盾。因此,以通货膨胀为开端的,由于固定资本投资增加而大大膨胀起来、而为消费市场无法容纳的生产能力,是爆发这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反危机措施的一种手段,它对于经济危机起着暂时的“缓和”作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爆发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因此,生产下降和物价下跌,而在这以后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道路,垄断资本通过国家预算扩大开支,进行大量采购和投资,并且放宽信贷,以此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这种慢性通货膨胀的措施,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暂时起刺激生产的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危机在发展过程中,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没有出现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那样大幅度下降的情况,甚至有些商品价格还有缓慢上涨的原因。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对于通货膨胀在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分析,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看。他们说,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采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刺激生产,从短期来看,虽然可以“延缓”危机的爆发,出现暂时的虚假繁荣。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一直使用这种办法,使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盲目扩大,劳动人民购买力日趋相对萎缩,就必然会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更加深化,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现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十至二十,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如果继续采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只会使危机的因素不断积累,最后必将爆发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必将面临更大的灾难。

五、关于当前经济危机产生的影响

经济危机势必加剧资本主义的各项基本矛盾的激化,并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死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

许多同志指出,今年十月份,美国失业人数已达五百五十万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也在大量增加,在业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威胁。特别是垄断资本为了转嫁危机,实行

通货膨胀,这就造成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工人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使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当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蓬勃发展,罢工浪潮起伏,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今年上半年,罢工三千二百四十多起,七月份猛增到一千一百三十起。资产阶级报纸惊呼,这是“四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最高纪录”。经济危机也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垄断资本的反动统治更加摇摇欲坠,西方许多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就是明证。

许多同志还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更加尖锐,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战、资源战愈演愈烈。除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争夺商品市场、投资场所,进行勾心斗角的争斗以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自身的经济困境,也在利用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趁火打劫,这就加剧了它同资本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许多同志还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总是力图采取各种办法把危机的严重后果转嫁到第三世界人民身上,这就不能不进一步促使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潮流。第三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帝反霸,势必促使帝国主义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

这个讨论会还将继续进行。

(杨玲 周虹整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浅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11 月初版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浅说》(以下简称《浅说》),是辅导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本较好读物。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光辉文献。《浅说》首先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巨著这三个方面,说明学习毛主席这一光辉著作的重要意义。

《浅说》详细阐述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综观《浅说》全书,论述清楚,文字通俗、生动,密切联系现实斗争,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领会原著有较大帮助。

编者按：本文说的是崇明县委在讨论制订农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怎样认真分析历史和现状，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有利条件，克服各种困难，使继续大幅度增产粮食的奋斗目标，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这种分析历史和现状、规划未来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我们希望别的单位，在制订和实施远景规划中，都来提倡这种工作方法。

谈谈今后怎样才能继续大幅度增产粮食

中共崇明县委员会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一切劳动首先是并且原来也是把食物的占有和生产作为目的”。因此，加速建设崇明岛的首要问题是高速度地发展粮食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年来，崇明县粮食生产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今年预计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五亿五千多万斤，除去新垦区以外，全县三十九万五千亩粮田，常年亩产将达到一千三百五十斤左右，分别比一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和百分之三十五，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四点八和百分之四。八年来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的主要物质因素，一是改革了耕作制度。原来一年两熟，现在已逐步改为一年三熟。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三十三万亩，复种指数在一九六六年百分之二百的基础上增加到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二是改善了生产条件，突出的是抓了治水改土和农业机械化。在过去八年中，每年要挖土八百万方。原来占全县耕地三分之一的低洼地、高亢地经过初步平整治理，已能够做到水旱轮作。电力灌溉的面积已从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四十，扩大到现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机耕面积已从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十以下，扩大到现在的近百分之九十。生猪饲养量已接近一亩地一头猪，增加了大量的有机质肥料。所有这些，都对实行三熟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我们还陆续围垦荒滩，扩大了粮田四万多亩，这也是粮食增产的一个因素。

最近，我们和全县广大人民一起，正在讨论制订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五年的十年农业发展规划。今后的十年，在粮食产量基数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前提下，能不能继续大幅度地增产？客观上的困难确实有，三熟制已经全面实现，复种指数已接近了饱和点，围垦荒滩，今后主要由市属国营农场去进行，对县社来说，这方面也没有多大潜力了。因此，要在今

后十年中继续保持较快的速度，只有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当然要比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围垦面积艰巨得多。但是，我们县的粮食单产还是比较低的，同一些先进单位相比，差距较大，这说明提高粮食单产的潜力也是很大的。

目前，全县各公社、大队、生产队粮食生产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平衡性：有一百零八个大队亩产已超过了一千四百斤，有二百六十三个大队还在一千四百斤以下，有三十七个大队还没有超过千斤。如果一千四百斤以下的大队都能达到一千四百斤，单这一项，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就可以增加一百五十斤以上。那些产量上不去的大队，它们的原因很多，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水土条件较差。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本来就与自然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提高粮食单产，着力改变自然条件就是一个关键问题。

崇明岛四面环水，总的来说，水利条件是好的，土地也是肥沃的。但是，正因为崇明岛四面环水，处在长江口，常受台风、海潮的威胁，地下水位较高，又是不利条件。解放以来，依靠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筑大堤、修水闸、抗盐碱、降水位、平土地、疏河道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现在大堤还不够高，不够坚固，还受到特大台风及其带来的大潮汛的威胁；随着长江流速减缓，海水倒灌的情况也逐渐严重起来。近两年来，全岛春季有两个多月出现了被海水包围的新情况，咸水入侵的威胁就加重了。地下水位较高也不利于麦子的生长。要能够战胜可能出现的特大台风及其带来的大潮汛，就要加固环岛大堤，要能够抵抗咸水入侵，就要整顿水系，提高蓄泄能力；增建部分水闸，加强南引北排，并开一条七十公里长的干河；要降低地下水位，改良土壤，就要普遍平整土地，整顿田间低沟，特别要平整、改造好现有的十四万亩高亢地、低洼地和盐碱地。这些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总共要挖八千多万土方。这些土方一方一方连接起来，可绕地球两周。在十年内特别是近五年内，能不能分期分批地挖这么多土方，以改善水土条件，这对能不能提高粮食单产极其重要。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我们算了一笔账，在今后五年中，每年平均挖一千三百万土方。如果以每个劳动力平均每天挖两点五土方计算，每年只要动员十万个劳动力工作一个半月。这样的工作量，比过去八年每年平均挖的土方要增加一半，当然是艰巨的。但是，只要经过努力是可以完成的。“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一九五八年，我们动员十万人，只花二十八天，就挖了七百多万土方，开出了一条长达七十八公里的运河，改善了水利，为实现三熟制创造了条件。现在，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了，他们说：“缠小脚跨不出大步，守旧摊夺不到高产。”为了改变崇明岛面貌，有些先进的单位已经在那里动手了。近几年来，大新公社八大队广大群众、干部，在“胸怀壮志学大寨，誓把八队重安排”的战斗口号鼓舞下，抓紧冬春兴修水利，结合农忙平整土地，奋战六年，基本上实现了“土地园田化，条头标准化，水利河网化”。全大队粮食亩产由一九六九年的一千四百零八斤提高到一千七百斤左右，棉花亩产由一九六九年的一百四十斤提高到一百八十斤左右。因此，只要坚决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认真贯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大力治水改土，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普遍改变自然条件，实现百亩无雨不怕旱，暴雨七寸不受涝，使粮食单产普遍得到提高。

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概括了农业生产各种自然条件之间的联系，是缺一不可的。从崇明岛的自然条件来看，除了水、土以外，种子的矛盾也相当突出。种子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自然条件。毛主席说，“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现在，崇明县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粮食种子已经采用了优良品种。这是文化大革命八年中单产提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总的来看，我们培育和推广良种的工作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五十的元麦品种，据六、七十岁的老农反映，还是从他们祖辈手里传下来的。这种品种的产量很低，老农都叫它“老祖宗”品种。我们后季稻单产在全市是最低的，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仍在采用一种产量稳而不高、外县已逐渐淘汰的品种，人们叫它“老秀才”。这一类“老祖宗”、“老秀才”品种，现在大约还占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这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了。不过，它也反过来说明种子问题上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认真培育和推广良种，每一季作物单产提高一、二百斤不是很难的。过去，在培育和推广良种上进度不快，同我们墨守成规、求稳怕闯、吃现成饭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培育和推广良种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群众对于改良种子的愿望也很迫切，但是，有利条件是不会自发地发生作用的，是要人们去利用的。只要我们破除保守思想，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种子工作“四自一辅”的方针，县办好良种场，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分别建立健全种子场、种子队、种子田，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当前那种从外地引进多，本地自育少，品种混杂，摸不透种子脾气，往往造成低产失收的状况的。在广泛深入开展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中，要在三、五年内，首先培育出一批早稻亩产一千二百斤、后季稻和玉米亩产千斤、三麦亩产八百斤的优良品种，大力推广。并且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着手培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新品种。在抓好土、水、种的同时，大力增积自然肥料，加强植物保护等工作，全面贯彻“八字宪法”，这样必将使粮食单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要不断地提高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加速改变自然条件，从而不断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根本的出路在于实现农业机械化。毛主席曾经在一九五五年指出：“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三十年至三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崇明岛广大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经过十九年的努力，现在已在全县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耕耙、排灌、脱粒、植保、农副产品加工等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但是，全县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还不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大中型拖拉机平均一个大队不到一台，手扶拖拉机平均三个生产队才有一台。特别是在“三抢”、“三秋”等农忙季节，收、种、管和农田基本建设同时动手，大量农活靠人力，往往顾了东头，丢了西头，耽误了季节。

“没有农机想农机，有了农机买不起”。这是不少社队在发展农业机械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等、靠、要”，向上伸手，还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事实上，“等、靠、要”不但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资金，主要应该依靠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的积累。现在，各生产队平均公共积累率在百分之十左右，一个生产队每年

平均提留的公积金约一千六百元。随着农副业生产的增长，积累率将进一步提高。但增产和节约是矛盾的统一，“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当前农本普遍偏高。如果把农本下降到平均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每个生产队平均每年就可以增加积累六百多元。如果把农本降到百分之二十五，则每一个生产队每年平均提留的积累将比现在翻一番。根据一些先进社、队的经验，这是可以做到的。各生产队达到这样的积累水平，生产队所需要的小型农业机械在十年内是可以陆续配齐的。关键是要坚决实行勤俭办社，认真搞好经济核算，使积累逐年增加，使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等扩大再生产方面去。大中型农机具的添置，通过有计划地发展社、队工业，壮大社、队两级集体经济也可以逐步解决，并且有力量支援比较穷的生产队。堡镇公社社、队工业近几年来积累的资金，由于基本上用来支援农业，特别是用来支援农业机械化，结果，使整个公社购置了各种农机达一千多台，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购置的农机的总和三倍以上。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全公社粮食产量一九七三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以上。堡镇公社可以做到，其他公社创造必要的条件也是可以做到的。社、队工业实行亦工亦农，职工平时做工，农忙务农，不致影响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也不增加国家的商品粮和工资基金等的支出，应该而且也有条件有计划地发展，使它在农业机械化过程中起到生力军的作用。

粮食是全局性的东西，必须抓住不放。“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要把农业特别是粮食搞上去，还要积极发展林、牧、副、渔各业，为农业生产改良气候、保持水土、增加肥料、提供资金。努力发展林、牧、副、渔各业，不但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需要，而且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迫切要求我们既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粮，又提供越来越多的其他农副产品。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为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必须遵照这个方针，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使农、林、牧、副、渔各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客观条件是具备的。崇明岛不仅内河水域有四万多亩可以养鱼，而且还有长江和海洋的广阔水面可以捕捞，发展渔业潜力是很大的。岛上漫长的江堤和大片新淤的滩地，为植树造林提供了大量的基地。充分利用这个广大的自然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在以粮为纲的前提下，努力开展多种经营，使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挖掘岛上的自然资源来说，还是很不够的。现在全县树木不过一千万棵，每人平均不到二十棵，生猪饲养量还没有达到一亩一头，内河可以养鱼的水面还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没有利用，已养鱼的水面产量也很低，特别是到长江海洋捕捞的机动渔船很少，水产品的产量很低。农业和其他各业特别是渔业、林业相比，使人有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之感。这些是同我们这个祖国第三大岛极不相称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思想上的片面性，不重视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前几年，我们对发展粮食和多种经营之间的矛盾的一面看得较多，而对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的一面看得不够。其实，林、牧、副、渔各业不发展，也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粮食产量的提高。在今后的十年中，除了大力实现一亩地一头半猪以外，一定要使多种经

营全面发展起来。特别要根据崇明岛的特点，使渔业和林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针对渔业生产的落后状况，首先要发动群众，大打渔业翻身仗，真正把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集体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每个公社建立一个专业的渔业大队，逐步实现渔船机动化，捕鱼方法现代化。海洋机动渔船发展到四百对，长江机动渔船发展到五百条，内河水面凡可以养鱼和放养水生作物的，都全部利用起来，力争全县鱼、虾、蟹、紫菜等水产品的总产量，在现有的基础上，到一九八〇年成十倍、到一九八五年成二十倍地增长，并相应搞好鱼品加工和冷藏等工作，使崇明岛真正成为上海市的一个渔业基地。林业要依靠县、社、队各级的力量，把环岛大堤、江边荒滩以及河边、路旁一切可以种树的地方都逐步绿化起来。国营林场在现有四千多亩的基础上，通过围垦扩大到万亩左右。同时，发动家家户户在宅前屋后种竹种树。争取到一九八五年，做到用材基本自给，使崇明岛成为长江口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绿洲。饲养鸡鸭牛羊，养蜂养蚕，种植蘑菇、药材，编织柘柳、稻草、芦苇制品等副业也要积极发展，并且按照党的政策鼓励社员搞好家庭副业。只要加强领导，实现多种经营，一定能够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而决不会妨碍粮食生产的发展。

为了加速农业的发展，大力增产粮食，要求县的地方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今年，全县三分之一的水稻种植面积已实现了插秧机械化。要全部实现插秧机械化，还需要大量的插秧机。有了插秧机，同手工拔秧的矛盾突出了，又需要试制、推广拔秧机，以及耘耖机、开沟机等等。这就要积极发展农机工业。但是，目前县农机厂的设备、动力还比较低，电力也严重不足。这就需要相应发展农机工业和电力工业。要发展渔业，就要相应发展造船工业。工业离不开钢，也要相应发展一些钢铁工业。崇明是一个岛，遇到大风同上海市区和其他地方的水上交通就要中断。根据这个特点，尽可能地提高农用生产资料的自给率就很迫切。当然，围绕着农业的发展而相应带来的各行各业的发展，首先要挖掘现有的劳动潜力、设备潜力和资金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和资金周转率，“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这一方面，潜力还是很大的。即使要增添一些必要的劳动力和设备、资金，大量的也应该通过发挥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的潜力来解决。总之，基本的原则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主要依靠崇明岛人民的红心和双手创造崇明岛的光辉的未来。

我们分析了崇明县的自然资源和发展生产的潜力，深深感到今后十年使粮食产量继续保持过去八年的递增率增长，是能够做到的。按照这样的速度，粮食常年亩产每年平均将增加一百斤左右，到一九八五年全县达到二千二百斤至二千四百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毛主席说，“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革命能改变一切”。回顾崇明县二十五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也证明了这个真理。一九四九年，广大农民还处在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之下，那时全县粮食常年亩产只有二百三十多斤。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改变了封建生产关系，一九五二年就跳跃到五百一十八斤，翻了一番以上。在合作化基础上，一九五八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完善，这一年常年亩产又上升到六百七十八斤。但是，在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三年内，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资本主义倾向泛滥起来，竟使全县粮食亩产下降到五百斤左右。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胜利召

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和发展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生产又迅速增长。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达到九百零七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不断增长，又达到了目前一千四百多斤的水平。这二十五年的历程说明，在路线、政策比较正确的条件下，抓了革命，生产就发展；在受到错误路线干扰的条件下，放松了抓革命，生产就下降。这就告诉我们，今后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单靠改变生产条件是不行的，必须首先抓革命，特别是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还是不完善的。这些不完善的部分，又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指导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始终是大办粮食、办好粮食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崇明县的上层建筑有了很大的改善，因而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能不能说，县的上层建筑已经很完善了呢？还不能那样说。就是在批林整风过程中，即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我们县的粮食产量还曾经出现一九七一年高、一九七二年低、一九七三年高这样的高——低——高状况。一九七二年为什么低？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县委放松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放松了对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一句话，放松了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九七二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但是，有的公社如陈镇公社却大幅度增产，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陈镇公社有四个大队的资本主义倾向是相当严重的，由于公社党委主动组织力量，打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一九七二年全公社就增产了粮食近一百万斤，而四个原来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大队竟增产了五十万斤。坏事变成了好事。这些事实，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有抓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促生产。如果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指导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使上层建筑逐步完善起来，再好的规划也只能停留在纸上，不能变为现实。我们要学习昔阳县委，狠抓县、社、队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使各级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县委是关键。把县委建设成为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化的、朝气蓬勃的领导班子，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树立革命化的作风，坚持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抓好典型，以点带面，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步一个脚印，农业发展的规划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们的远景规划，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个规划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实现。不付出艰苦的努力，不进行反复的斗争，就想改变崇明岛的面貌，这种想法，只是幻想。但是，“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崇明岛上全体人民一定能够在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



王安石传

曹思峰 钟功伟

(一)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一〇二一年生于一个叫王益的小官吏家里。王益当时任临江军判官。临江附近，有清清的赣水，高耸入云的玉华山，王安石的童年时代，就在这青山绿水的环抱中度过。王安石年幼好学，很早便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攻读“四书五经”，这是宋朝读书人入仕做官的进身之阶。可是，王安石除了读这些书以外，也读诸子百家、小说稗史、唐诗宋词，甚至医书、农艺、天文、地理，无不涉猎。特别打动他的心弦的是《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法家人物，革新秦制的商鞅，开创汉朝的刘邦，舌战群儒的桑弘羊，奋笔疾书《封建论》的柳宗元……这些栩栩如生的法家人物的群象，曾如此地震撼着王安石幼小的心灵，冲击和涤荡着他头脑中“四书五经”陈腐说教的影响。

王益是个地方小官，经常走南闯北，在各地做州县官。这使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就到过长江下游的江宁、扬州，粤江流域的韶州，黄河流域的京城汴梁等地。他不但读了万卷书，也行了千里路，了解到各地的风俗人情，知道了一些人民的痛苦和要求。他对官僚豪绅、大地主富商对中小地主的倾轧和对农民的欺凌，越见得多就越看不惯。“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悲惨境况，常使王安石清夜扪心自问，产生了“何尝敢安枕”的心境。从青年时代起，王安石就不把“神圣”的孔孟放在眼里，“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子墨文章辄自轻”，“肯言孔孟犹寒饥”。年青的王安石就这样地以藐视孔孟的姿态，抒发了自己的个人抱负。

三十三岁那年，王安石考中进士，被派到淮南当判官。王安石每天公事完毕，都要捧出诸子百家来挑灯夜读。书房里的青灯，常常是通宵达旦。往往东方破晓，人们起床了，他才“扑”地吹灭灯火，伏在书案上打个瞌睡。临到赴衙时，连脸都来不及洗，就匆匆赶去。当时的上司韩琦，是个迂腐的老官僚。这一天，他故意等在衙门回，打量着王安石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干咳一声，“哎！昨晚上，可是赌博滥饮来着？”王安石一声不吭，没有理他。韩

琦有些光火了，申斥说：“年青后生，抓功夫多学孔孟之道是正经，贪玩自弃可真没出息！”王安石点头敷衍一句：“谢大人教诲。”心里却感到既好气又好笑。

自北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阶段。宋王朝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国策，激化了阶级矛盾。大地主官僚恣意兼并土地，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被他们霸占。啼饥号寒的农民僵扑于地，官吏们却仍然拿着鞭子逼交租税。北方的契丹、西北的党项等族的统治者不断向中原侵犯。北宋统治者采取屈膝投降政策，每年向侵略者交纳几十万两银子。封建统治者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劳动人民身受双重压迫，无以为生，纷起反抗。早在北宋初，四川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以后农民起义连续不断，“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北宋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公元一〇四七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的知县。沿着大运河，从京城汴梁到浙江的千里旅程中，他看到的是“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的旱灾景象。满目是百姓逃荒要饭、卖儿鬻女、投河自尽的惨象。萧瑟秋风，吹拂着屹立在船头的王安石，帆船乘风破浪前进，两岸壮丽的河山与“积贫积弱”的国势形成尖锐的对比，给予王安石以强烈的刺激。他不胜悲愤：“嗟！火耕又见无遗种，肉食何妨有厚颜！”正是那批达官显人即所谓“肉食者”们穷奢极欲造成的人祸，才加剧着赤地千里的天灾。

“越山长青水长白，越人长家山水国。”跨江负海的鄞县，山明水秀，物产富饶，人民勤劳。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只顾盘剥，不修水利，年深日久，造成的是河床淤塞，水堰破坏，旱涝不断。王安石来到鄞县，顾不得长途跋涉的辛苦，摊开笔砚，立即给上司写了一封信：“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今天国穷民困，不但是由于少数人挥霍无度，而且也由于不事生产，使生财之道大成问题。大官僚们名谓“民之父母”，实则鱼肉百姓，榨取民脂民膏，这就是“东南饥馑如此”的根源。王安石怀着改革政治的愿望，决心从鄞县做起。他率领僚属们从县城出发，经万灵乡，入育王山，到东海边，再至芦江，又乘船到洪水湾，止于桃源、青道，行程几百里，前后十三天，行经十四乡。他调查了全县的水利，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建堤堰陂塘的水利工程上。长期苦于水涝灾害的鄞县人民，“无老壮稚小”，都踊跃参加了水利工程的兴修。他们迅速疏通了淤塞的川渠，凿开了阻挡水流的山石，减轻了水旱灾害。王安石又实行了“贷谷于民，立息以偿”的措施，使贫苦农民免于遭受大地主的高利盘剥。三年后，鄞县的面貌有所改变，上下远近都知道鄞县有一个拔萃出群的能吏——王安石。

鄞县三年的奋斗，坚定了王安石的信心，也打下了他以后实行变法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

一〇四九年，王安石奉命入京师。“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年青的改革家王安石，怀着天真的憧憬，迈开步伐，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

(三)

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王安石从一个普通的县衙门的小吏,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点,升为翰林学士。他在政治上已经成长为一个有鲜明的尊法反儒倾向的改革家。他想模仿管仲、子产、商鞅等人,凭借皇帝的权力,冲破大地主阶级“不知变”的流俗,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一〇五八年,在中小地主阶级一片要求改革的呼声中,王安石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洋洋万言的上书中,王安石措词激烈地批评北宋统治者一味墨守成规,使得宋朝“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畏于夷敌,天下之财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他指出,宋朝所以“积贫积弱”,就是因为“因循守旧”,不知“变更天下之弊法”。国家要强盛,必须实行改革;要实行改革,必须任用中小地主阶级“知法度”的“有志之士”,罢斥那些“不恤国事、同俗自媚”的朽官腐吏。他用“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唐之黄巢横行天下”的历史告诉宋仁宗,小心逼得人民造反,丧失天下。他慷慨陈词,要仁宗“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变法图强,“改易更革”。

当时的宋朝最高统治者宋仁宗,是个“仰畏天,俯畏人”的儒家。他一听到“变”啊“革”啊就害怕了。王安石的万言书,被他当成废纸,抛在一边。朝廷的大官僚们如韩琦、富弼、文彦博之流,腐朽反动,没有人站出来支持王安石。王安石孤掌难鸣,但他并不灰心,在等待着施展他的政治抱负的一天。

又过去了九年。展现在一〇六七年登基的宋神宗赵顼面前的,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收入日益枯竭的窘迫局面。宋神宗,这位十七岁就当政的年青皇帝和他的祖辈父辈们不同。他锐气十足,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他就有股子劲。他曾披上全副盔甲去见他的祖母仁宗曹后,“娘娘,我穿着这副盔甲好不?”他又通过老师了解到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对王安石不胜仰慕。登位后,神宗很想有一番作为,改变宋朝国势衰弱的政治局面,清洗掉百年来向外族屈膝投降的奇耻大辱。他怀着这个强烈的愿望寻找有志于改革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很自然地得到了他的赏识。

一〇六八年四月的一天,宋神宗破格下令王安石直接入殿对策。神宗问王安石,“朕在宫中久闻卿大名,敢问当今治国,应以何为先?”王安石从容回答,“以制定法制为先。”神宗听了很高兴,点头赞许,他命王安石写个意见给他。王安石回府后,立即向神宗上了奏折,建议改革“累世因循未俗之弊”,实行变法,他鼓励神宗,“夫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第二天,神宗怀揣着奏折,兴致勃勃地召见王安石,说,“昨天晚上,朕一夜没睡,把卿的

奏书反反复复读了数遍,卿的治国大计讲得十分精妙。朕很想听听具体的办法,请玉卿详而谈之。”于是,王安石讲了自己多年来的各项改革设想。神宗边听边点头,抚掌大喜,“好,好,卿之言如若实现,大宋强盛有日!玉卿,望你尽力辅朕,咱们同奔这条大道!”这以后,神宗对王安石真是如鱼得水,十分亲密,常常在延英殿讲读以后,把王安石单独留下,一边喝茶,一边商讨变法大计。

王安石一日侍讲,神宗说,“唐太宗得了魏征,刘先主用了诸葛亮,才大有作为,可惜这两人都是世上罕见的人才,是很难遇到的啊!”王安石说,“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以天下之大,怎怕没有人才?使人担心的是,贤君若为小人蒙蔽,那就糟了。”王安石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以大地主大官僚为骨干的顽固派,从仁宗到英宗的几十年中一直大权在握,盘根错节,上下勾结,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头子司马光,字君实,是个极端顽固保守的大儒。三朝元老韩琦,前宰相富弼,两度为相的文彦博,是这个集团的干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革新派虽然也有一批人,但出身都比较低微,长期任下级官吏,资历不深,地位不高,权力也不大。要变法,将会碰到不少困难。

宋神宗支持了王安石。一〇六九年,他不顾守旧派官僚的反对,毅然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翌年,又拜他为相。朝内两派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安石立即提出实行变法。一场轩然大波掀起了。新旧两派为维护本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的战斗。

那一天,文德殿内百官群集,激烈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很久。大殿里正回荡着王安石慷慨激昂的声音,“我朝积贫积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变风俗,立法度,理财整军,全面变法,正为今日急办之事。”话音刚落,一旁角落里浮起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臣不能同意。”这是司马光,他站出来,鼻子狠狠地“哼”了一下,“变法、理财,全是设法夺民!与昔日桑弘羊欺瞞汉武帝如出一辙!”他的话还没说完,背后一群应声虫嗡嗡乱嚷起来,“司马大人说的是,什么新法、变革,臣以为王安石正如当年的桑弘羊在聚敛天下之财,祸国殃民!”“子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望陛下三思而后行!”“王安石议论迂阔,不晓世务,为政多变,臣不能容!”

王安石冷峻地横扫他们一眼,理直气壮,大声驳斥,“要变通天下之财,抑此兼并,富国强兵,汉代就数桑弘羊!诸位平日里如不作威作福,何必害怕新法!”说到这里,他转向宋神宗,“国家兴旺,在此一举。唯有腐儒,才不知变。陛下切莫迟疑。”年轻的宋神宗受到极大鼓舞,他毅然提起朱笔将变法的奏章批下去,然后站起来庄重地向百官宣布,“朕立意变法革新,即日起全国颁行新法,望卿等齐心协力!”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官僚,象木头似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呆若木鸡。

下朝的钟鼓声响了。王安石整理朝服充满信心地从大殿中出来。守旧派官僚们拉长

着脸，拖着笨重的脚步在后面跟着。他们中的一个厚着脸皮跑向王安石，扯住他的袖子：“皇上正倚重夫人恢张尧舜圣道，您这样以利为先，怕辜负朝臣的期望吧！”王安石坚定地回答：“为国家善谋利，正是圣道！”走在最后的是垂头丧气的司马光。宋神宗在当时曾喊他回来，对他谆谆劝导：“卿是本朝元老，望与安石携手，为变法出力！”“与王安石携手？”司马光冷笑一声，从牙缝里迸出一句恶狠狠的话：“臣与安石犹冰炭不可共器，寒暑不可同时！”

“冰炭不可共器，寒暑不可同时”，司马光这句咬牙切齿的话，从反面证明了王安石同他们这伙大地主顽固派思想政治路线上的尖锐对立。它首先表现为“荆公新学”与反动理学的斗争。王安石为了替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创立了一个新学派，因为他后来被封为荆国公，故称为“荆公新学”。变法期间，他下令“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他用自己的观点，解释儒家的经典《诗》、《书》、《周礼》，写成《三经新义》一书，作为当时天下士生的必读教材，以大不敬的态度回“敬”了孔孟之道，为变法制造舆论。这场斗争，十分尖锐，它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司马光一伙顽固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们把王安石的新学、新法视为洪水猛兽，把与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捍卫儒家传统与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一个个都像被刨了祖坟似地跳出来进行反扑。一天清晨，司马光捧着几函儒家经典去迓英殿给神宗上课。拐过一个弯，他看见前面弯腰曲背地走着一个小老头，正是自己的死党吕海，便赶上去打招呼：“吕大人，今天您给皇上讲什么经？”吕海的左手十分心虚地按在肚子上，袖子里鼓鼓的不知放着啥。他抬头一看是司马光，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扬扬袖子：“嘿、嘿，今天不讲课啦，袖子里兜着的是弹文，列了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司马光看见吕海这么卖力，不觉心头一喜，脸上却忙佯装惊异：“哟，你好大胆，满朝大臣都夸他能干，皇上把他看得命根一样重，你还要弹劾！……”吕海急了，他跺着脚嚷着：“君实，你我兄弟还不讲老实话，王安石变法就是要整咱们的大户人家，这小子连孔夫子的《春秋》都敢骂为‘断烂朝报’，简直就是少正卯，该千刃万剐！千刃万剐！”这一嚷不要紧，吓得司马光赶忙拉他到僻静处，鬼鬼祟祟商量了好半天。

那一天，吕海把弹文递上去，神宗看都没看完就扔还给他。司马光向吕海使使眼色，吕海便扑通地跪下，“砰砰”连声磕头，提出要回家免职养老，妄图以此要挟神宗，逼王安石一同离职。但是，他们的主意打错了。王安石当时正好在场，一眼便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他大义凛然地对神宗说：“陛下，臣早就以身许国，只要您对变法事业坚定，臣绝不会引迹自嫌，吕大人要走请便！”王安石光明磊落、坚定自若的态度鼓舞了宋神宗，神宗毫不踌躇地下令把吕海赶出了朝廷。

吕海滚了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又找神宗纠缠不休。他气急败坏地对神宗说，

“陛下，祖宗法制都在，可不能改弦更张啊，否则必定会失天下心呢！”神宗知道他说的“天下心”其实就是他们这伙大地主大官僚的心，于是回答：“改革制度，对士大夫诚然不利，然而对百姓有何不便呢？”文彦博唾沫四溅地说：“我大宋王朝是为士大夫治天下的，不是给百姓治天下的！”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人结成了以司马光为头子的死党，他们咬牙切齿，蜂拥而起，有的攻击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有的咒骂王安石“操管（仲）、商（鞅）权诈之术”，“任偏见而立新议”。这伙儒家之徒自以为得计，他们要象孔丘杀少正卯、秦惠王杀商鞅那样，誓把王安石置之死地而后快。

面临这群孔门恶狗的狂吠声，王安石神定气闲，巍然不动。他要求宋神宗认真学习“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还挥笔写下了闪耀着法家思想光辉的诗篇《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语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首诗表达了王安石对儒家之徒的无比蔑视和对商鞅的高度赞扬，更饱含着他作为法家路线继承者和捍卫者的强烈自豪感。还早在青年时期当地方官时，王安石就已树立了用法治打击大地主豪强的法家思想：“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兼并就是犯罪，就该打击镇压。实行变法，打击大地主豪强的兼并势力，一天也不能等待了。商鞅变法是那样勇敢，王安石也要顶撞一下大地主大官僚。在法家思想指导下，一场以反兼并为中心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了。

冲破大地主大官僚的重重阻挠，王安石首先建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他大胆起用和提拔了一批拥护新法、有朝气、有才干的中小地主阶级人才，把他们安置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依靠这批人，他提出了一整套反兼并、打击大地主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调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王安石领导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实施“农田水利法”的结果，从熙宁三年到八年，全国修建了一万多处水利工程，可灌溉耕地三千六百万亩。“青苗法”是在青苗不接之际，由政府向农民贷放钱粮，收获以后再归还政府，抵制了大地主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他还提出“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使原来享受免役特权的豪绅、官吏、富商都得出钱助役，如当时河南府就下令北宋元老富弼出“助役钱”。变法前，北宋“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不仅使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加剧，而且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国家的财政危机。变法中，王安石组织人力挨州挨县丈量土地，挖出了被大地主瞒产漏税的几万亩土地。这场封建社会后期规模最大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打击大地主豪强的作用，促进了当时生产的发展。在对外问题上，王安石坚持法家爱国主义路线，谴责了大地主投降派“偷安与受给”的卖国主张，任用法家沈括和名将王韶、宗谔等人抗击侵略，收回了被西夏奴隶主贵族霸占的河湟等地区的大片失地，并在边境上建造了一批堡寨，加固了许多城堡。北宋王朝初步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困境，暂时出现了兴盛的局面。

又是一个新年到了。儿童们在大街小巷嬉笑着，一串串鞭炮“劈里啪啦”震天响。春风把暖气吹进了全家合饮的屠苏酒里，阳光下千家万户都贴出了新的门神……在这喜气洋洋的除旧布新的节日里，王安石抑制不住由于斗争的初步胜利而导致的喜悦，他欣然命笔，写了一首七绝：“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法，恰似那除旧岁的爆竹，震散了儒家保守倒退的妖氛，“新桃”已经贴出去啦！

(三)

大地主大官僚在王安石变法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那里肯善罢甘休。他们跟着司马光的指挥棒转，举起了儒家的破旗，千方百计要把王安石的“新桃”撕下来，把自己的那张“旧符”重新贴上去。

一天，宋神宗急急忙忙地把王安石请去，问他：“卿最近可曾听到‘三不足’这句话吗？”“没听说。”“嘻，朕也是刚听到的，外头风传如今朝廷说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你说咱们哪有这么厉害？！”王安石一听神宗说的话，就知道这又是顽固分子编造出来给自己栽赃的。不过，这几句话倒是让他们说对了。他从容地微微一笑，“陛下不必为此烦恼。这‘三不足’并没有错。只要咱们干的合乎正道，怕什么流言蜚语。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那更是理所当然。有作为的皇帝往往几次三番修订自己制的法制，要是他让子孙世代代墨守成规，那祖宗为什么要屡次变更制度呢？”神宗一听有理，便呵呵地笑起来了：“照卿这么一说，是该‘三不足’了！”

大地主顽固派头子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可说是恨之入骨了。他每次向神宗讲课，总是谈古论今，竭力宣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道理。这一天，他又在延英殿里摇头晃脑地胡诌开了：“要是让三代之君守着禹汤文武之法不变，那么，三代盛世至今还是长存不败啊！历史上，变法变法，变到后来，不是弄得盗贼满天下，便是帝业衰亡，祖宗之法不能变啊！”神宗问：“那么今日王安石变法呢？”司马光见神宗问到王安石变法，也就咳了一声，说：“陛下，王安石变法，士大夫沸腾，老百姓骚动，天下皆怨。陛下怎能同他共治天下呢？他这个人只知变法、变法，偏要得要命，没有一点君子风度，哪儿配当宰相！”神宗越听越不是味，起先还想给他留点面子，但见他越来越放肆地辱骂王安石，实在憋不住了：“司马卿，王安石披肝沥胆，实行变法，为的是大宋富强。他不好官职，自奉甚薄，朕视之犹如柱石！”司马光见神宗发火，连连骂自己“该死”，慌忙谢罪退出，另去盘算鬼主意了。

几天后，攻击王安石、攻击新法的奏折、万言书，象纷飞雪片似的，不断地向神宗的面前飘来。司马光见“祖宗之法”压不住王安石，又兴起了“人言”的妖风恶浪。受到新法打击的大地主官僚，一些罢了官的儒家大臣都参加了进来，喋喋不休攻击新法是胡闹。连

曹太后、高太后也整天围着神宗哭闹。他们大骂王安石变法扰乱了天下，罪大恶极。那些变法派内部的投机分子在大地主顽固派威胁拉拢下，也纷纷倒戈，攻击王安石。道学家程颢力劝王安石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苏轼不仅把王安石痛骂一顿，还借攻击商鞅“不顾人言”、“旋踵而亡”，含沙射影地暗示王安石“创法新奇”的改革不会有好下场。各种反对的意见劈头盖脑地向神宗、王安石袭来。

就在这时，司马光磨墨蘸笔，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与王介甫书》，信中给王安石加上了“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项罪名。他一会儿破口大骂新法“尽变祖宗之法”，弄得人人“纷纷扰扰，莫安其居”，一会儿苦苦哀求：“今日我们的安危都系在你身上，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就得救了，你怎么这样忍心不可怜可怜我们呢？”又是恫吓威胁，又是卑躬屈膝，做张做智，丑态百出。王安石没睬他，只简单地回了一张收条。过了几天，王安石又收到他的一封信，还是老一套。王安石忍无可忍，拿起毛笔，一气呵成三百多字的复信即《答司马谏议书》。信中逐条批驳了司马光妄加的四项罪名：“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王安石愤怒揭发了儒家顽固派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固守孔孟之道的丑恶嘴脸，断然拒绝了司马光废除变法的无理要求，斩钉截铁地表示要把新法推行到底。鉴于顽固派盘踞的台谏机构成了破坏新法的主要据点，王安石果断地改组了台谏，撤了一批顽固分子的职，并逼迫司马光离开了中央，同时扩大了革新派的阵营。

一〇七四年，河北大旱，一连九个月没有下雨。宋神宗急得整天唉声叹气。司马光看到如此情景，赶忙找到宋神宗，说：“陛下，此乃新法得罪上天所致也。‘僭天之分，必得天灾’，谁敢违抗天命，必得天刑！”有一个叫郑侠的儒家之徒，挖空心思地伪造了一幅《流民图》，强献给宋神宗，说：“这都是变法造成的惨象，请陛下看看。陛下如罢新法，斥退王安石，十日之内如不下雨，请斩臣的头！”神宗被他唬得一怔一怔的，一夜没睡着觉。

一刹时，黑云压城城欲摧。要坚持变法，必须要冲破大地主顽固派死守的儒家反动的天道观。王安石继承荀况“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思想，不管天崩地陷，坚持变法。他响亮地提出：“尚变者，天道也”，“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他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痛斥了顽固派死抱住不放的儒家“天人相应”说和灾异论，指出：水旱灾害，一向就有，只有改革人事，才能对付天灾！

有一年，华山受地震影响，崩下来几块石头。顽固派象捞到了稻草，借题发挥，攻击变法。有个道学家上书神宗：“天眚未弭，地震连年，就是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搞得四方人心日益动摇。”他要求神宗“仰测天意，俯察人事”，立即停止变法。司马光死党文彦博在朝廷上哭嚎似地喊叫：“王安石变法损国体，敛民怨，看吧！华山崩坍了，老天爷发火了！”王

安石针锋相对地严正回答：“你们这一伙平日里横行不法，鱼肉百姓。如今又造谣生事，作恶多端。华山之变，要说是‘天意示警’，正是为了惩罚你们这班小人！”文彦博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以辞职相威胁，王安石也就不客气地罢了他的官。

一个晚上，夜空出现了一颗摇曳着长尾巴的彗星，司天监的官员们慌忙报告神宗，一帮儒家之徒吓得惊慌失措。神宗愁得连饭也吃不下。第二天上朝时，顽固派们在交头接耳，缩头吐舌地作出一种“天变可畏”的怪模样。王安石昂然出班，上疏说：“听说陛下为了昨夜的一颗彗星，饮食都减了？其实天地与人事并不相关，日月食、地震，都有常数，不足畏忌。当年晋武帝五年天上也曾出现过彗星，可是他足足统治了二十八年！什么‘天人感应’，未免荒诞可笑！”

在那同诽谤、谣言进行艰苦斗争的日子里，王安石曾写过一首《孤桐》诗：“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是啊，天寒地冻，树根愈显茁壮，烈日炎炎，绿叶更加青翠——这正是法家王安石敢于批判旧传统、坚持“三不足”精神的真实写照。

(四)

王安石三十四岁那年，曾经和几位兄弟、朋友一起去游褒禅山。他们打着火把去探华阴洞，洞里寒气逼人，深不可测。刚进去的时候，两边石壁上刻满了游人们的题词，“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题词也愈少。王安石即景生情，回家写了一篇《游褒禅山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从青年时期起就敢于创新，后来又以“三不足”的精神，坚持变法，他的一生，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崎岖的道路。

但是，王安石虽然“有志”于改革，他却不能走完这条道路的全程。以他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要求也不能改变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它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变法派内部也无法统一，坚决的分子只是少数。变法的后台宋神宗在地主阶级内部重重矛盾影响下，支持变法的立场逐渐发生变化，他怀疑、彷徨，最后发展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王安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〇七四年，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宰相职务，退居金陵，但实权仍掌握在革新派手中。第二年，王安石复相，大地主顽固派拚死反抗。当时退居洛阳的司马光，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指挥顽固派用一切办法对抗新政，发誓要推翻新法。在顽固派的攻击和破坏下，革新派内部发生两次严重分裂，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不久，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顽固派一步步加强了自己的阵势，卷土重来，逐步掌握了政权。

王安石退居金陵(南京)后，在钟山西南营造了几间屋宇，取名为半山园。虎踞龙盘的钟山，浩荡东流的万里长江，使退出政治舞台的王安石无限感慨，“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感情：“西安春风花笼树，花边饮酒今何处？一杯塞上看黄云，万里寄声无雁去。世事纷纷洗更新，老来空得满衣尘。青山欲买江南宅，归去相招有此身。”(《寄朱昌叔》)平时，他除了到各地去寻访胜迹、浪迹山野外，便把时间集中在读书学习上。为了和他已经写成的《三经新义》相配合，他开始写作一部叫《字说》的文字学著作。他披览百家著作，推陈出新，扼要而深入地阐发和确定文字的新涵义。即使是在退休生涯中，王安石也仍念念不忘对传统的旧思想进行挑战。

一〇八五年，宋神宗病死。继位的宋哲宗赵煦，是个不满十岁的幼儿。宋神宗的母亲高后垂帘听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起用大批顽固分子，并任命司马光为宰相，顽固派重握了大权。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看到司马光当宰相的邸报时，怅然良久，痛苦地说了一句：“司马光当宰相了。”他知道，司马光的上台，预示着变法的失败。这天晚上，他通宵不寐，在半山园内外踟蹰到天亮。

果然，司马光一上台，改革派就受到打击和迫害，一大批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被吸收到政府机构之中，那个死顽固的文彦博得意洋洋地重新上任。司马光上台不到一年，新法大部分被废除了。当卧病金陵的王安石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觉失声说：“难道连免役法也废除了？！”过了好久，他痛苦地说：“免役法是不能废除的，我为创立此法，曾和先帝商讨两年之久，花了多少心血啊！”夜晚，王安石在灯下重读《史记》、《汉书》，商鞅、桑弘羊的战斗精神和他们的不幸结局，使他联想起自己为新法而战斗的一生。他怀着无限的感慨写下了一首《读史》诗：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黯犹承误，末俗纷纷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留千秋纸上尘。

一生的努力，随着顽固派的复旧而付之东流。长存在青史上的不过是勇于变革的“三不足”精神，但这又何济于事呢？王安石早已预料到那些儒家之徒必然要歪曲变法，篡改历史。从京城开封传来的废罢新法的种种消息，无一不在加重王安石的病况，他饮食俱废，忧心如焚。到一〇八六年的四月初六这一天，王安石怀着悲愤的心情逝世了，享年六十六岁。



西双版纳来信

吴文虎 姚纪梅

最近，上海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慰问团中搞函授大学教育的几位同志，在去云南西双版纳进行关于函授教育调查的时候，连续给有关部门写来了好几封信，汇报他们的途中见闻。信中反映了知识青年在边疆战天斗地的丰富生活，并提出了如何积极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值得一读。本刊先发表他们的第一封来信，其余几封将在今后陆续登载。

去允景洪途中(第一封信)

××同志：

在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普及、深入、持久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乘上了二十三次列车，从上海到祖国的西南边疆云南，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学习、采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函授大学的经验。这真是一次不平常的旅行，上海知识青年在那里的那种革命精神，真应该向你们好好汇报一下。

我们刚到昆明，正碰上省里在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会议，满街都是“热烈祝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召开”的横幅标语，许多知识青年响亮地提出了“坚持革命，坚持前进，扎根农村，建设边疆”的豪迈决心，它给昆明这个美丽的城市更增添了战斗的豪情。

从昆明乘车南下，要四天四夜才能到达西双版纳。长途车沿着险峻雄伟的哀牢山脉和无量山脉盘旋前进。五里里滇池，一望无际，滚滚波涛向着我们奔来。遥望那西边的碧鸡山，犹如一只飞翔中的凤凰，又仿佛似一个在滇池中梳洗着长发的傣族姑娘。在扬武站歇夜的时候，和我们同路回西双版纳去的知识青年代表会议代表杨恩芳，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了函授大学的好处。这位三十岁的重庆女青年，现在是农垦局热带植物研究所政治部的副主任，肩上的担子重了，学习的愿望也更强烈了。这次函授大学有一门马列课程，她可高兴了，说：“函授大学的办法好哩，平时能帮助我们坚持自学，每个星期有半天集中讨论，当学习《哥达纲领批判》遇到了困难时，听了复旦大学教师的示范讲课，可解决了

不少问题。”她告诉我们，大家可学得认真哩！有个青年叫周长青，是个事务员，虽然他一只眼睛从小残废，但他坚持学马列的意志十分顽强，写了许多心得体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边疆建设事业。还有一个名叫朱小草的广播员，她常常通宵达旦地学习马列，现在已经读完了六本马列著作。她说：“大家学了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后，最大的收获是帮助我们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在边疆办橡胶农场，困难当然很多，但有了革命的理论，那就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有了革命的理论，什么困难都不怕了。”这位面色黧黑、身体健壮的女青年的话，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们，久久地在脑海里回响。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各级党组织如何适应和满足战斗在边疆第一线的青年的学习要求。

第二天拂晓，长途车在望不到头的沥青公路上继续行进，连翻了几座大山，驰过了奔腾的元江，到达了通关。

入夜，我们和同路的上海知识青年沈瑾瑾等谈天。她们都是出席了省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后回农场去的。沈瑾瑾豪爽地笑着自我介绍，说她是函授大学的“旁听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由于函授的名额有限，她自动放弃让别人报名，但她绝不放弃学习。函授教材一起看，函授学习一起参加，函授回来一起听辅导。以后，我们才晓得，小沈是东风农场第一个担任连队第一把手的优秀青年。战士们这样评价她：“那里有艰苦的活，那里就有沈瑾瑾”。扛桁条的路上，渗着她的汗水，大雨天抢堵鱼塘的战斗，留下她的足迹，通宵挖井，传递着她的笑语声。工作再忙，睡前总要读几页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全连熄灯最迟的是她，但全连第一个起床的也是她。我们的战斗在祖国边疆的上海知识青年面貌的变化可真是大啊！

另一个同路的男青年沈伯顺，原是南市区蓬莱中学毕业的学生。他既是函授大学马列班的学员，又是这个班的辅导教师。他告诉我们，他所在的东风农场八分场为了推动学员自学，办了一期为期半个月的《哥达纲领批判》学习班，有七十多人参加，自学、讨论，互帮互学，他还做了七次辅导报告。他坚定地说，函授大学坚持办下去，我们就能坚持学到底。他用殷切的眼神望着我们说，在边疆学习，遇到困难不少，教材也短缺，希望函授大学能对辅导教师多多帮助。

第三天到了思茅。当流车离开思茅后，便进入了竹木参天、遮天蔽日的绿色海洋之中，那就是素有“宝库”之称的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所谓西双版纳，是一个以傣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单位。傣语“西”就是“十”，“双”就是“二”，“版纳”是指行政单位。西双版纳就是十三个行政单位的总称。

车行在丛山之间的平缓宽阔的坝子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大的椰子树摇曳着巨伞般的绿叶在向我们招手，油棕树上挂着的入头般大的累累果实在向我们点头致意。此外，还有油橄榄、腰栗、剑麻，汇成一片绿色世界。除了这些经济林木和热带果树外，田野里成片的金色稻谷长势喜人。

国庆前夕，我们到了西双版纳州委所在地允景洪。在傣语中，景洪即黎明的城市，允指首府。第二天，州委书记徐忠启就在州委邀请的各民族大团结的国庆座谈会止接待了

我们。他在畅谈西双版纳一九八〇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丽远景时，赞扬了函授大学。他希望把教学基地及早地建立起来，还希望上海高等院校能协助多训练些师资队伍，把函授大学愈办愈好。国庆刚过，州函授领导小组在州委副书记刁国栋和刁琼英的主持下，研究了召开州函授大学经验交流会，以及明年函授大学的规划。

领导的重视，知识青年的欢迎，使得我们刚到这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函授大学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亚热带植物园里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国庆后，我们在上海赴西双版纳学习慰问分团副团长李贵元的陪同下，在茫茫林海里访问了各个农场的函授学员。他们当中有早在十年前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这里拓荒的年轻人；有世代受封建领主和国民党反动派欺压，而今当家作主的傣族、爱尼族等贫下中农子弟；更多的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红卫兵小将。我们也访问了函授教师。这支四百多人的教师队伍中，除了上海几所高等院校派出近二十名决心为边疆知识青年服务的“志愿军”外，主要是当地热心关怀知识青年并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医务技术人员。同时，也拜访了农场的有关领导干部。函授大学在这里开设的马列、写作、电工和医防等各部门，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拿复旦大学在这里开设的马列课来说，有五百名学员，但只有一名学校派来的专职教师，主要是依靠当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兼职教师的努力，才办起了多期学习班。在勐腊县举办的一次马列学习班，学员是七十多名，但在复旦大学教师郭雷上辅导课那天，却来了一千多名听众，全县在这一天许多商店停止营业，机关停止办公，从县委、农场领导到商店营业员全来听辅导了。大礼堂坐不下，就拉线听广播。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求学历险记”的趣事，讲的是勐海县格那和公社上海插队青年姚延平，为了及时赶上马列函授学习班，在齐腰深的草丛及参天古林里步行一百多公里，历时二天一晚赶到了目的地。他向学习班报到后，不仅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而且在三周的学习班上补上了因迟到缺掉的课。

青年学习马列的劲头这么大，可是我们文教战线的领导部门为他们做的工作却实在非常不够。过去有的同志总认为，为知识青年办函授教育是“多管闲事”，现在看来这个社会主义的“闲事”应该管，过去管得很不够，今后应当多管些！上海是个工人阶级集中的大工业城市，科学文化技术各方面都有比较好的基础，应当为巩固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做出更大的贡献。比如说，这次来西双版纳搞马列函授的教师只有一个人，似乎少了一点。学校里难道真的那样抽不出人来么？能否动员一点社会力量呢？再说，能不能从工厂里动员一些业务理论队伍中的骨干分子来一起组成三结合的教学队伍呢？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深思的。

知识青年为什么如此欢迎马列函授学习，这个问题要在我们访问了橄榄坝农场后才进一步获得了答案。但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夜深了，手也酸了，还是在下一封信中再详谈吧！

此致

革命敬礼！

吴文虎 姚纪梅

一九七四年×月×日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三年第一期至第四期 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后一数字是页码)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周恩来(1·3)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王洪文(1·13)
中国共产党章程……………(1·18)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1·22)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新闻公报……………(1·27)

学习十大文件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认清社会趋势 推动革命前进
——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点体会
……………方海(1·28)
批判社会帝国主义的锐利武器
——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
一点体会……………余来(1·33)
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
——学习《法兰西内战》的一点体会
……………宋敏彬(1·38)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的
——学习恩格斯致倍尔的信的一点体会
……………方海(2·3)
签订布列斯特条约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学习列宁关于区分两种不同妥协的理论
和策略的一点体会……………薛源之(2·9)
正确认识当代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学习
札记……………冯曼林(2·19)
西欧“共同市场”与美苏争霸……………郝群(2·19)
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
——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方海(3·3)
认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3·7)
从发展不平衡看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金士培(3·10)
要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方海(4·3)
自觉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左雨春(4·7)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论尊儒反法……………石仑(1·44)
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
……………王运熙 顾易生 李庆甲(1·59)

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史尚辉(1·59)
资料: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尊儒反法资料摘译……………(1·64)
读《封建论》……………康立(2·58)
孟子——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派……………翟平(2·58)
论荀子的哲学思想……………李定生(2·62)
春秋战国儒、法经济思想对立的实质
……………景池(2·67)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几次复辟分封制的教训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培训班学员 黄蔚敏(2·72)
上海五四农场青年工人
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3·15)
《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金冲及(3·24)
从反儒尊法到尊孔读经
——试论章太炎思想的演变过程……………沈浪(3·29)
尊孔与卖国之间
——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
……………秋雨(3·35)
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
——读《盐铁论》札记……………康立(4·71)
从汉代的儒法之争谈到王充的法家思想
……………郭绍虞(4·76)

经济问题研究

解决矛盾要靠正确的路线……………巩学庆(3·38)
做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促进派
——上海部分财政专管员座谈会……………(3·40)
集中兵力打好歼灭战
……………上海闵行“一二五”工程指挥组(3·44)
美苏两霸加紧争夺中东石油霸权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薛源(3·48)
资料:美国“能源危机”是怎么回事?……………(3·53)
谈谈企业管理……………官效闻(4·11)
靠咱们这号人就能管好码头!
——记杨树浦装卸站依靠群众改变码头面貌
……………王华智(4·14)
码头上的政治经济学
——杨树浦装卸站一次学习座谈会纪要……………(4·21)
从“一根杠棒上的前后盾”谈起
……………吴文虎 郑树涵(4·27)
质量把关依靠谁?
……………上钢五厂一车间革命委员会(4·29)

韩信批判.....施丁(11·34)
试论西汉前期复辟的主要危险.....郭志(11·39)
奴隶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论先秦时期奴隶起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
.....上钢五厂五车间 工人理论学习小组(11·44)
如何处理王安石的历史作用(报刊论文综述).....(11·47)
刘邦的“五湖四海”.....薛良文(11·50)
“天造我”之“器”.....叶大(11·52)
认真看书学习 深入批林批孔
——我们是怎样研究《盐铁论》的?
.....上钢五厂八车间党总支委员会(12·3)

论程水之战.....李兴斌(12·6)
道学家朱熹的真面目
.....江西省婺源文化站 文捷(12·12)
沈括和王安石变法.....晓苑 翟海(12·16)
评《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司徒季(12·20)
论商鞅的国家观
——读《画策》篇.....邱荣其 康伟 李爱娣(12·25)
评价李贽思想上的一些不同观点(报刊论文综述)
.....(12·29)
从项羽的降政策谈起.....徐国芬(12·32)
礼器和辩子.....李欣(12·34)

《哲学小辞典》词目选登.....(2·86)
《哲学小辞典》词目选登(续一).....(3·76)
《哲学小辞典》词目选登(续二).....(5·85)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从东北解放战争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
.....余子道(6·16)
从抗战初期的战略转变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
.....余子道(8·30)
东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批判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
右倾军事路线.....余学军(9·19)
论莱芜战役.....史锋(10·40)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挥港口装卸的一点体会
.....上海港务局第三装卸区革命委员会(10·47)
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颂歌
——革命样板戏是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
事路线的锐利武器.....范中柳(10·50)
陕北“磨菇战”.....史锋(12·36)
牢牢掌握主动权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点体会
.....王秉森 李海生(12·44)
历史战例四则.....(12·48)

在斗争中努力学习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深批“克己复礼”
.....上海钟表元件厂拍档下小组(4·3)
为什么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金盛融(4·22)
《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官效闻(4·26)
资料:拉萨尔言论摘编.....(4·34)
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方海(6·33)
《帝国主义论》历史背景简介.....余来(6·37)
资料: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摘编
.....(6·44)
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
.....上海师范大学 施鉴思(6·48)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
.....任晋(9·39)
唯物辩证法的好教材
——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的一点体会
.....上海无线电二十六厂工人 陈照春(9·44)
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而斗争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一点体会
.....官欣(11·18)
研究儒法斗争史要开展百家争鸣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的一点体会.....乐英(11·22)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的一点体会.....任晋(11·25)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短评:赞工人理论学习班.....(6·25)
我们工人能够学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工人学习班座谈会纪要.....(6·27)
在批林批孔中增长革命才干
.....新海农场 黄龙珍(6·32)
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一)
.....孙绣华 陈传宏 姜俊俊(7·60)
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续完)
.....王固荣 王思宇 胡申生 蔡喆(8·44)

经济问题研究

抓好生产领域内的思想斗争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批判“谁发扬风格
谁倒霉”的错误思潮的调查报告
.....周诚 王华(2·56)
论风格.....树人(2·62)
评“崇洋有理”.....龚进(3·39)
乘风破浪万里浪
——“郑州”号、“锦州”号访问记.....钟志杰(3·42)
驳“三难”.....吴文虎(3·47)
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景池(3·50)
发展不平衡是帝国主义危机最深刻的表现
——谈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暂时跳跃
式发展的现象和本质.....余来(3·54)
工人要占领科学实验阵地
——上海市科学技术交流站的调查报告
.....王复初 李长恩(4·47)
对“不务正业”的人的调查
——从一台医疗器械的诞生看社会主义
相互关系.....常尉 钱方年(4·52)
走自己发展新技术的道路
.....上海马铁厂党支部书记 陈彩明(4·56)
劳保医院和“医院劳保”.....薛恩祥(4·60)
下厂礼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范崇星(4·62)
我们实现了三年治水改土规划
.....中共松江古松公社委员会(5·34)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共青浦县练塘公社委员会(5·37)
产量要上去,农本要下来
——蔡兴大队坚持勤俭办社方针的调查
.....上海市农业局、上海县农业局联合调查组(5·40)
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理论兵
——上海县三林公社的调查.....左龙(5·44)
也谈“农民为什么不爱土地”
——评苏修一场关于农业危机的讨论
.....陈高志(5·47)

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天地
.....松江天马公社商业站革命委员会(6·83)
没活大饼炉子
.....上海市静安区饮食公司革命委员会(6·87)
短评: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7·37)
壮志满怀 山河手中改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制订发展规划
的调查报告.....中共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7·41)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1974—1980年农业
发展规划(修订草案).....(7·46)
我们需要这样的规划
——新泾大队部分干部、社员座谈纪要.....(7·50)
打掉妄自尊大
.....金凤(8·35)
“龙”“虎”斗说明了什么
——上海染化十厂管道小组革新工艺的调查
.....陈克俭 吴月华(8·37)
坚持科学实验九年
.....上海灯泡厂三车间玻璃小组(8·41)
四十六万人民的心愿
——嘉定县制订和实施远景规划的调查
.....本刊记者(9·47)
嘉定县1974—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修订草案).....(9·53)
订规划先要抓路线
.....嘉定县马陆公社党委书记李庆涛(9·60)
建设新农村永无止境
.....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队长 徐正明(9·62)
我们的大目标是共产主义
.....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贫农社员秦大弟(9·64)
自己动手 改变面貌
——上海针织工业自力更生实施技术改造
规划的调查.....(9·66)
我们是如何制订“万台”规划的?
.....上海丰收拖拉机厂革命委员会(10·55)
建立一支贫下中农自己的科研队伍
——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的调查.....施仑卓(10·59)
制订和实施规划是深刻的思想革命
.....中共嘉定县委员会书记 李钧(10·68)
技术革新能手谈革新规划.....(10·67)
短评:革命精神是怎样焕发出来的.....(11·3)
我们工人的肩膀就是铁打的
——记上海第二焊接厂的先进事迹
.....本刊记者(11·5)
向上海第二焊接厂学习(短文一组).....(11·15)
前进农场宣言.....(11·55)
革命青年是建设农场的生力军
.....前进农场造林二连党支部(11·64)
南泥湾精神永放光芒
.....前进农场五·七连队党支部(11·66)
亦工亦农好.....前进农场锁厂党支部(11·67)
经济危机与政治革命
——学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的体会.....上海师范大学 施鉴思(12·57)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
.....秦正先(12·62)
怎样看待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学术动态)
——次学术讨论会的意见综述.....(12·68)
谈谈今后怎样才能继续大幅度增产粮食
.....中共崇明县委员会(12·72)

学哲学 用哲学

用全局观点指挥铁路运输
.....上海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8·63)
插秧不弯腰.....中共嘉定县望新公社委员会(8·66)

文艺评论

大家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薛源之 翟平(1·3)
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方海(1·6)
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戚文德(1·9)
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
.....姚克明 黄彩虹(1·18)
话剧革命的新收获
——简评《钢铁洪流》.....齐方(1·16)
发生事故以后
——评话剧《钢铁洪流》、《第二个春天》后想起的
.....石望江(1·20)
两个剧本 两面镜子
——谈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
苏联话剧《炼钢工人》.....肖豫(1·23)
以小见大
——谈谈小戏创作.....上海戏剧学院 奚文熙(1·26)
走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道路
.....上海人民淮剧团 乔谷凡 顾少春(1·29)
补上了难忘的一课
——谈《补课》的主题提炼
.....上钢三厂五·七中学“补课”创作组(1·32)
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
.....上海无线电二厂老工人合唱队(1·34)
鲁迅与木刻.....石一歌(1·37)
改造黄河的人
——阅《人民画报》连载的《大河上下》有感
.....司徒伟智(1·39)
海鸥为什么走了红运?.....任文钦(1·41)
从当代苏联“工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苏修文学述评之一.....翁义钦 倪蕊琴(1·50)
斗争没有结束.....常峰(2·51)
青年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
——谈谈电影文学剧本《陈玉成》
.....上棉十七厂青年工人 郑树清(2·53)
.....上四厂青年工人 莫建备
“白马”、“红马”、“天马”.....延凤(3·57)
荷兰的“出”与“胜”.....叶伦(3·58)
“荷兰”和“海瑞”.....复旦学工农兵学员仲华(3·59)
白显舟的“基础”.....常峰(3·61)
他为什么越走越远?
——白显舟犯错误的教训.....官力(3·65)
“新”国画“新”在哪里?
——评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编的《中国画》
.....任轶(3·65)
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任轶(4·39)
贾府的大观园和赖大的花园.....方泽生(4·42)
怎样评价宋江?
——综述《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
.....木卯(4·44)
大有希望的艺术.....任晋(5·59)
播起战鼓 高唱战歌
——参加上海群众歌咏大会有感
.....上海乐团指挥 司徒汉(5·61)
试论梁山农民军中的路线斗争
——谈《水浒传》
.....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班 严己(5·65)
《特别分队》特别在哪里?.....任文欣(5·69)
附:苏修小说《特别分队》、《彼得·里亚宾金》
故事梗概
从当代苏联“农村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苏修文学述评之三.....翁义钦 倪蕊琴(5·75)

党是领导一切的

——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杜鹃山》观后感 杜华章(6·55)

鲁迅是怎样谈《红楼梦》的……徐锡熙(6·60)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翟青史(6·65)

“特种学者”的“考证癖”……戴厚英(6·69)

从当代苏联“军事题材”作品看苏联侵略扩张的野心

——苏修文学述评之三……翁义钦 倪蕊琴(6·72)

战斗的史篇

——再读《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 王金保 石源华(7·56)

贾探春的“新经济体制”……向 柏(7·64)

迎着风浪前进

——读短篇小说《试航》

……中华造船厂工人写作组(7·68)

是“花圃”，还是圈套？

——评《海浪上的花圃》……任文欣(7·71)

附：海浪上的花圃(苏修中篇小说·梗概)

论鲁迅小说的反孔思想……申 越(8·51)

评《三国演义》的尊孔反法思想

……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班 严 己(8·55)

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胜利果实

——读小说、散文集《新课堂》……刘清益(8·60)

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像

——谈话剧《战船台》中留海生的形象塑造

……文雁平(9·71)

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

——《科学技术第三号》观后感……方 亮(9·75)

军民团结，情深意长

——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观后感

……杜华章(10·72)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上海短篇小说集》序……方泽生(10·75)

努力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创作

——读长篇小说《较量》……宋 海(10·80)

小冬子的成长道路……杜华章(11·70)

评旧戏舞台上的关羽形象……云 岚(11·76)

薛宝钗和中庸之道……任 侠(11·82)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短训班万岁！

——复旦大学短训班的调查报告……何 欣(3·68)

一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学方法

——上海市市北中学开展电化教学的调查

……闸北区革命委员会教卫组(5·80)

谈谈低年级小学生的启发式教学

……武康路小学教师 王宗瑜(5·82)

这个公社实现了普及教育

——金山县朱行公社的调查报告

……上海市教育局调查组(6·76)

要引导自学，不要“满堂灌”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6·80)

“七·二一”道路越走越宽广

——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调查

……本刊记者(8·70)

努力办好函授教育

——上海赴安徽阜阳地区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

部分同志座谈纪要……(8·74)

短评：坚持办好函授教育……(9·78)

把短训班办到农村去

……上海海运学院函授教育小组(9·79)

谈谈当好兼职辅导教师的体会

……江西婺源县许村卫生院 王玉东(9·82)

坚持以自学为主(三则)……(9·84)

让学生在学学校学到更多的本事

——刘行中学的调查……(10·85)

这里也是“课堂”

——记淮海中学直流电机修理厂……何 欣(10·89)

各条战线都要为青年着想

多替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着想

……杨浦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1·66)

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上海纱管配件厂党支部(1·68)

书评：塑造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

——长篇小说《征途》读后……王一良(1·70)

全面关心插队知识青年的成长……孙 澄(2·64)

西双版纳来信……吴文虎 姚纪梅(12·88)

革命青年谈理想

志在农村绘宏图

……安徽固镇县中兴公社 胡志强(1·62)

丁庙大队下乡青年

敢为革命创新业

……上海东风农场 俞建平(1·64)

从第一天推粪车谈起

……普陀区清洁管理站 侯建萍(4·65)

三百六十行 行行有“名堂”

……闸北区服务公司 五姑娘扞脚小组(4·67)

“四史”选刊

七一人民公社的诞生……《七一公社史》编写组(5·51)

社会调查

一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任 晋(4·68)

人间正道是沧桑

——豫园商场今昔……金盛曦(10·92)

杂文

挑担子还是卸担子？……红 宣(1·60)

“独往独来”析……石望江(2·38)

“中庸之道”和“绝”

……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马俊民(4·20)

如此怪癖！……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 梁益矢(5·32)

今日之“葛朗台”……求新造船厂工人 章智明(6·53)

“掘苗助长”和“守株待兔”

……红星农场 王建华(7·35)

……上海第五印染厂 葛军力

夏洛克的新变种……中华造船厂工人 奚启新(9·87)

相信“脚”，还是相信“尺码”？……许国良 奚启新(10·70)

大物传记

胡适传

——五四前后……余秋雨(1·74)

张勋传……赵 澍(2·78)

再揭孔家店

——《鲁迅传》选载……石一歌(5·88)

王充传……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 陆晓松(7·75)

方志敏烈士传……史 锋(8·79)

拉萨尔传……司徒伟智(11·86)

王安石传……曹恩峰 钟功伟(12·76)

来信与建议

创办农学院余大学(倡议书)……吴国祥等(3·73)

办好函授大学(读者来信)

……江西省宜春县教桥公社 杨佩林(3·75)

插队知识青年

一 九 七 四 年

第 十 二 期

总 第 十 六 期

XUE XI YU PI 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代号: 4—192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版

定价: 0.25元